

神的地下教会

理查·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

第一章

我人生的前半，在 1948 年 2 月 29 日结束。当我从家步行到附近的教堂时，一辆黑色福特汽车在我旁边急刹车，两个男人跳下车，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推到后座上。第三人在司机旁边，用一支手枪对准我。汽车飞驰穿过布加勒(Bucharest))寒冷、灰色的街道，拐进一条横路，称为卡利街(Calea Rahova)。然后汽车驾入一道钢门。我听见那道门在身后呼然关闭。

绑架我的是共产党秘密警察，这里是他们的总部。在里面，我的文件、物品、领带和鞋带都被取去。最后他们连我的名字也夺走了。“现在开始，”值班官员说道，“你就是瓦西里·乔治斯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当局甚至不希望看守的狱警知道囚犯的身份，以防泄露国外，因为我在国外也相当出名。他们就是要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卡利街牢房是一所新监狱，我是它的第一个囚犯。但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经历。战争期

间，我曾被希特勒时代统治的法西斯分子逮捕，共产党刚上台后，我又曾经再次被捕。这牢房的墙上高处有一扇小窗户，两张木板床，角落里放着常用的马桶。我坐着等待审讯。我知道他们会问什么问题，我又必须给出什么答案。

我很清楚什么是恐惧，但此刻我没有任何感觉。这次被捕，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祈祷的答案，我希望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新的意义。我不知道有什么奇异的发现正等待着我。

2

我爸爸在家里藏了一本书，建议年轻人如何准备当一名律师、医生、军官等职业。一天，当我五岁左右的时候，爸爸从书架上把这书取下，问我的兄弟们想从事什么职业。当哥哥们做出选择后，父亲转向我这个最小的孩子。“那么你会做什么，理查？”我看着书名《各行各业总向导》，想了想，然后回答说：“我想成为一名总向导。”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其中十四年在狱中度过，我还经常想起这些话。据说我们在生命

的早期就做出了选择。对于我目前的工作，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总向导”更贴合了。

然而，成为一名基督教牧师，远非我当初的念头，也不是我犹太父母的意愿。我九岁时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总是缺钱，而且常常缺面包。曾有一个男人愿意为我买一套衣服，但当我们走进服装店，裁缝拿出了他最好的衣服时，这位好心人却说：

“对一个这样的男孩，这套衣服太好了。”我仍然记得他的声音。我的学业不稳定且乏味，但我们家里有很多书。在我十岁之前，我就读完了所有这些书，并成为了一个像我所崇拜的伏尔泰一样，对万事充满了怀疑。然而宗教总是吸引我。我留心观察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堂的仪式，有一次在犹太教堂里，我看到一个相识的人正在为他生病的女儿祈祷。第二天那女儿就去世了，我问拉比说：“上帝怎么能拒绝如此迫切的祈祷呢？”他没有答案。看到这么多人挨饿受苦，我无法相信有一个全能者的存在，更不相信祂曾经差派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善良和智慧的人到世上来。

随着我的成长，我尽可能地享受快乐。我决心弥补童年错过的快乐。我进入布加勒的商业世界。在我二十五岁时，就已经在一间进出口公司，晋升为管理层。该公司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中饱私囊。于是我就有钱可以在“小巴黎”（当时罗马尼亚首都的

外号)的妓院和夜总会里烧了。我只要满足自己的胃口,其他一概不理。这是一种许多人羡慕的生活,但它却不能满足我内心的空洞。我知道这些娱乐都是假的,我正在糟蹋我里面一些好的东西。虽然我确信没有上帝,但我内心还是希望事实不是如此。我希望在这宇宙中,有一些事物,是值得为之而活的!

一天晚上,我漫步走进一座教堂,加入了一群在圣母雕像前做礼拜的人。我也跟着他们念诵“万岁玛利亚”,但我感到很空虚。我对那尊圣像说:
“真的,你就像石头。这么多人恳求你,你却无能为力。”

结婚后我继续追求其他女人。我也不自问是否诚实。我任意伤害任何人。欺骗、撒谎和享乐就是我的生活。当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早期的匮乏和后来的过度放荡,令我患上结核病(肺癆)。这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医生把我送到了郊外的一家疗养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休息。望着窗外宁静的树林,我开始回顾自己混乱的过去。我害我的母亲哭泣,还有我的妻子,和那幺多无辜的女孩。我引诱、诽谤、讥笑,欺骗,尽是为了玩乐。我躺在那里流泪了。

在那间疗养院里，我第一次祈祷，这是无神论者的祈祷。我这样说：“神啊，我知道你不存在。但如果你果然存在（我否认这一点），那么你就有责任向我显现。我却没有责任寻求你。”

那时我的哲学完全是唯物主义。但我的内心却无法满足。我相信人只是物质，当人死了，就分解成盐和矿物质。然而我失去父亲后，却不能想象爸爸只成了一堆矿物质。留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活生生的爸爸。难道我们的感觉错了？

我心里充满了矛盾。我在喧闹的夜总会里度过了很多时间，但我也喜欢在墓地里孤独地散步——有时是在冬日，坟墓上积着厚厚的雪。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会死，我的坟墓上会下雪，而活着的人会继续欢笑、拥抱和享受生活。我却无法再参与了。我甚至不晓得他们。我将不再存在。不久之后，甚至没有人会记得我了。那么人生有何意义？”

我记得读过，克虏伯（Krupp）凭着制造犀利的杀人武器致富，但他本人却怕死。任何人都不可在他面前提及死亡。他与妻子离婚，因为妻子告诉他有关侄子去世的消息。他拥有了一切，但毫不快乐，因为他知道他的幸福不能持久，他终得放手，任由身体腐烂。

虽然我为文学的兴趣，读过《圣经》，但每当我读到敌人挑战基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的思想就关闭了。耶稣并没有下来，倒真的死了在十架上。这似乎证明祂的敌人说的没错。然而，我的思念依然转向基督，我自己说：“我希望能见到他，与他交谈。”每天我的默想都是这样结束。

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病得很重，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她不知何故听到有关于我，就托人送我一本书关于拉蒂斯邦（Ratisbonne）兄弟的书。这位弟兄创立了一个带领犹太人信主的组织。这令我很感动。我看到有人这么关心我，而我却任意浪费生命。

在疗养院几个月后，我病情稍有好转，就去一个山村疗养，在那里我认识一位老木匠。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本圣经。后来我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圣经：他和他的妻子每天花几个小时为我祈祷。我躺在小屋的沙发上读《新约》。在这些日子，基督对我就像给我送饭的那妇人一样真实。但并不是所有承认基督的人都得救；撒旦也信，但它却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对耶稣说：“你永远不能叫我作你的门徒。我想要的是金钱、旅行、快乐。我已经受够苦了。你的道路是艰难的十字架之路，即使它也是真理之路，我也不要它。”

耶稣的回答就像一个恳求：“跟我来。不要怕十字架。你会发现这是最大的快乐。”

我继续读下去，开始流泪。基督的生活与我相比，他是如此纯洁，我却如此肮脏；他那么无私，我却贪得无厌；他充满爱，我充满恨。面对这种智慧和诚实，我的自信开始崩溃。我就像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在烈日下疲惫不堪地跋涉，终于来到一棵大橡树的荫下。这人就对大树说：“我找到你真是太幸运了。”但橡树却回答：“这不是幸运。我已经等你四百年了。”基督一生都在等待我。现在我们见面了。

3

我的归信基督是在我与萨宾娜结婚六个月

后。萨宾娜是一个漂亮的少女，从未考虑过灵魂的问题。我的信主对她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的童年缺乏太多幸福，如今正要开始补偿她所失去的幸福。当她所爱的男人，她的快乐伴侣，从疗养院回来时，却成了虔诚的信徒，甚至要当牧师。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她一度想自杀。

尽管萨宾娜也愿意跟我去教堂，但她仍然渴望红灯绿酒的生活。于是当她想去某些欢乐场所时，我就陪她去。一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空气中弥漫着烟雾，情侣们互相拥抱着跳舞。众人喝酒多了，谈话也充满暗示。萨宾娜突然对这一切感到厌恶，要求立即回家。我回答说：“我们才来，为什么这么快走？”

于是我们就一直呆到半夜。她再次建议回家，我再次拒绝。只有当我确信她对这整件事感到彻底恶心时，才同意离开。我们来到外边的寒冷空气中，萨宾娜就说：“理查，我要马上去牧师家请他为我施洗，洗去这一切污秽。”

我笑着说：“你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就等到早上吧。让可怜的牧师也睡多一点。”

4

第二天，我的生活大变。以前，我们只追求快乐。如果萨宾娜妨碍了我的享受，我会毫不犹豫地和她离婚。现在我们发现了生活的秘密，不久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名叫米海的儿子。他是上帝赐的礼物。如果他来的早一些，我们很可

能把他堕胎了，免得扰乱我们的快乐。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萨宾娜变得和我一样积极地为基督赢得灵魂。事实上，她赢得了更多。

在我所知道的商界，诚实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当布加勒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史蒂文（Rev George Stevens）邀请我担任秘书时，我们都很高兴接受了。我尽力使用商业的本能。但当我说服一名保险代理人接受贿赂，放弃对教会索赔时，麻烦就出现。令我惊讶的是，史蒂文先生似乎不理解我的安排。

他问，“但是，哪一方正确呢？是保险公司还是我们？”

我说是保险公司。

“那么我们就必须赔，”他说，于是就结束在我看来是有利的交易。

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波兰，罗马尼亚和英国断交，英国神职人员全部必须回国。教会无人料理，我便试图继续维持。

萨宾娜和我已经放弃了大部分以前的朋友，我们的许多新朋友都是我们带领信主的人：他们已经是教会成员。我自学传教，并在仔细考虑罗马尼亚各

个敌对的教派后，选择了信义派（路德派）。后来我也被任命为信义会牧师。

我国人口有五分之四属于东正教。这一派过于注重仪式。天主教也是。在一个复活节周日，我参加一间天主教的礼拜。他们使用拉丁话，进行一切仪式。直到主教的政治演讲后，我便离开了。直到那时，他们还没有用我们的通用语言（罗马尼亚语）提到基督的复活。

于是我便选择仪式简单的新教（复原宗，或更正派）之一，信义派。因为更正派把讲道作为崇拜聚会的中心。人们可以在听道中获得心灵的粮食。还有，尽管没有他的伟大，我也感到自己与马丁·路德相似。他是一个脾气暴躁、好争吵的人，但他那么爱耶稣，以至他相信，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心。（路德的性格有缺陷，于是在行为上有什么好的表现。）于是我成了一名信义教徒。

在罗马尼亚，成为一名信义会成员，意味受国家管制，有时还会与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一起受迫害。（在共产党接管之前，东正教常与政府联手打压各小派系。）

过去我对牧师神父，常存异心，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问我是否“得救”的神职人员。如今正好相

反。我最留意的就是众人是否得救。虽然我没有牧师的服装，但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我总是感到信主的人太少。我的口袋里总是放着一份我会众的名单，我在公共汽车和候车室里拿出它，问自己每个人在那个特定时刻在做什么。如果其中一个跌倒了，我就会陷入沮丧几个小时。信徒的冷淡可以给我带来痛苦，就如身上的痛苦一样真实，我不得不求神移开这种负担，不然就活不下去。

5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Stalin, = 史达林）向希特勒提供经济援助，瓜分东欧。我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被俄罗斯、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切分了。纳粹的影响，助长了我国的铁卫队，其成员试图利用东正教进行政治恐怖主义。

在暗杀他们的主要对手卡利总理（Calinescu）的前一天晚上，九名狂热分子在教堂守夜。他们躺在教堂的地板上，身体形成一个十字架。此后，铁卫队就帮助希特勒的傀儡安东尼将军（Ion Antonescu）夺取了政权。卡罗尔国王（Carol）被迫退位，让位

给他年幼的儿子米迦勒(Michael)，安东尼就押天子而令诸侯，进行他的独裁统治。

现在铁卫队可以任意对付犹太人、共产党和新教徒。随处可能被谋杀。我们的宣道会被指控为叛国机构（当时英国与德国是敌对国）。我每天都收到恐吓。一个周日，当我在讲坛上讲道时，我看到一群身穿绿色军服的铁卫队手持左轮手枪悄悄地进入教堂。面对祭坛的会众没有意识到这批人。我想，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讲道，那么必须讲的好。因此，我选择谈及耶稣的手。这双圣手曾擦干人的眼泪，扶起孩子，喂饱饥饿的人。祂又医治病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祂升天之前祝福了门徒。然后我高声音喊道：

“但是你们！你们的手做了什么？”

会众都惊讶。他们的手正在拿着祈祷书。

我怒吼道：“你们在杀害、殴打、折磨无辜的人。你们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吗？你们这些罪人，洗净你们的手！”

铁卫们很生气，但并没有中断我们的礼拜。当我为会众作散会的祝福时，士兵们都拿着枪站在后面。当大多数会友们安全离开后，我走到窗帘后面。我听到有人奔跑和喊叫：“魏恩波在哪里？抓

捕他！”我就打开了讲坛后面的暗门，进入秘密的通道，把门在身后锁了，穿过蜿蜒的走廊，到了一条小街，安全逃脱。这密门是多年前建立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我国许多基督教小宗派——列如安息日会、浸信会、五旬节派——也被屠杀或与犹太人一起被赶到集中营去。我妻子的全家都被带走了；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我曾三次被法西斯（铁卫队）逮捕——审讯、殴打和监禁。因此，我对共产党的逮捕也有了充分的准备。

6

从卡利街牢房的铁条小窗，我可以看到院子的一角。当我观看时，一位神父被带进了大门。他迅速穿过柏油路，穿过一扇门。这一个告密者，来报告他的会众的情况。

我知道我面临着无休止的问话、虐待，可能监禁多年，死亡，我不晓得我的信仰是否足够坚强。我当时记得圣经里写了366次“不要怕！”而这天正是2月29日。

当局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共产监狱就如信息的

档案室，在需要某种资讯时，便押出一名相关的囚徒，进行拷问。在我被监禁的十四年半里，我被拷问了无数次。共党认为我与西方教会宣教机构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联系是叛国行为，但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未曾晓得的，必须从我索取。

正如一名和平时期的士兵为战争的艰辛做好准备一样，我也为自己做好了入狱和酷刑的准备。我的文本是过去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曾面临着类似的磨难。我正在思想如何善用他们的经验。许多忽视这样做的人最终被痛苦压垮，或者被敌人欺骗而背叛了同胞。

问话官总是告诉牧师：“作为一名基督徒，你的责任是告诉我们全部真相。”就我而言，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我都会被定罪，我就决定在酷刑下我可能会自认有罪，但决不会透露帮助我传福音的朋友的身份。所以我打算让审讯者在调查结束时，比开始时更加困惑；我会完全误导他们。

我的首要任务是警告我的同事，并让妻子知道我在哪里。我说服了一位狱警作为传话人，因为当时我家还有些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因传递信息而收到了大约 1500 美元。然后我们的一切都被当局充公了。

这位狱警也带来消息说，瑞典大使对我的失踪提出抗议，说我在瑞典，挪威和英国有很多支持者

。我国的女强人，外交部长安娜（Ana Pauker）回答说，她只晓得我不久前已经秘密离开罗马尼亚，以后就没有我的消息了。

7

作为一个中立国，瑞典大使很难进一步追究此事，尤其是对这位带有犹太血缘的安娜。连男子汉在她面前也感到畏惧。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父亲，一位名叫拉比诺维奇（Rabinovici）的牧职人员。他悲伤地告诉我说，“安娜心里对犹太人完全没有感情。”她曾学医，后来在英国教会宣道会里担任教师，以后就投身共产主义，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马塞尔·鲍克（Marcel Pauker）的工程师。马塞尔与她观点相同。两人都因图谋反政府而下狱。但安娜比丈夫更狂热。三十年代，她去了莫斯科，马塞尔也跟着去了，但没有那么热烈。在斯大林的一次战前的清党中，马塞尔被处决了——有传言说，是被他的妻子亲手枪杀的——很少人怀疑这个故事。安娜作为苏联公民在莫斯科渡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并在红军中担任军官。战后，她在1947年返国担任外交部长。

她对俄罗斯极为忠诚。有一天，有人问她为什

么撑着雨伞走过布城时，她回答道：“你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吗？莫斯科正在下大雨。”

在年轻的米迦勒国王与的一群政治领导人，勇敢地废黜了独裁者安东尼将军，并结束了与德国的同盟关系后，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决定战后世界的形态。丘吉尔问斯大林：“如果我们在希腊拥有九成的发言权，你也在罗马尼亚有九成主导权，如何？”他把这些话写在一张纸上。斯大林停了一下，然后用蓝色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勾，就传了回去。

一百万苏俄军队涌入罗马尼亚。这就是我们的新“盟友”。

“俄罗斯人来了！”对于东欧人民，这不是笑话。俄罗斯人在四十年共产统治下，已经变成野兽一般。他们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酗酒和蹂躏“资本主义剥削者”。数以千计的妇女，不计年龄，都被苏军强暴。男人们在街上被抢走自行车和手表等新奇物品。当红军秩序被整肃（枪杀整肃），商店重新开门时，这些占领军对陈列的商品感到惊讶，尤其是当他们得知顾客大部分是农民和工厂工人时。

罗马尼亚于 1944 年 8 月 23 日宣布向俄罗斯投降，至今仍每年庆祝该国获得“解放”的日子。事实上，这是我国被剥夺的开始。我国的全部海军、大部分商船、一半的机械和所有的汽车都被俄

罗斯夺去。我们的农产品、马、牛、矿产，所有的石油和汽油库存也被运往俄罗斯。曾经被誉为“欧洲粮仓”的罗马尼亚很快就变成饥荒地区。

8

我信主的那一天，我曾祈祷：“上帝，我曾是一个无神论者。现在让我去俄罗斯，在无神论者中间做传教士。即使我会因此被捕，死在监狱中，也不抱怨。”但上帝并不必我远道前往俄罗斯，倒是打发俄罗斯人到我国来。

战争期间，尽管遭受迫害，我们宣道会的成员却大大增加，在过去欺负犹太人或为难新教徒的人，如今有多人悔改，与我们犹太基督徒一同敬拜主。

战后，我继续为西方宣道会工作。我有一间办公室、设备、秘书——这些是我秘密传道活动的“门面”。

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街上、商店和火车上与苏联士兵交谈很容易。由于我没有戴牧师的项圈，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普通公民。许多红军，尤其是年轻的一辈，都很想家。他们很高兴获得一个友

好家庭的接纳，或带他们去参观布加勒（Bucharest, 首都）的景点。我得到了许多懂俄语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利用地下出版社，用俄语出版了福音书。三年内，我们分发了超过十万本书籍到咖啡馆、酒吧、公园、火车站——只要是有俄罗斯人的地方。其中许多本已经被传阅多次，以致破烂。虽然我们的很多帮手最终被捕，但没有人出卖我。

我们不仅对获救的人数感到惊讶，而且稀奇它们的自然性。俄罗斯人对宗教一无所知，但他们的潜意识似乎正在寻求真理，并欢喜发现。这些红军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民，他们曾在阳光下和雨中工作，播种和收获。他们从骨子里知道，自然界必然有一个主宰。但由于他们是在无神论中长大的，所以确信自己是无神论者，就像许多人相信自己基督徒，实际上却不是。

我在火车旅行中遇到了一位来自外西伯利亚的年轻画家。就向他讲述了基督。“现在我明白了，”他说。“在这之前，我只知道老师们在学校教给我们的东西——宗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有。但我曾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古老墓地散步，有一天，我在坟墓中发现了一栋废弃的小房子（我知道这是墓地的东正教小教堂。）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份画工精美的成品。起初我想，‘这人肯定是一个可怕的罪犯，所以受到这种

惩罚。’但如果他是一个罪犯，为什么他的画像会放在尊荣的位置——仿佛马克思或列宁？我想他们肯定是首先以为他是罪犯，但后来发现他是无辜的，所以深自后悔，就画出了他的形象。”

我告诉这画家，他已经了解了一半真相，几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已经知道了我能告诉他的关于耶稣的一切。当我们分开时，他说：“我今晚打算偷点东西，人人都这样做。现在我怎么能呢？我已经相信基督。”

9

我们也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工作。每一本我们打算出版的书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查。因此，我们就在封面展示马克思的照片，开头的几页也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反对宗教的论点。审查员马上就通过了这本书，没有意识到它的其余部分都是基督教的思想。审查员也还喜欢我们的另一本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听起来很符合马克思的真理。面对成堆的新旧书籍需要检查，他只选择了令人安心的书名。有时，审查员会通过任何书，只要能换取一瓶白兰地。

现在，一张党卡可能意味着吃饭和挨饿的差别

，罗马尼亚共产党员马上从几千人增加到几百万。为了再欺骗西方一段时间，斯大林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他的“统一战线”政府，并以“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扎（Groza）为领袖。据说安娜就是格罗扎的“发明者”。俄罗斯人通过三名罗马尼亚共党老同志操控我国：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被任命为正义部长；乔治（Teohari Georgescu）担任内政部长，接管了警察和“安全”部门；德伊（Gheorghe Gheorghiu-Dej）是一位强硬的铁路工人，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在共产掌权后不久，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东正教神父会议，德伊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身材矮胖，性格开朗。他向大家保证，他准备好“宽恕并忘记”。尽管教会在过去与（镇压共产党的）铁卫队和其他右翼组织有联系，但如今的共产政府还是将继续支付教职人员的工资。他总结说，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理念其实相似。众人都热烈喝彩。

在非正式场合，德伊坦率地表达了他的无神论，并相信共产主义有一天会主宰世界。但他也可以宽容地谈论他的老母亲。他母亲把圣像充满了他的家，又把德伊的女儿们都抚养成东正教信徒。在旧政权的监狱里度过的十一年期间，德吉有机会学习圣经，并与许多坐牢的基督徒交谈，他对他们表示同情。在俄罗斯人到达之前，他从监狱里逃出来

，如果没有一位友好的神父的庇护，他可能已经被独裁者安东尼抓捕并杀害。但如果说宗教在德伊奋斗的日子里曾给他影响，如今他辉煌鹏达，无暇理会宗教了。他抛弃了久候他的发妻，取了一位金发女明星。他的屋子里挤满了仆人和请愿者。如今德伊富有又出名，没有心情听任何人的意见了。

在神父的会议上，有人把话题引向神时，德伊用标准的党论来回答。他向我们保证，在新的罗马尼亚，我们都将拥有完全的良心自由。作为回报，众牧者承诺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麻烦。我听了，便知道这意味甚么。许多神父在那次会议上力挺共产党，拥护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迟早会触犯了一些党章，于是就锒铛入狱。

破坏宗教的运动迅速发展。所有教会资金和财产都被国有化。共产党的异端派部门完全控制了神职人员。他们支付薪水并任命牧师。共党安排年迈的东正教牧长尼科丁（Nicodim）为东正教牧长，作为党方的傀儡。但他们需要一个更能干，可以跑上跑下的工具。德吉晓得何人适合这个位置：就是一年前保护他免受法西斯分子伤害的神父。于是，查士丁（Justinian Marina）神父，一位来自黎明神学院（Rimincul-Vilcea）无闻教师，就被任命为主教，很快的，罗马尼亚所有一千四百万东正教信徒都知道查士丁就是他们的实权牧首，虽然名分在尼科丁之下。

共党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挑拨罗马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这两派总人数有二百五十万。希腊天主教徒，通常称为统一派（Uniates，）在保留许多自己的传统（包括牧师结婚的权利）的同时，也接受教皇的至高无上。现在这两派都被政府接管，强行与顺服共产党的东正教“合并”。大多数反对这种强行合并的神父和主教们都被逮捕，他们的教区被废除，财产充公。党方又命令罗马天主教徒与梵蒂冈决裂，但天主教徒们断然拒绝，于是大受打压。随着神父们挤满监狱，他们所受待遇的可怕故事在全国各地传播，各小派系的信徒只能无奈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10

我们不必等太久。那一天的到来，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 1945 年，党方召开了一次异端大会。全国有四千名神职人员代表出席。当党方宣布斯大林同志（他的巨大肖像挂在墙上）为代表大会的赞助人时，主教、神父、牧师、拉比和阿訇（回教教师）们都鼓掌——他们宁愿忘记斯大林同时也是世界无神论联合会的主席。年老体弱的牧首尼科丁祝福大会，格罗扎总理宣布大会开幕。格罗扎告诉我们，他本人就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慷慨的许

多承诺获得大众的欢呼。

一位最有权势的东正教主教随后宣称，过去许多政治小溪——绿色、蓝色、三色——已流入他教会（东正派）的大河，他也欢迎红色小溪加入其中。加尔文派、路德派、首席拉比等依次起身发言。大家都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直到我身边的妻子再也无法忍受。她说：“上去把基督脸上的耻辱除去！”

“如果我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丈夫。”我回答道。

“我不需要一个胆小鬼丈夫，”萨宾娜说。

我就请求允许发言。当局立即邀请我上台：他们期待第二天发表一篇来自瑞典宣道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魏恩波牧师的贺词。

我首先简要介绍了共产主义。我说，作为牧者，我们的责任是荣耀上帝和基督，而不是短暂的世上权力。我们支持基督永恒的爱之国，不是今世的权贵。当我继续讲下去时，那些坐了几个小时的，不断听到谎言的神父们，似乎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有人开始鼓掌。紧张而约束的气氛瞬间破灭，大厅里响起一波又一波的掌声，代表们起立欢呼。异端部长，一位名叫布尔杜（Burducea）的前东正教神父，曾是一名活跃的法西斯分子，他在讲台上大喊，撤销我的发言权。我回答说我有来自上帝的权利。最终，有人切断麦克风，但此时大厅里已经是一片

喧闹，没有人能听到甚么了。

当天的大会就这样结束。我得知异端部打算取消我的牧师执照。有人建议我寻求有影响力的当选主教（查士丁 Justini）的帮助。经过几次尝试，我终于会见到他。那时他刚刚光荣地访问了莫斯科归来。黑胡子，微笑，充满了他新的尊严，但不是一个傻瓜。他掌握罗马尼亚五分之四的上教堂人口，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如更好地利用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谈及他的灵魂，而不是谈论我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说，自从他升职以来，我一直在为他祈祷。管辖 1400 万灵魂确实是一项可怕的重担。他一定像圣伊利纽（St Ireneus）一样，当人们违背他的意愿，任命他为主教时，他哭着说：“孩子们，你们正在做什么——我怎能担当这种担子？经上说，主教必须是义人。”

我说话时，他很少说话，但我走后，他却在朋友中打听我的情况。于是在那时，就不再有人谈及吊销我的执照了。后来，当我被警方扣押六周受拷问时，查士丁是帮助我获释的人之一。后来，他又邀请我去他主教辖区的雅西，在那里我们变得友好。他对圣经的无知令人惊讶，但当我提醒他浪子的比喻时，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握住他的手，说上帝欢迎所有迷失的人回来，包括主教。除了我，其他基督徒也尽其所能的影响查士丁。当共党不顾他的感受，全面反宗教时，他已经开始了祈祷和爱

神。如今我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反神的运动与消灭反对党的行动，齐头并进。当斯大林从战时盟友那里，获得一切他想要的好处后，就脱去友好与民主的面具。在 1947 年 10 月 30 日，罗马尼亚伟大的农民领袖马纽（Iuliu Maniu）与另外 18 人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审。马纽在 75 岁时被判处十年监禁——他在四年后死在狱中。在随后的恐怖统治中，估计约有六千名“国家敌人”被处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持这次大规模清洗的是正义部长、四十七岁的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他曾在战前得到了马纽的大力帮助。当时马纽也知道帕特拉是共产党。当时这二人还与米迦勒国王一起制定了停战协定。帕特拉随后以罗马尼亚的名义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马纽被监禁后，帕特拉和其他共党领导人就迫使我们敬爱的年轻国王退位。

然后就是人民共和国（共产国）的成立。但谁来领导呢？当然不是木偶格罗扎。安娜（Ana Pauker）甚至在共党内也遭到憎恶。帕特拉的许多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将带领国家摆脱极端的斯大林主义。他是一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西方”式共产党。他总说自己先是罗马尼亚人，然后才是红色分子，所以人人都看好他。谁当老大，当时就成为党中央的热议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作为牧师的生活一直很满足。我得到会友们的信任和爱，又有我家人所需的一切。但我心里并不平静。为什么我还可以正常作息，其他人却为信仰受苦？在很多个夜晚，萨宾娜和我一起祈祷，求上帝让我们也背负十字架。

11

当时正在进行的广范围捕中，我的被捕可以看作神垂听了我的祈祷。我唯一没想到的是，与我一同坐牢的，就是帕特拉同志。

我被关在达卡利监狱几天后，我的房间的门突然打开，这位高大、鹰眼的正义部长就进来。我心中诧异，以为他是亲自来审问我。为什么我如此荣幸？然后门在他身后锁上了。更奇怪的是，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没有领带。我低头看他擦得锃亮的鞋子——没有鞋带！我的全新牢房里的第二名囚犯正是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人。

帕特拉在另一张木板床上坐下，把脚抬起来。作为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他不会让这种忽然从部长变成囚犯的小事影响他的心境。我们裹着大衣抵御三月的寒冷，开始交谈。尽管我知道帕特拉的政权已经粉碎了罗马尼亚的司法公正，但我还是可以

喜欢他的个人，并相信他的诚意。他耸耸肩，轻轻带过自己的被捕。这远不是他第一次入狱，他曾多次被罗马尼亚前政府逮捕。这次的下牢，似乎是因为他日益高涨的声望，令他党内的各领袖联合起来反对他。在几天前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自己的同事、内政部长乔治指责为资产阶级。第二项指控是说帕特拉“可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资助”，这一指控得到了财政部长卢卡（Vasile Luca）的支持（这卢卡还是过去曾经与帕特拉一同坐牢的同志。）安娜就总结这些指控。

帕特拉说，他们密谋反对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有一个特别的事件令他饱受攻击。他曾询问乔治的一位官员，有关囚犯遭受酷刑的传言是否属实。那位官员回答，当然是呀！那些是反革命分子！不值得怜悯！特别是当他们隐瞒信息时！帕特拉深感不安。他问道，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叫共产党得权，就是为了这个？有人就把他的话报告给乔治。

“当我离开大厅时，”他说，“我看到一位新司机在车旁等候。这司机说我的司机病了。我刚上车，两名秘密警察跟着我进来，送我到这里。”

他确信他很快就会恢复自由，当晚饭到来时，我开始想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的晚餐不是通常的一碗水煮大麦，而是鸡肉、奶酪、水果和一瓶霍克啤酒。帕特拉拿起一杯酒，就把托盘推到我面前，

说他没有胃口。

当我尽量不吃得太狼吞虎咽时，他讲了一些有趣的轶事。其中一个提到一位瑞士参议员想担任海军部长。

“但我们没有海军呀？”总理说。

“这有什么关系？”那位参议员回答说，“如果罗马尼亚可以有一位正义部长，为什么瑞士不能有一位海军部长呢？”

帕特拉说了就大笑，尽管他笑的就是自己创造的“正义”，而他自己如今也成了这种正义的受害人。

第二天早上，帕特拉被护送出牢房，我想应该是接受审讯。晚上他脾气暴躁地回来说，他不是出去回答问题，而是去发表演讲，就是在他过去教授法律的大学。党方希望暂时对他的逮捕保密，而他，虽然有三十年的共产党纪律，还是必须服从他们。他甚至不能向妻子透露他正在“接受检查”，或者询问任何人的建议（就如请一位律师，）因为在共产党，这些都是严重违反党方的纪律。这种孤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精神不宁。他只能向我诉说。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我再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当帕特拉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早年的生活时，我很感兴趣地了解到，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不是由于客观的判断，而是因为早期的困境。如今是

他对过去困苦光景的反击。他富有的罗马尼亚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热烈支持德国，以至于在盟军胜利后，全家人都遭到本国人的排斥。年轻的帕特拉不得不出国，到德国接受大学教育。当他回国后，只能加入唯一欢迎他的政党（共产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共产党员，死于上世纪末的斯大林清洗中。他再婚另一名女共产党，这女士恰好是萨宾娜的同学。

我试图给帕特拉看见他信念的真源头。“你也像马克思和列宁，”我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是早期苦难的结果。马克思感到自己有天才，但作为德国的犹太人，反犹太主义猖獗，除了成为一名革命者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出路。列宁的兄弟因企图刺杀皇帝而被绞死——愤怒和沮丧使他想要推翻当权者。你的情况也相似。”

帕特拉驳回了这个想法。他的神经在与我争论和对教会邪恶的长篇大论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博吉亚教皇（Borgia Popes）的邪恶日子、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的野蛮行径、伽利略的迫害，都逐个提及。

“但正是教会的罪行和错误让我们更加钦佩教会，”我说。

帕特拉不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医院可能散发着脓血的臭味；这就是它的美丽之处，因为它接收患有溃烂疮和可怕疾病

的病人。教会是基督的医院。数以百万计的病人在教会中得到爱的治疗。教会接纳罪人；当这些罪人继续犯罪时，教会就因他们的过犯而受指责。另一方面，教会也像一位母亲，即使在孩子们犯罪时，这母亲还是站在他们身边。教会的牧职人员玩弄政治和个人的偏见，扭曲了神的道。但这只令人加倍钦佩教会。”

帕特拉微笑回答：“我也可以对共产主义做出相同的辩护。它的实践者并不完美——其中有无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论有任何问题。”

“那么就从它们的果子来判断，”我说，“就像耶稣建议的。可悲的行为玷污了教会的历史，但教会依然培养了无数的圣徒。教会又有至圣的基督为首。你们的首领是谁？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利亚沙称他为酒徒。列宁的妻子说她丈夫是一个无节制的赌徒。这两人的作品充满了恶毒。共产主义杀害了百万名的无辜的人，叫国家破产，把恐惧与谎言充满社会。它的好处在哪里？”

帕特拉捍卫“共党学说的逻辑”。

我说过这样的论调毫无意义。“你可以用礼貌的名义干许多坏事。希特勒谈到了为生存空间而奋斗，就进行种族灭绝。斯大林说，“我们必须照顾人，就如照顾花朵。”然后就杀了他的妻子，还有你的妻子。”

帕特拉看起来很不舒服。但他坦言，“我们的

长远目标是共产世界，愿意和我们同行的人很少，但我们总能找到一些为自己利益，暂时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首先是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和国王，他们支持盟军（意即苏联）对抗纳粹。当纳粹倒台后，我们就摧毁他们。我们用承诺赢得了东正教的支持，然后利用较小的教派来破坏它。我们让农民反对地主，然后利用贫农反对富农，再后把贫农都集体化。这些是列宁的策略，而且有效。”

我说：“大家都知道，与你们的同行的人，最后都被你们监禁、处决或摧毁。你们怎么能希望可以继续利用人，又抛弃他们呢？”

帕特拉笑道：“因为人们很愚蠢。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伟大的布尔甚（Bolshevist，共产党前身）思想家布哈林（Bukharin）反对托洛斯基（Trotsky）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的计划。他认为最好等资本主义国家自相残杀；然后俄罗斯就可以加入获胜的一方，分享战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只是无人理会。如果西方知道一半的欧洲和三分之二的亚洲将成为共产国，上一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幸运的是，我们的敌人不曾听过我们的论点，也未曾读过我们的书。”

我指出了他的论点的缺口。“难道你看不到，正如你利用了别人，然后又把别人抛弃；你的同志们照样对待你。你真的看不到列宁学说的邪恶吗？”

”

这次，帕特拉内心的苦毒涌现了。他说：“当丹东（Danton）被送上断头台，看到罗伯斯比利（Robespierre）在台上观看时，他喊道，‘你要跟我走！’我向你保证，他们也会跟我走——安娜、乔治和卢卡。”

三年后，这话果然应验。

12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说话，但晚上十时，我们正要上床睡觉时，门开了，守卫叫我的新名。外面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位，我后来知道他叫阿佩尔（Appel），命令我穿好衣服。这时帕特拉低声叫我穿上他的大衣，说可以减轻打击。他们给我戴上黑眼罩，然后带我走过廊道，来到一个房间，就把我推到一张椅子上，取去眼罩。

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桌前，刺眼的光线照着我。起初我只看到对面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但当我习惯了眩光后，我认出了这人影，就是莫拉（Moravetz）。在前朝的反共政府，他曾是当局的一名警长（inspector），因为向共产党泄露秘密而陷入麻烦。如今共产党报答他，让他成为共产监

狱的一名审讯员。

“啊，”他说，“瓦西里·乔治斯库。那张桌子上有纸笔。坐下来写下你的活动和生活。”

我问他对哪一些活动特别感到兴趣。莫拉挑起眉毛，讽刺道：“作为一名神父，你听过许多人的忏悔。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叫你向我们忏悔。写你的忏悔！”

我就写下了我信主之前的生活大纲。然后，我想一句话可能会引起党的领导的注意并产生一些影响，就详细介绍自己：起初我就如他们，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我如何看见真相。我写了一个多小时。莫拉接过这些报告说：“今晚够了。”我被带回牢房。我看见帕特拉已经睡着了。

过后的几天，我并没有受到干扰。共产党人扭转了正常的警察方法，即依靠逮捕的震惊来让囚犯说话。共产党宁愿让被逮捕的人“成熟”。审讯者从不说出他想要什么；他只是围着他的猎物打转，制造焦虑和内疚。当这个人为被捕的原因天天疑虑时，当局又使用其他伎俩营造紧张：不断的推迟审判，给你听到行刑队的枪杀声（其实是录音声），其他囚犯的尖叫声。被囚的人就会开始做出错误的判断。一次失误导致另一次失误，直到精疲力竭，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审讯者就开始表示同情。他建议囚犯只需承认自己有罪，该受处罚，并说出一切，就可以结束痛苦。几天后，阿佩尔又来，开始一连

串的审讯。

这次，阿佩尔把我带到了距离牢房外的地下室，他给了我一把椅子，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块焦糖给我，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他的一位同事做了笔记。阿佩尔嚼着焦糖，检查了我的自我陈述。他评论说一个人的思想是由他的阶级决定的。由于我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说我必然有反动（就是反共）的观点。我确信阿佩尔也不是无产阶级，因此我指出，伟大的共产党思想家们，都不是道地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是律师的儿子，恩格斯的父亲是有产者，列宁出身于贵族。单是阶级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信念。

阿佩尔突然打断说，“你和特奥多先生（Teodorescu）有什么关系？”

“特奥多？”我说。“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名字。你指的是哪一个？”

但阿佩尔却不回答。相反的，他转向圣经并讨论以赛亚关于弥赛亚到来的预言。他时不时地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提到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曾帮助我向苏联士兵分发我的书，或帮助《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处理救援事宜。这些问题显然是预先设定的。阿佩尔总是彬彬有礼，从不固执。他似乎正在留意我对突然问题的反应。至于我的答案，他其实不那么看重。过了一个小时，我就被带回牢房，思考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帕特拉躺在床上，抽着特权囚犯的香烟，谈论党在罗马尼亚根除基督教的计划，引以为乐。安娜、乔治和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已经秘密会见了查士丁，并认为他正是实行他们计划的适当人选。

他说：“查士丁与上帝的‘密切’关系就像我与日本天皇一样‘密切’。至于老主教尼科丁，他已经是老年懵懂了。你能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尊重吗？他在战争开始时发布通谕，呼吁每个人与布尔甚（共产党前身）这七头龙作战；然后，当我国罗马尼亚与希特勒决裂时，他又敦促他的羊群与光荣的红军一起前进，反对纳粹恶魔。这就是尼科丁教首所做的，全国都知道。这些都是教会的顶尖首领，其余的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不会带你走多远的。”

我回答说，如果他没有如他所想的那么快出狱，他可能会遇到更多模范的基督徒。

“尼科丁主教是个好人，”我说，“只是年老疲惫了。至于查士丁，我也不能谴责。他是被你们利用了。这太像利用了一个少女，然后就称她为妓女。”

我认为这个挖苦更能给帕特拉看到真相。他常

直言不讳地谈论性问题。我也试图告诉他基督教的爱。起初，他太专注于自己的烦恼，没有听太多。但他是个书呆子，如今无书可读，不知所措，于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争论。对于宗教，他说：“我在学校已经晓得那一切。我曾经祈祷过，但后来放弃了。你们的耶稣要求太多了。尤其是当一个人还年轻的时候。”

我说：“我未曾想过耶稣向谁要求什么。当我儿子米海还小的时候，我给他钱，好给我买生日礼物。耶稣也给我们圣经的美德，就是祂似乎向我们要求的美德，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但也许你没有好的宗教老师。”

“大概是吧。这样的老师不太常见。此外，基督教中有很多东西我无法接受——谦卑，尤其是对暴政的屈服。以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为例。它说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必须遵守规矩，及时纳税，维护和平——在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尼禄的时代！”

我说：“再读一遍圣经，你就会发现它充满了革命的火焰。圣经故事始于犹太奴隶反抗法老。然后是其他反抗暴政的撒母耳、雅亿、耶户等人。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问问自己，神所认可的权柄是如何掌权的。这些政权常是推翻前期腐败政权的结果；因此，服从权威就意味着服从那些革命成功的人。华盛顿因推翻英国人而出名。”

“也如列宁推翻了沙皇，”帕特拉插话道。

“那不同。列宁的革命，只带来更严重的恐怖。必需有人推翻共产主义暴政，带来自由政府，然后他的政权才是神的权柄，可以成为我们该服从的政府。圣经这个教导，不是屈服暴君，而是避免在无用的革命中白白流血。”

帕特拉说：“你又怎样解释‘凯撒的物归凯撒’？耶稣肯定是敦促犹太人屈服于罗马暴君？”

“第一位凯撒就是一个篡位者，”我说，“即使在罗马，朱利亚凯撒也不是合法的皇帝。他是一位将军，却自诩为独裁者。他的继任者在巴勒斯坦（罗马帝国通过武力占领巴勒斯坦）应得的权利并不比俄罗斯人在罗马尼亚多。所以明显的，耶稣的意思是，‘把我们欠凯撒的东西还给他，就是给他的屁股加上一脚，把他踢出去。’”我把没系鞋带的鞋子射了出去。

帕特拉拾起鞋子，哈哈大笑。“如果每个牧师都像你一样解释圣经，我们就更能理解，”他说。

我不太确定。

一天晚上，他请我概括基督教的信仰。我背诵了《尼西亚信经》。我说：“那么共产信的到底是什么？”

帕特拉想了一会儿。“我们共产党人相信我们将统治世界，”他说罢，就平躺在肮脏的垫子上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带出了牢房。我再也没见过他。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一周里，我们变得非常接近。我觉得他被我所说的很多话所感动，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符合他当前的利益。连对自己承认也难。多年后，我才听到他的情况。

14

我的下一位审判官是一个名叫瓦西鲁（Vasilu）的小个子男人，他喜欢用咀角说话，他读着打印出来的问题清单。第一条也是最难的：“写下你认识的每个人的名字、你在哪里遇见他们以及你与他们的关系。”我想掩护的朋友很多，但如果我不提他们，而警察知道 I 认识这些人，就会加倍怀疑他们。当我犹豫时，瓦西鲁厉声说道：“别挑挑拣拣。我说的是‘所有人。’”

首先，我写下了我的教会助理们和教友们的名字。这份清单占了一两页。然后就是共产党议员以及我能想到的每一位同行者和线人。

“第二个问题，”瓦西鲁说，“你对国家犯下的罪行。”

“我被指控什么？”我问。

瓦西鲁拍了拍桌子。“你知道你做了什么！都说出来！首先，你与东正教同事格里戈神父（Grigoriu）的接触，以及你对他的看法。写吧，继续写。”

共产党总是问神职人员彼此的情况——他们问新教徒有关于东正教神父，又问天主教徒有关安息日会员等，从而引发宗派仇恨。无论你写什么，以后都可能被用来陷害你。他们会对一个囚犯说：“用你的外号签名；这就是我们这里做事的方式。”当这囚犯以不同的名，发表多次言论后，他们就要求他举报一位朋友，并警告说，如果他拒绝，他的各篇报告就会公开，人们就看到他曾使用假名，证实他是一个变色龙，值得怀疑。这种威胁就足以吓倒许多基督徒，于是就向当局投降，成为当局的真走狗，真细作。

在审讯之间漫长而孤独的等待中，党方就想出新的问题，你试图记住你从前说过的话，以及你隐瞒的内容。问话官通常是二人同时拷问，并有印好的问题。如果其中一人出去了，另一个就不说话，直到他的同伴回来；房间里可能有录音设备。在早期，一些问话官还有些人性，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有一次，一位问话官在同伴离开房间，给我展示了针对我的指控。有几份是我信任的人签名的，我可以想象他们受到的压力。

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第一阶段。囚犯数量巨大，而合格的问话官却很少；但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接受苏联的培训。至少，我有时间做好准备。有一次，当理发师在给我刮胡子时，他低声对我说萨宾娜很好，并继续教会工作时。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曾担心她被捕，以致我们的儿子米海挨饿或必须依靠邻居的施舍。这好消息给我内里有力量，于是就好好的按照问话官的喜好，给他们大量的精神

粮食。至于有关教会的机密，或闲事，我就尽量少说。一位朋友曾经出国欧美。如果这种小事给共产党晓得，就可以导致他的家人被捕，并令他本人惨遭痛打。

于是问话持续了一月又一月。共产党为了把共产主义培植在一个人的心中，首先必需叫那人确信自己犯了罪。只有在一个人完全降服，相信自己完全在党方的无限权力之下，方才可能成为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罗马尼亚，人人都提到四种自动化“auto”：第一种是自我批判(auto-criticism，也称短自控书)，就是定期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完成的；第二和第三是自动车(auto-mobile)把你带往见秘密警察，要你写自传(auto-biography。也称为长自控书)，最后便是autopsy(解剖尸体，就是尸检，意即处决。)

15

知道酷刑即将来临，我决定自杀，免得伤害了别人。我没有任何道德的顾虑：对基督徒，死亡意味着回归基督。我会向主耶稣解释，祂肯定明白。如果圣厄休拉(Ursula)因自杀而被封为圣徒(她坚持不容洗劫她修道院的野蛮人强暴她，)那么我保护朋友的责任也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但我如何才能自杀？警卫定期检查囚犯，也检查牢房，找出一切可能致命的东西：包括玻璃片、绳子、剃刀片等。一天早上，在医生查房时，我说我不能记得审讯人员要求的所有细节，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星期难以入眠了。医生就每晚给我一片安眠药，每次都有一名警卫盯着我的咀，确保我吞下了药。其实我把药丸藏在舌下，等他离开后才把它拿出来。但我该把这奖品藏在哪儿？不能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随时可能被暴打或搜查。它也不能藏在我的被褥，它必须每天摇晃和折叠。但帕特拉的被褥还在。我就撕开那被褥的几根稻草杆，每天在里面藏一颗药丸。

到月底我已经积蓄了三十块。它们是对我一种安慰，叫我不必惧怕自己在酷刑下崩溃，但每逢想到它们，我就感到一阵黑暗。那时是夏天。我听到外面世界传来熟悉的声音。一个女孩在唱歌。一辆机车在轨道上占压而过。母亲们喊着自己的儿子：“斯威！艾米！马缇！”羽毛状的草种子轻轻地飘进来，落在我的水泥地板上。我问上帝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我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是一直努力服侍祂吗？一天傍晚，我透过狭窄的窗户抬头望出去，看到第一颗星星出现在渐渐黑暗的天空，我想神在数十亿光年之前，已经安排这颗星星，让它的光线发出，开始了似乎无用的漫长路程，专为给此刻此地的我一点安慰。

第二天早上，狱卒进来，一言不发地拿起帕特拉的被褥，带走了。起初我很沮丧。然后我笑了，心中感到宽松。神既然不让我自杀，那么祂就必须给我力量，承受前面的痛苦。

有人告诉我，秘密警察是极有耐心的。但现在他们自觉该有一些成果了。他们的首席调查官杜上校（Colonel Dulgheru）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充满威胁。他那双纤细的手摊开在身前。“你一直在玩弄我们，”他说。

战前，杜上校曾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然后，在法西斯统治下，他与德伊并其他被监禁的共产党人一起被拘留。他们注意到他的毅力、智慧和残酷。于是如今就给他在这里，掌握生死大权。

他立刻开始询问我，有关一名红军士兵因走私圣经到俄罗斯而被捕的情事。到目前为止，问话官似乎对我在俄罗斯人中的工作一无所知。但尽管那位被捕的士兵没有出卖我，党方还是发现我们曾经见过面。现在，我比以往更需要衡量每一个供词、因为我实在已经在布加勒为这名士兵施洗，又安排他加入我们的宣道活动。

杜上校的问题一直持续不断。他觉得自己闻到了某种重要的气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已经被各种手段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把牢房里的床移走了，我只能靠在椅子上，每晚睡一个小时。门上的窥探孔每分钟都会发出两次金属咔哒声，守卫的眼睛就会出现。经常当我打瞌睡时，那守

卫就进来把我踢醒。最后我失去了所有的时间观念。有一次我醒来看到牢房门半开着。走廊里传来轻柔的音乐：是幻觉吗？然后声音变得扭曲，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抽泣。她开始尖叫，是我的妻子！

“请不要再打我，我受不了！”

然后传来鞭打肉体的声音。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因恐惧而绷紧。慢慢地，尖叫声开始消失，转为呻吟。但现在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然后一切都沉静了。我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十分疲累。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只是录音。但每个听到尖叫的囚犯，都肯定受害者正是他的妻子或情人。

杜上校是一个外表文雅的恶兽，他模仿了他在大使馆时期交往的苏联众外交官的礼仪。“我很遗憾的下令施行酷刑，”他告诉我。他在监狱里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随手写一张便条，或打发一位传信者，就能颁布命令。他经常在晚上独自来到我的牢房继续审讯。他询问我与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联系。一场关键会议拖了几个小时。他对我闪烁其辞的回答越来越恼怒。凌晨一时，我们都筋疲力尽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

我说：“上校，如今我给你一个实验的机会。你说你可立时枪毙我。我知道你做得到。现在且接手在我的心口。如果它比平时增速，表明我害怕，你便知道没有神。如果它依然慢慢的跳动，

仿佛说，‘如今我正在前往天堂，’你便晓得有神，有永生！”

杜上校马上拳击我的脸，又立刻后悔自己失控。

“你这傻瓜，乔治斯库，”他说。“你难道看不到，你完全在我的权下吗？你的什么救主能打开监狱的门？你永远不会看到威敏斯主教了！”

我说：“祂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如果祂愿意，祂就能放我，也能给我见到威敏斯主教。”

杜上校恨恨的盯着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然后喊道：“好吧，明天你就去见布林少校。（Major Brinzaru）”

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布林少校是上校的助手。他掌管着一个存放棍棒、警棍和鞭子的房间。其他审讯者都使用他的名作为威胁。当时俄罗斯的名诗人沃兹（Voznesensky）写道：“在这前所未闻的苦难日子里，一个没有心肝的人真是幸运。”布林少校正是这样的人。他像大猩猩一样肌肉发达、毛茸茸的，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系列武器。“你喜欢什么吗？”他问，“在这里我们很民主。”

他展示了他最喜欢的一种刑具：一根黑色橡胶警棍。“阅读标签。”上面刻有“MADE IN USA”（美国制造）。

“我们负责打人，”布林少校说，“但你们的美国朋友制造这些工具。”然后他把我送回牢房去考虑。

警卫告诉我说，布林少校在战前曾为一位著名政治家工作，这家人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他晋升为秘密警察。当时有一名年轻囚犯被带到他面前。这就是那位政治家的儿子，因为试图发起一场爱国运动而被捕。布林少校告诉他说，“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曾经把你抱在膝盖上。”然后他就折磨这少男，亲手杀了他。

但布林少校却没有立刻殴打我。每晚巡视时，他会在窥视孔观察我一会儿。“嗨，乔治斯库？耶稣今晚在做什么？”

我说：“祂在为你祈祷。”他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在他的监督下，狱卒吩咐我面向墙壁站立，双手举过头顶，指尖刚好碰到墙壁。“就让他留在那里吧，”布林少校在离开前告诉了警卫。

于是，我的酷刑终于开始了，这是所有秘密警察监狱中常见的酷刑：一轮沉闷的侮辱和痛苦。首先，我站了几个小时后，很久之后我的手臂已经失去了所有知觉，肿胀的双腿也开始颤抖。然后他们让我倒在地板上，给了我一片面包皮，喝了一口水，然后又叫我站起来。一名警卫轮替另一名警卫。有时，两三个人会一起玩，强迫我作

出可笑或淫秽的姿势，这样的持续了几天几夜，中间有短暂的休息。我总是面对墙壁。

为了打发时间，我想起了《圣经》中提到的许多墙。《以赛亚书》写道：神说以色列的罪孽就如墙壁，把自己与神隔开。同样，教会的失误也导致我今日的光景，令我在墙后！然而我也想起诗篇的一句话，“我与主一同跳过高墙。”我也可以跨过这堵墙，进入与上帝相交的属灵世界。我想起那十二名到迦南侦探的以色列探子。他们报告说这些城市很大，有坚固的高墙。但就如耶利哥城墙倒塌一样，我面前的城墙也必倒塌。当痛苦来袭时，我默念《雅歌》中的一句话：“我的良人就像一只羚羊，或小鹿；站在我们的墙后。”我想象耶稣站在我的墙后，给我力量。我记得摩西在山上举起双手，以色列军队就得胜；我们的苦难或者也有助于神的子民得胜。

布林少校时不时过来询问，我是否愿意合作。有一次，当我倒在地板上时，他说：“站起来。我们已经决定让你参见威敏斯主教了。现在就开始走。”

“走吧，”警卫命令道。我试图穿鞋，但脚太肿了。“走，快点，继续走，我会在外面看着。”

牢房的空間可以行十二步：走四步，面对墙；转左二步，又是墙；再左四步，又是墙，再左两步。我穿着破烂的袜子在囚室里团团转。窥视孔打开了，“快点。”守卫喊道。我的头开始旋

转。“快一点——你要挨打？”我痛苦地撞到墙上。我的眼睛因汗水而刺痛。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窥视孔又打开，“站住，转身向后。再走！”反方向一圈又一圈。“快点。”我跌跌撞撞，倒下又爬起来。“继续移动。”当我最后累倒时，警卫进来了，当我挣扎着站起来时，他用棍子重击我的肘部。激烈的痛苦令我又摔倒。“站起来。走！这里不是休息站。这里是训练圈。”

几乎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这种训练圈“manege”。几个小时后，你才能喝到一杯水或吃任何东西。干渴驱走了饥饿。它比刺进双脚的热刀还要猛烈。最糟糕的是，在允许休息几分钟后，或者晚上在地板上昏迷几个小时后，又得重新开始行走。僵硬的关节、破裂的肌肉、撕裂的脚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你贴在墙壁，守卫大声喊叫。当你无法再站立时，就用四肢爬动。

我不知道我在训练圈度过了多少个日夜。当我移动时，我开始为警卫祈祷。我又想起《雅歌》，它说基督的新娘为她的新郎而跳的神圣舞蹈。我对自己说，“我会优雅地移动，仿佛这是对耶稣的神圣之爱的舞蹈。”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真的做到了。如果一个人乐意做他必须做的一切，那么他只是做他乐意做的事——于是最艰难的考验，因为是自愿，也就会变得容易多了。当我绕着牢房转时，似乎一切都围着我转。我再也无法区分一堵墙和另一堵墙，或者墙和门。就像

在神圣的爱中，一个人不再区分善人和恶人。他拥抱每一个。

17

当警卫给我戴上黑眼罩，把我带到一个新的拷问室时，我几乎已经一个月没有睡觉了。这是一间宽敞、空荡的房间。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三四个人影，由于反光镜投射在我脸上的眩光，我只能隐约看到他们。我光着双脚站在他们面前，脚很痛，手也戴着手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衬衫。他们又问老问题。我就给老答案。这次审判官中有一名女性。有一次她威胁说，“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们就会把你放在拖拉架上。”三百年前英国使用的逼供机器，如今也成了共产党的刑具之一。我便回答：“在圣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努力长成基督的身量。如果你把我放在拖拉架上，就帮我达到目的。”那女人大力击打桌子，在耀眼的反光镜后面，他们正在讨论。有时，立刻的回答就如反击一拳一样有效。但他们并没有把我放在拖拉架上；相反的，他们把我送回巴斯蒂（Bastinado）的审问室。

这是另一间牢房。他们用头罩盖着我的头，令我蹲下，双臂抱住膝盖。一根金属棒插在肘部和膝盖之间，并置于支架之间，于是我的头部转

下，脚部在上。一人扶起我的头，另一人就击打我的脚底。这种打击就如爆炸。有些棒打落在我的大腿和脊柱底部。有几次我晕了过去，他们就用冷水苏醒我。每次他们都说，只要我供出一个他们所要的名字，酷刑就中止。当他们把我放下时，我已经不能行走，只能被抬回囚室。

每次前往这间刑房，我总是戴着漆黑的眼罩，不让我晓得监狱的底细。有时在拷打时，眼罩还蒙着眼睛。当你可以看见棒子落下时，你可以收缩肌肉，预备承担。但眼睛被蒙着，不知道打击从何处来，何时来，你的惧怕就加倍。

我也经过别的酷刑。通常有四五个人同时对我使用靴子和棍棒，而我则在地板上痛苦地打滚。在他们摘下我的眼罩后，布林少校尼有一条尼龙鞭，它呼啸着穿过空气，撕裂了我的肉。只三击，我就失去了知觉。有一次，我的喉咙被一把刀架住了。“说话，”布林少校说，“说，不然你就死。”压住我的两个人握得更紧了。只见刀身起落数次，我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发现胸口沾满了血。我也受过水刑。他们把水灌进我的喉咙，直到胃胀。然后两个守卫站在我的肚子上践踏。我又和两只混种狼狗一起呆了好几个小时，这种猛犬是牧羊犬与野狼的杂交，只要我稍微一动，它们就会跳起来。它们被训练不会咬人，但它们的咆哮以及距离喉咙一英寸的獠牙的咬合声，叫你不肯动。你身旁放着一些面包，但你不敢伸手拿。我也试过热铁的盖印。

最后我签署了他们为我设计的所有“自白书”：我既是通奸者又是同性恋者；我卖掉了教堂的钟，把钱私藏了——尽管我们的教会没有大铃钟；我又承认我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工作的掩护下，一直从事间谍活动，意图推翻共产党；我和其他人渗透党组织并泄露了共党的秘密。

布林少校读完这叠供词后说道：“一切都很好，乔治斯库——但是你向谁传递秘密？”

于是我就写出详细的名单和地址。布林兴高采烈地带着走了：这肯定会给他带来奖金和晋升。几天后，他回来了，给我另一轮殴打。因为党方已经查过这些人的名字，发现他们要么是早已逃往西方的人，要么是已经去世的人，要么就是短暂访问后离开我国的外国人。但至少我赚到一段时间，让我恢复了一点体力。

比肉体折磨更糟糕的是等待。你躺在那里，听着别人的尖叫声和哭泣声，你晓得可能一小时后就轮到你。但上帝帮助我绝不供出一句伤害他人的话。我很容易就失去了知觉。但他们却要我活命。因为每个人都是将来某些信息的来源。因此在酷刑过程中总会有一名医生在场，以确保受害者不会太早逃往另一个世界。这就如地狱。其中的折磨是永恒的，你又死不了。

在痛苦中，要记住圣经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我总是试图记忆。耶稣本可以作为国王来到世上，但他选择作为罪犯，被鞭打。罗马的鞭打是可怕的，我每受一鞭，就想起主耶稣也晓得这种痛苦，于是这就成了一种快乐。

嘲笑和羞辱同样难以忍受。耶稣常说他会被鞭打、嘲笑，被钉。我曾以为，与鞭打和钉十字架相比，嘲笑算不得什么。如今才知道一个人可以被迫张开咀，别人就往你口中吐痰和小便。而这些人则大笑和讥讽。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官员认为烧死异教徒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许多共产党员也相信自己作的是正当的。杜上校坚信自己的“使命”。他常说，“如果人们隐瞒信息，以致大众受损，他们就该受到虐待，这符合社会的切身利益。”很久以后，当他看到我已经崩溃了，因神经疲惫而哭泣时，他带着几近怜悯的语气说道：“你为什么不屈服呢？这一切都是那么徒劳。你只是肉体，最终会破碎。”

但我有相反的证据：如果我只有肉体，我永远无法抵抗。但身体只是灵魂的暂时居所。共产党人以为一个人会做任何事情，避免自己肉身的灭绝。他们错了。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成全；它不是灭绝，而是永恒的开始。

18

我已经在卡利街监狱渡过了七个月。如今是十月，冬天已经来临了。这一年是严寒。我们正在饥饿和虐待中，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冬天。望着窗外的雨夹雪落在灰色的监狱院子里，我浑身

发抖，但我的精神并不低落。我想，在监狱里，我能通过耐心的爱为上帝做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但生活中，美好的事总是显得微小。

一天晚上，守卫端来一盘美味的炖牛肉，配上四片面包。还没等我吃，守卫就回来，叫我收拾东西，跟着他到其他犯人排队的地方。在那里，我心中一直渴想着失去的炖牛肉。但其实那只是众多的玩弄手段之一。该晚卡车把我们带到内政部，这是一座深受游客钦佩的宏伟建筑。没有人晓得它下面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般的监狱，和其中数百名无助的囚犯。

我的牢房在地下深处。一颗没有外罩的灯泡从天花板上照在光秃秃的四堵墙上，这里有一张铁床，其上有三块木板和一个稻草床褥。浑浊的空气通过墙上高处的管道进入。我发现这里没有马桶，意识到我必须等待警卫带我去厕所。这是监牢里最糟糕的安排（刻意的安排）。有时他们会让你等几个小时，嘲笑你的恳求。男人和女人一样，因为害怕加剧痛苦而不敢吃喝。我自己就曾经在盘子上大便，以后因为没有清洗的水，也就用来盛食物。

这里绝对是寂静无声——也是刻意的。警卫们穿着毡底鞋，在钥匙找到锁之前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手放在门上的声音。有时，囚犯不断地敲门或尖叫的声音会在走廊里回响。小牢房只允许我向每个方向移动三步，所以我躺下来盯着灯泡。整晚上它一直亮着。因为我睡不着，所以我祈祷。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我习惯的所有声音，就如街道上的风雨声，石地板

上的钢靴钉，苍蝇的嗡嗡声，并人声，都消失了。我的心似乎也要在这死气沉沉的寂静中停止跳动了。

19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一直被单独监禁在这个牢房里。没有读物，也没有写作的工具，我只有自己的思想陪伴。我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我鲜少体会过安静。果然我有上帝；但我真的事奉上帝吗——还是正在从事一门行业？

人们要求牧师成为智慧、纯洁、爱心和诚实的典范。但牧师也只是人，也会有人的不足。因此，他们开始或多或少作出一些伪装，保持爱心的形象。时间久了，他们自己也难以分辨，自己的行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伪装的。

我记得萨沃（Savonarola）在狱中对《诗篇》第五十一篇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当时他的骨头严重折裂，只能用左手签署自控书。他说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真信神。另一种也同样真实地“信自己信神”。只有在危机时刻，你才能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认识他们是前者或是后者。我相信上帝吗？现在考验来了。我独自一人。没有薪水可赚，也没有意见可考虑。神给我的只是痛苦——我还会继续爱他吗？

我记得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帕特里克》The Pateric，讲述了一些四世纪的圣徒，他们在迫害时期建立了沙漠修道院。这书有四百页，但我第一次拿起它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直到读完它。

基督教书籍就像美酒——越陈旧越好。《帕特里克》中有一段话，一位弟兄问他的长辈：“神父，什么是沉默？”答案是：“我的孩子，沉默就是独自在房子里，敬畏神，保护心灵避开思想的火箭。这种安静产生美善。静默而无思，天堂之梯！当一个人只想到首要的事物，只与耶稣基督说话！一个保持静默的人，就是那心中说，‘主呀，我的心已经准备好称赞你了！’”

过去我曾诧异一个人如何通过沉默的生活来赞美上帝。起初，我急切地祷告求得释放。我问：“经上说，人独居不好，为什么我独处呢？”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已经几周了，我唯一的访客仍然是警卫，他带来了黑面包和稀汤，却一句话也不说。

希腊人有句俗语，“众神穿着软鞋行走”：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世人无法察觉到神灵的来临。也许在这种沉默中我与神更近了。也许这无声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牧师，因为我注意到最好的传道人常是内心沉静的，就如基督。当咀巴经常张开时，即使是为了说好话，灵魂也会失去热量。就像房门打开了，温暖就流失一样。

我渐渐了解，沉默之树上挂着和平的果实。我开始认识到真自我，确保它属于基督。我发现即使在夜这里，我的思想和感觉也转向神，我可以夜复一夜地祈祷、灵性操练和赞美。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演戏，而是真信。

我

制定了接下来两年遵循的惯例。我整夜没睡。当晚上十点钟声响起时，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有时我很悲伤，有时很高兴，但夜晚对于我要做的事情总是不够长。

我以祷告开始，祷告中常常流下感激的泪水。祈祷就像无线电信号一样，在夜间听得更清楚：正是这个时候，信徒进行灵里的真战争。接下来，便是讲道，就如在教堂里的证道。我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开始，以“阿门。”结束。我使用耳语，是守卫不能听见的。我无需担心主教或教长对我的讲章怎么想，会众会如何说，或间谍会如何报告。我不是向空气讲道。每一次讲道，神与众天使都听到，还有过去与今日的圣徒。我感到“会众”中也有那些带领我信主的，我的教友，无论是依然活着的，或是已经过世的；还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云彩般的见证人”。这正是信经中的“圣徒相通。”

每天晚上我都和我的妻子和儿子说话。我记得他们身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时我的思绪会越过监狱的围墙传到萨宾娜那里。她在她的圣经中记下了当时的一句：“今天我见到了理查。我躺在床上，醒着，他靠过来对我说话。”那时我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向她传达了爱的信息。我们每天用几分钟彼此思念，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许多婚姻被监狱摧毁，而我们的婚姻却更加牢固。

想到我的家人，也会给我带来痛苦。萨宾娜不可避免地，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当局会试图迫使她办理离婚手续。如果她拒绝，又继续教会的工作，他们几乎肯定会逮捕她。那时，十岁的米

海就孤单无依。我脸朝下躺在床上，拥抱床褥就像拥抱着我儿子一样。有一次我跳起来，用拳头猛击铁门，大喊：“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警卫跑进来按住我，同时给我注射了一针，使我昏迷了几个小时。当我醒来时，我想我可能要疯了。我知道许多人都这样开始失常的。

这给我想起基督的母亲，她站在十字架下，却没有抱怨。这给了我勇气。我想知道，我们把她的沉默解释为深沉的悲伤，是否正确？她肯定也会感到高兴？因为晓得这苦难是将给众人好处。

由于那天是逾越节，根据犹太的仪式，她那天晚上一定唱诗赞美神。于是我也必须感谢上帝让我的小儿子经历苦难。我还有一个渺茫的希望，就是，即使萨宾娜被捕，我们还有忠心的朋友，肯定会关照米海。

其中一种锻炼，就是想象我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基督：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并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的情感、我秘密的思想和我的每一个肢体。我向基督承认我过去所有的罪，并看到祂用手将它们擦掉。我常常哭泣。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花了很多时间省察自己的灵魂。那是一个错误。爱、善和美都是害羞的受造物，当它们知道自己被观察时，它们就隐藏了。当我儿子五岁的时候，他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我责备他说：“耶稣有一本很大的练习本，其中一页写着你的名字。今天早上祂必须写下你如何违背了妈妈。昨天你和另一个男孩打架，又说那是他的错。”米海想了想，问道：“爸爸，耶稣只写我们的坏事，不也写好事吗？”

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我的儿子。我很高兴记得他是如何教我神学的。当我读到哥林多后书时，他问道：“经上说要省察自己，看我们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我该如何省察？”

我回答说：“便是捶胸自问：‘心啊，你爱神吗？’”我就用力拍自己的胸口。

“不是这样的，”米海说。“有一次，火车站的技工给我试用他的小锤。他说，‘只需轻轻敲，不是重击，免得轮子破裂了。’所以我也不必太大力敲打自己呀？”

现在我知道，当我问自己，“你爱耶稣吗？”只要听见心里安静地说一声“是的，”就够了。

每天晚上，我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思考我的主要对手，比如杜上校。我想象自己在他的地位，我会如何。于是我想到他的许多苦衷，于是我就更能爱他，并其他折磨我的人。然后我又从他的角度思考我的错误，就对自己产生了新的认识。

我又想象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一位百万富翁、或是中国皇帝，或是天主教的教皇。我就考虑如何利用那种权力。我又梦想如果我有翅膀或隐形衣服，生活将会如何。还有，如果人的灵魂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自由飞翔，又能改变世界，生命将会如何。这些都是幻想，但很能打发时间。一位忙碌的建筑师不会浪费时间思想如何使用不存在的建筑材料（譬如没有重量的石头、或有弹性的玻璃）。属灵的冥想，也像建筑，是为了实在的利益。这种幻想给我看到，敌对派

在灵里也能合一。如今我明白为何基督可以包含万有。祂可以同时是犹太的狮子，也是神的羔羊。

我在空荡的牢房里也不乏乐趣。我给自己讲笑话，并创造新笑话。我用监狱面包制成棋子，对自己下棋：黑的对弈不那么黑的。棋盘用墙粉画出。我把心思分成两半，黑方并不晓得灰方的下一步棋，反之亦然。于是这两年来我总是得胜，一局也未曾输过。好像是天下无敌了。

我发现快乐就如习惯，就像一张折叠的纸总是倾向原来的折叠一样。“要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我未曾悲伤超过一刻钟（十五分钟）。”我不能对自己说同样的话，但我学会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高兴。

21

共产党认为，幸福来自于物质的满足；但我独自一人在牢房里，又冷又饿，衣衫褴褛，每晚却都高兴地跳舞。这个想法是来自我童年时曾经看过旋转的托钵僧。这些穆斯林僧侣旋转时的优雅动作、呼喊他们的“真主”。后来我发现许多其他信徒——犹太人、五旬节派、早期基督徒、圣经中的人物，如大卫和米利暗、在塞维利亚大

教堂庆祝复活节的祭坛男孩，还有今天的信徒——也为上帝跳舞。人在接近神时的感受，仅靠言语永远不足以表达。有时我内心的喜悦那么强烈，以致若不发泄就会爆炸。我记得耶稣的话：“当人们因人子的缘故而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并以你们的名为恶时，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跳跃！”我告诉自己：“这条命令我只执行了一半。我心中欢乐，但这不够，我还必须跳跃。”

当警卫从窥探孔观察，看到我在牢房里跳来跳去。他受到的指令必然是马上分散将要发疯之犯人的注意力：因为他马上到守卫室带来一些食物：一大块面包、一些奶酪和糖。

当我拿起这些食物时，我想起了《路加福音》说：“在那一天你们要欢欣雀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一块很大的面包：超过一周的口粮。

从那时起，我很少一个晚上不跳舞，尽管我不再获得报酬。我创作歌曲，轻声地唱给自己听，并随着自己的音乐跳舞。守卫们已经习惯了。我没有打破沉默，他们在这些地下牢房里看习各种奇怪的境况。后来我和朋友谈起在监狱里跳舞时，他们问：“为了什么？有什么用？”这不是用处的问题。这是一种欢乐的表现，就像大卫的舞蹈。这是在耶和华的祭坛前献上的神圣祭物。如果守卫们以为我疯了，我也不介意，因为我在基督里发现了一种我以前不知道的美。

有时我看到异象。有一次，当我跳舞时，我似乎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不是“理查”，而是另一个我不能透露的名字。我知道那人正在叫我，而且是使用我的新名。不知道为什么，我晓得叫我的谁（天使长加百列。）然后牢房里就充满了光芒。我没有听到更多的话，但明白我正在与耶稣并众圣徒一起建造一座桥梁。这是一座用泪水、祈祷和自我牺牲的桥梁，让罪人能够跨过去，与蒙福的人同在。我发现我们的桥梁必须是一座即使是善良最微弱的人也可以使用的桥梁。耶稣应许，在最后的审判中，那些给饥饿的人吃饱、给赤身露体的人穿衣的人，将坐在他的右边，而作恶的人将到左边，就是外面的黑暗里。可是，每个人都有时助人，有时没有：身体是一个，心思却常常变动。我发现我必须爱人现今的样子，而不是他们应成为的样子。

另一个晚上，我意识到一大群天使在黑暗中慢慢地向我的床移动。当他们走近时，他们唱起了一首爱之歌，就如罗密欧肯定向茱莉亚唱的。我不敢相信警卫们没有听到这奇妙的情歌。

长期独处的囚犯常会出现这样的幻象。当然，这种现象有自然的解释。但这并不会使它们失去价值。灵魂利用身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异象维持了我的生命。这就足够证实它们不完全是无意义的。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床边的墙壁有轻微的敲击声。

一名新囚犯来到了隔壁牢房，并向我发出信号。我回答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邻居正在传达一个简单的代码：A：单击一次； B：击两次； C：击三次，诸如此类。“你是谁？”这是他传递的第一条消息。

“一位牧师，”我回答道。

从这种困难的开始，我们开发了自己的系统：点击一下表示字母表的前五个字母，随后的点击两次，表示这一组的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因此，B 是单击一次，然后暂停，然后再击两次；F 是先击两次，然后再击一次。但这种代码对于我的新邻居来说也不够完善。他懂得摩斯电码（Morse code），并把这些字母一一传给我，直到我全部学会。

然后他传送了他的名字。

“神祝福你。”我费力地回答。“你是基督徒吗？”

一分钟之后，他才回答：“我不能说是。”

原来他是一名无线电工程师，正在等待死刑的指控。如今五十二岁，身体不好。几年前，他与一个不信者结婚，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如今正在大大忧愁。整个晚上，我都隔着墙向他讲述基督的怜悯，同时开始熟练摩斯电码。

没过多久，他给我这个信息：“我想忏悔。”

这是一个间隔许多沉默的告白。

“我七岁时……踢一个男孩……因为他是犹太人。他诅咒我……愿你的母亲……在去世时……不能见到你……果然后来妈妈快要死时……我正要动身去看她…就被警察带走了。”

当他道出心中的重担后，他说他感觉比多年来轻松省了。我们成为莫斯密码的朋友，就像其他人成为笔友一样。我教他圣经的经文，但我们也互相传送轻松的玩笑，并进行国际象棋对弈。我每天都会向他发送有关基督的信息，用密码传道。当警卫发现了，就把我转移到另一间牢房。我们就开始和新邻居进行这种交流。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学会了这些代码。囚犯经常被转移到新的牢房。我不止一次被告密者出卖，所以我只单纯传达经节和基督的话：我还不愿意为政治的争论而受苦。

单独监禁使我们许多人想起埋藏多年的过去经历。那些我们刻意遗忘的背叛与撒谎，都重新回到了脑海。就如我们遗弃的母亲、父亲、或很久以前的女朋友，曾经被你诽谤或欺骗的人都会来到你的牢房。我听到

的许多摩斯电码的忏悔都是这样开始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时候……”过去的回忆就像无情的恶狗，使你不得安息。但是，当所有其他通往天堂的大门都关闭时，《卡巴拉》告诉我们说，还有一道门依然开着：就是泪门。

我们囚犯正是经过这道门。

一天早上，一位邻居用莫斯科告诉我，这是耶稣受难日。我在厕所里发现了一颗钉子，就带回来，在我牢室的墙上写了“耶稣”二字，好给后来的囚犯打气。守卫很生气。“你是要尝尝僵尸厢！”他说。

他就带我到一个嵌在墙壁里的橱柜前，那橱柜的高度刚好可以站立一个人。它有二十英寸见方，有几个小气孔，还有一个可以将食物推入的洞口。门卫把我推了进去，并关上了门。门内锋利的尖端刺痛了我的背。我猛地向前冲，胸部又被第二组尖刺插入。我顿时慌了。我强迫自己保持绝对静止。然后，我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移动，发现橱柜的四面都布满了钢刺。只有笔直地站着，才能避免被刺穿。这就是僵尸厢。

很快的，我的腿就开始酸痛。一个小时后，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发痛了。我的脚仍然因马纽刑法而疼痛肿胀。我最终倒下，被尖刺插着，他们就让我出去短暂休息，然后再令我进入这箱子。我试图思想基督的苦难，但我自己的苦难却太强了。我想起米海很小的时候，曾经问：“爸爸，我该怎么办？我很无聊。”我说：“就思想上帝吧。”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考虑祂？我的头很小，祂的头却很大，所以理当是祂想及我。”

于是我就告诉自己说，“不必想及神。甚么也不必想。”

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想起阿多斯山上的僧侣有一种祷告，称为脉搏祷告。每一次心跳，代表每一个字：“主耶稣基督，神之子，怜悯我！”

于是我也重复对主说：“耶稣，我灵魂的新郎，我爱你。”我按照同样的旋律重复。一颗爱之心的

安静跳动，就如最美妙的音乐，可以传到远方。起初我好像听见魔鬼的嘲笑，“你爱祂，祂却让你受苦。如果祂是全能的，为甚么不救你脱离僵尸厢？”我继续安静的说，“耶稣，我灵魂的新郎，我爱你。”在短时间内，这些字词的意义就开始模糊，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不再有任何思想了。

后来我经常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使用这种不思想的祷告。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你们不思想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我对祂的经历。不要思想——基督就会来，让你大吃一惊。但祂的光是那么明亮，以致令人难以忍受。有时我会扭转这个过程，逃避它，重回自己的思想中。

24

我在僵尸厢里待了两天。听说有些人在里面待了一周或更久。但医生警告狱方说，我的情况危险，已经是生死的边界。长期监禁和缺乏阳光，食物和新鲜空气，已经使我的头髮不再生长。理发师已经无需为我刮胡须。我的指甲苍白而柔软，就像一株生长在黑暗中的植物。

幻觉开始占据我的脑海。在消沉的时刻，我盯着我的锡杯里的水，叫我晓得自己还在世上，而不是在没有水的地狱。当我还看时，那杯子却变成了

头盔。我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上摆着美味的菜肴，一直延伸到牢房之外。我的妻子从远处走近。她端着一个盘子，里面堆满了冒烟的香肠，但我对她说，“就这一点儿吗？太少了。”有时，我的牢房会扩展成一个宽敞的图书馆，一书架又一书架的精装版书籍一直延伸到黑暗中：著名的小说、诗歌、传记、宗教和科学著作。他们高耸在我之上。其他时候，成千上万的面孔热切地转向我：有一大群人围着我，等待我发言。有人大声提问，就有声音随即回应。欢呼声和反喝彩声此起彼伏。众人的面孔就如海洋一样广大无限。

我也梦见自己向囚禁我的人进行报复，于是心灵不安。我又梦见色情的幻想。这是一个未曾经历其中的人难以了解的地狱。

在我入狱时才三十九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现在我的肺结核复发，激起性欲。我梦想着同时与几个女人、各个种族的女孩进行性行为，然后是各种变态。

为了摆脱这种幻觉，我将它们视为敌对的入侵者，就像我体内的结核病细菌一样。因此，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入侵而责怪自己，而是因抵制了它们而自豪。一旦我不再将它们视为自己的过失，而是敌人，我就可以计划毁灭它们。如果我们冷静地考虑邪恶思想的后果，理性就可以抑制这些思想。我没有试图将它们赶出去，因为知道它们不久就从侧门溜进来。相反，我让它们留下，同时计算出如果我

屈服于它们，我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必承担痛苦。我的妻子将不得不与我离婚（假使我有了婚外情）；我儿子的未来就毁了。我的教友也会失去信心。然后，在众人鄙视下，我仍然必须为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向上帝负责。就如医生有时会使用一种病毒对抗另一种病毒，我们也可以如此。骄傲之魔可以对付色鬼（因为怕丢脸）；吝惜之魔最痛恨一切花钱的罪恶。

25

有一天，我们的厕所堵塞了，狱卒就把我带到了警卫用的厕所。洗脸盆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有一双疯子的眼睛盯着我。那是一双布满血丝，充满恐惧和怀疑的眼睛。我坐牢已经两年，已经不能认出自己了。

镜子中的我，皮肤就如黄色的纸皮。眼窝是深灰色，头髮是肮脏的白色。最近受伤的红色疤痕覆盖在骨瘦如柴的前额一侧。我的咀角颤抖。我惊恐地看着这可怕的老人，然后不由自主的发出一阵笑声。这就是过去人人爱戴和钦佩的英俊年轻传道人。如果我的会友们能看到如今的我就好了。我仿佛第一次明白，我们身上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隐藏的。我提醒自己，我还会变得更丑——成为一具骷髅，一个空颅骨。发现了这个，我就更渴望属灵的生命

，里面的真生命。我希望这真正的内在之人可以成长。

这厕所里有一张撕破的报纸，这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看到报纸。其中报道格罗扎总理决心消灭富人的消息，这叫我感到有趣；正当世界各国努力消除贫困（就是减少穷困人）时，我国政府却立志要消灭富人。我试找帕特拉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复职，但在格罗扎讲话时，他不在出席的部长中。

在押送回牢房的路上，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泣，又疯狂地喊叫。她的尖叫声似乎是从我们下面的监狱里传来的。这尖叫突然停了。

几天后有新囚犯被关进我隔壁的牢房。我敲打墙壁问“你是谁？”立即就收到回复。他就是米沙拉奇（Ion Michalache）。他曾是战前多个政府的成员，也是伟大政治领袖马纽（Iuliu Maniu）的同事。当共党开始抓人时，米沙加入了一群人，试图逃往西方。一九四七年十月，他在机场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米沙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如今极其绝望。他告诉我，他一生都在努力帮助我国同胞，而这就是他的回报。

我回答说，“当你乐意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那么所发生的，就只是你愿意发生的，”我说，“放弃一切，就是和平之道。”

他回应道：“没有自由就没有和平。”

我回答说：“在一个暴政的国家，监狱是荣耀之地。”

他说神令他失望。

我回答，“上帝绝不会叫任何人失望。。。只是人叫人失望。如果我们找寻找神，就必能寻见。监狱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祂。”他说他会再尝试。

两天后，米沙告诉我，我们听到的那个哭声的女人是前总理吉古尔（Ion Gigurtu）的妻子。她的哭声突然停止，意味他们给她注射了药物。过后我再敲击墙壁时，却没有回应。米沙已经被带走了。

26

不久之后，我的审讯又开始了。这次审讯官是格雷中尉（Lieutenant Grecu）。这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聪明而自信。党方已经给他灌输一个信念：他正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他问我有关于《挪威宣道会》的饥荒救济金。他问我是否仍然否认这些资金是用在间谍活动。

我说：“我可以理解你怀疑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我国花钱从事间谍活动，但是挪威或瑞典对这种活动有什么兴趣？”

“因为这两国，”他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工
具。”

“但挪威以民主精神而闻名，而瑞典已经拥有社会主义政府四十年了。”

“胡说，”他说。“他们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是法西斯主义者。”

在我们的下次再相见时，格雷说他已经检查过并发现我说的对。对于一个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慷慨的承认。

他跟着询问俄语福音书的分发情况。我暗示圣经公会的一位名叫埃米尔的董事可能是幕后人。当他问我为什么多次访问雅西城（这城便是这福音工作的中心之一）时，我说我是收到了该城大主教的邀请。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去。格雷坐在办公桌前。

“你的故事完全是谎言，”他喊道，“党方已经查明埃米尔在你被捕之前已经死了；他们也检查了你前往雅西的日期，当时查士丁大主教不太可能在当地。”

他把椅子往后推。“我受够了。这是一些文件。我们知道你曾经用密码与其他囚犯交流，包括米沙。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对你说了什么。我们还想了解你所有其他违反党纪的细节。老实的写。不然……”

他用警棍在桌子大力猛击。“你有半个小时，”他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我坐下来写。标题必须是“认罪文”。开始时我有些不习惯。我已经两年没有拿笔了

。我在声明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自己违反了规则：我通过敲墙传达圣经经文和福音信息，我也曾囤积药丸企图自杀，又用一块锡制成一把刀，又用面包和粉块笔制作棋子棋盘。我也曾经与其他犯人交流，但不知他们的名字（我没有提到，通过摩斯码，我收到了忏悔，甚至带人信的主。）我又写道：“我从未说过反对共产党的话。我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吩咐我们爱敌人。我理解共产党，并为他们的信主祈祷。我希望他们会成为我的兄弟。我无法谈及别人给我的信息，因为神的牧师绝不能指控任何人。我的使命是保护，不是指控。”

格雷准时回来，挥舞着警棍。“我已经对你们的一些狱友作了热身运动。”他说。

他拿起我的《声明》开始读，过了一会儿，他把警棍放到一边。读完后，他一脸困扰地说：“乔治斯库先生（他以前从未叫过我“先生”），你为什么说你爱我？我知道这是你们基督教的命令之一，但我不相信有人能遵守它。我不能爱一个折磨我的人。尤其是那些单独关押我，叫我挨饿多年的。”

我说：“这不是遵守诫命的问题。当我成为一名基督徒时，就如获得了重生，有了充满爱的新品格。就如喷泉只能喷出清水，一颗爱心只能涌出爱。”

那天，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谈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我说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是《约翰福音》的注释时，格雷感到惊讶

；他也不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中写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复原宗）形式——是“一种最理想的宗教，能更新一个被罪恶糟蹋了的生命。”由于我的生命已经被罪破坏了，于是我成为新教派的基督徒只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行事。

这次谈话后，格雷几乎每天都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一两个小时。他已经确认了这些引述属实，并且诧异为何他的老师从未提及它们。显然，马克思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敌视宗教。

我强调了基督教早期的革命精神。格雷说：“我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永远不会成为其他人。”我告诉他：“无神论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当我们的祖先因为信仰而被扔给野兽时，罗马皇帝尼禄（Nero）和卡利古拉（Caligula）称他们为无神论者。所以如果有人自称是无神论者，我们就肃然起敬。格雷微笑，于是我继续说道：“中尉，我的一位祖先是十七世纪的一位拉比。他的传记作者写及他如何遇见一位无神论者。他说：“我好羡慕你，兄弟。你的灵性肯定比我强。当我看到一个人陷入困境时，就说：“上帝会帮助他”，于是就继续行我的路。你不信上帝，意即你必须承担这个重担，扮演神的角色，帮助你遇到的每个人。”

“我们基督徒并不反对共产党的神思想。我们只是反对共产党的错误类型之无神论。因为无神论也有两种：第一种说：‘因为没有上帝，所以我就

可以任意为恶。’第二种则说：‘由于没有上帝，我就必须做上帝会做的一切善事。’

“正是因为耶稣作神的一切工，人们就开始问，这人是神吗？祂作神的工！祂表现得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是祂的。于是人们才发现祂是神。中尉，如果你能成为这样的无神论者，爱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服务，人们就会发现你是神子；而你也会发现你里面的神性。”

我的论点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对犹太人就成为犹太人，对希腊人就成为希腊人，好得着他们。对格雷我就必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所能明白的语言。他开始思想，并爱耶稣。两周后，这名穿着黄褐色制服，衣领上挂着蓝色秘警肩章的中尉，就向一个破布囚犯承认基督为主。我们就成了兄弟。

从那时开始，他一边口头上为党服务，一边勇敢地帮助犯人渡过困难和危险。然后有一天，他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了警卫，他们认为他已经被捕了。要隐藏真心的转变并不容易。

我在秘密警察中遇到了其他秘密信徒，其中一些人仍在警界中，同时暗中服侍教会。不要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折磨和祈祷。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税吏（这是古罗马的一些犹太人，奉承压迫者，欺负自己的同胞），到圣殿认罪祷告。然后主耶稣说他回家时，已经称得上是义人了。然而，福音书并没有说他立即放弃了他的汉奸工作。神监察人心，并在一个真实的祷告中看到未来之改变的应许。

在共产国家，这种两面人更是普遍。

我坐牢第二年，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分裂之灵魂。他和我关在一起的时候，双手被反锁在背后，所以我必须喂他、照顾他。

这位迪奥（Dionisiu）是年轻的雕塑家，在这个人人都必须讨好斯大林才能生存的世界里，他对未来还充满了憧憬。最后在饥饿的边缘，他为了吃饭，就为秘密警察效劳，包括折磨囚犯，但同时他也冒着巨大的风险警告他们提防告密者。后来迪奥意识到自己受到怀疑，决定逃出罗马尼亚。可是将要成功时，他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冲动，迫使他返回自首。迪奥一生都在两个相反的催动力中，来回拉扯。极权国家产生了许多这样的灵魂。

一连十个晚上，从天黑到早晨，我教迪奥圣经。他的罪感终于清除了，基督进入了他的心。在他被转移别处之前，他说：“如果我年轻时，

小镇上的十五位神父的一位，停下来跟我说话，我早就找到耶稣了。”

28

在格雷中尉的离开后，审讯并没有停止，但上帝给我一种恩赐，让我能忘记所有我可能伤害之人的名字。虽然在狱中我写了三百首诗，共有十万字，出狱时也都能写了下；还有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我在狱中的经历却还能清楚记得，仿佛昨天一般；但在我受问话时，大脑却能一片空白。于是党方尝试一种新方法。

医生说我的肺结核恶化了，（当时我的咳嗽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就开了一种新药，一种黄色胶囊，说是可以给我充满愉快梦境的长睡。当我醒来时，他们又加一剂。我昏睡了好几天，其间只有当警卫送来饭菜时才叫醒我。那饭菜变得清淡又有营养。

我对过后继续的审讯，已经不能清楚记得了。但我知道那种药物并没有导致我出卖朋友，因为后来我上法庭时，还是孤身一人。并没有党方刻意大事渲染又爆破一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的“间谍网”事件。这种药物曾被用于红衣主教敏斯（Mindszenty），特罗斯基派，并许多其他人士。它会削弱受害者的意志，直到受害者陷入自责的谵妄状态。后来，我听说受这药物影响的人敲打牢房门，要求见政治官员，以便对自己提出新的指控。这种药物还能产生长期效果。几个月前服用的人后来向我承认他们犯了许多“罪行”，就是他们完全不可能犯下的。也许我体内的结核病抵消了这些药物的作用。或者是他们使用的剂量太高。无论如何，帝的恩典让我不至于出卖朋友。

29

服药后，我的身体更加虚弱，有一天我似乎完全崩溃了。我必需用尽气力，才能从床上爬起来。但我的头脑仍然会清醒一阵子。我有时甚至担心它的清晰度。

圣安东尼、马丁路德和许多其他普通人都见过魔鬼，这并不是神话。我小时也见过牠一次。那时牠对我呲牙而笑。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我第一次说及牠。现在，我独自一人待在牢房里，又感到牠的同在。天又黑又冷，牠在嘲笑我。圣经提到“豺狼跳舞的地方”，监狱就成了这样的地方

。我日夜都听到牠的嘲讽，“耶稣在哪里？你的救主无法拯救你。你被骗了，你也欺骗了别人。祂不是弥赛亚——你跟错了人。”

我大声喊道：“那么，谁才是真弥赛亚呢？”答案很明确，但重复是太褻渎了。我曾写过书籍和文章证明基督是弥赛亚，但现在我无法想出任何一个论点。那个令伟大的挪威福音传教士汉斯（Nyils Hauge）在监狱里动摇，又使施洗约翰在地牢里对耶稣产生怀疑的魔鬼，如今正在大力摇撼我。我完全没有任何抵抗的工具，只有挨打的份。我的喜悦和平静消失了。以前，我一直感到基督离我很近，减轻我的痛苦，照亮我的黑暗，但现在我感到完全被抛弃了。

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我慢慢地写下了一首长诗，对那些未曾经历那种光景的人，可能难以接受。但它却是我的救赎。借着言语、节奏和咒语，我打败了撒旦。这里是它的大意翻译，少了它原有的节奏：

从小我就经常去寺庙和教堂。神在这些地方获得荣耀。不同的祭师都向你热情地唱歌和熏香。他们声称有权利爱你。但随着我的成长，我看到世界是那么悲哀（神造的世界！），我对自己说：“祂肯定有一颗铁石心肠。否则祂应该会为我们减轻

重担。”生病的孩子在医院发烧，忧伤的父母为他们祈祷。天堂却聋了。即使我们的祈祷很长，我们所爱的人依然死亡。无辜者被扔在火炉里，活活烧死，天堂却沉默。它让这种事发生。神还会惊讶信徒怀疑祂的存在吗？

我怎么能爱一位创造有害细菌和吃人老虎的主宰？只因为一个人吃了一棵树上的果子，祂就折磨所有的人？这样的神叫我怎么能爱祂？我的处境比约伯更糟；我没有妻子、孩子，也没有朋友来探望，监狱里没有阳光，缺少空气，这种暴力统治叫人难以忍受。

他们会用我的床板制作我的棺木。如今我还躺在这床上，试图了解为何我的思绪奔向你，为什么我写的文字都转向你？为什么我的灵魂里有这种热爱，为什么我的歌只归你？我深知我被拒绝了，很快我就会腐烂在坟墓里。《歌中之歌》的新娘问，她爱你是否是“爱得正确”时，她其实没有爱。爱有它自己的理由。爱不属于理智的人。一个爱人，就是经历千百次考验，也不会停止爱。不论是刀山火海，或是滔天大浪把她淹没，她还是会亲吻伤害她之爱人的手。如果她找不到她问题的答

案，她会自信地等待。有一天，阳光会照亮幽暗，一切都会清明。

末大拉的许多罪孽获得宽恕，这只会增加她炽热的爱。但她在你说出宽恕的话之前，已经为你淋了香水，而且流了许多眼泪。如果你后来没有说宽恕的话，她仍然会坐下来因爱你而哭泣，虽然她还在罪中。她在你流血之前已经爱你。

我也不问，爱你是否正确。我爱你不是为了希望得拯救。就算我永远灭亡，我也爱你。如果你拒绝降世为人，你就会成为我遥远的梦想。如果你不说话，我依然一样爱你（虽然心中缺少你的话，以致干渴难耐。）即使你临阵犹豫，逃离十架，以致我没能得救，我也一样爱你。

即使我在你身上发现了罪孽，我也会用我的爱来掩盖它。现在我敢说狂话，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爱。现在我将触动未曾触动的琴弦，用新的音乐来荣耀你。如果先知们预言的是另一个救主，我会离开他们，而不是你。让他们拿出一千个证据，说你不是基督；我依然爱你。如果我摇签，发现你是一个骗子，我会为你哭泣而祈祷，虽然我不能跟从谎言，但这不会减少我对你的爱。撒母耳为了扫罗，终生哀哭，

严格禁食。所以即使我知道你是丧失了，我的爱也会坚持。如果是你，而不是撒旦，错误地起来反抗天国，以致失去可爱的翅膀，从高天坠落，不再有回头的希望，我依然会希望天父原谅你，让你终于可以回归天父，同行在天堂的黄金道上。

如果你是一个神话，我会离开现实，活在你的神话中。如果他们证明你不存在，你就会从我的爱中得到生命。我的爱是疯狂的，没有目的的，正如你的爱一样。主耶稣，请在这里找到一些快乐。更多我无法给你了。

当我完成这首诗时，我不再感到撒旦的临近。牠已经走了。在寂静中，我感受到了基督的吻。当祂亲咀时，每个人都安静。安静和欢乐又回来了。

第二章

经过近三年的单独监禁，我已经濒临死亡。我经常吐血，连杜上校都有些惊慌。

“我们不是纳粹。我们不是杀人犯，”他说，“我们要你们活着——并且受苦。”

他们传召了一位专科医生。为了避免感染，医生从牢门的窥视孔为我做了“远处诊断”，就命令将我转移到监狱医院。于是我就得以从内政部的地下牢房抬出来，再见外面的天地。在院子里我看到了月光和星星。躺在救护车上时，我瞥见了熟悉的布城（Bucharest）。我们正朝我家的方向驶去，我一度以为自己正在被带回家等死。然而当我们快抵达家门时，救护车却转弯，开始上坡去，抵达市郊的一座小山顶。我就知道这是瓦

卡雷 (Vacaresti) 修道院，这是布加勒最大的修道院之一，在上个世纪，当时的政府把它改为监狱。精美的教堂和礼拜堂变成了储藏室。僧侣密室之间的墙壁已被拆除，使它们成为容纳多人的大囚房。但他们还保留一些小密室，作为单独囚室。如今我便是关在其中一间。

在警卫把我从救护车上抬出来之前，他们用一张床单裹住了我的头。然后二名警员夹着我的双臂，把我半拖半抬，走过庭院，爬上楼梯，沿着阳台走下去。当床单被移除后，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听到一名警官在外面的阳台上对一名警卫说：“除了医生，任何人都不能见这个人。即使医生来了，你也必须在场监视。”我的存在必须保密。

那名警卫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男人，他对这些预防措施感到好奇。警官一走，他就问我做了什么。我说：“我是一名牧师，是神的孩子。”

他俯身低声对我说：“赞美主。我是耶稣的军兵之一。”他的意思是，他是《上主之军》的秘密成员，这是一个从东正教教会分支出来的复兴运动。尽管受到共产党人和东正教祭师们的迫害，该运动还是在村庄中迅速蔓延，信徒达到数十万。

这名守卫名叫达奇 (Tachici)。我们交换了圣经经文，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了我——以前，曾有狱警因给囚犯一粒苹果或一支香烟，就被判十二

年徒刑。我太虚弱了，无法下床，常常躺在自己的污物中。早上的一小段时间里，我还可以清晰思考；过后就神志不清，翻来覆去。我睡得很少。但在这里，至少也有一扇小窗，透过它我可以看到天空。早上，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了——原来是鸟啼！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鸟鸣了。

我告诉达奇：“当马丁路德在树林里散步时，常向鸟儿举帽行礼说：‘各位神学家早安！你们醒来唱歌，但我这个老糊涂，却不懂得依靠天父，倒是天天为每一件事担心。’”

窗户露出了草地和院子的一角，通常是空的。有时，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走过，甚至不敢抬头。他们必须“本着阶级斗争的精神”行医。当囚犯们被放出去作体操时，我能听到他们说话。过去我在单独囚室，有时会渴望听到人的声音，但现在却感到烦恼。我发现人们谈的，几乎都是废话。他们想的，也尽是琐碎事。

一天早上，一位老人的声音从隔壁牢房传过来：“我是莱昂特（Leonte Filipescu）。你是谁？”

我认出这就是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先锋，才华横溢。党方用尽他的好处后，就把他抛弃了。“战胜你的疾病，”他喊道，“不要屈服！两周后我们就自由了。”

“你怎么知道？”我问。

“美国人如今正在把共产党人赶回朝鲜。他们两周后就会到这里。”

我说：“但即使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对，他们也需要两周以上才能到达罗马尼亚？”

“废话！距离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他们有超音喷气机。”

我没有争论，我发现囚犯们活在幻想中，幻想越精妙复杂，越是给力。今天的粥是不是稠了一点？这意味美国的最后通牒吓坏了俄罗斯，所以我们的待遇正在改善。有人被狱警打倒了？这意味着共产党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正在利用他们最后的时光。人们精神抖擞地从外面体操回来，报告说：“米迦勒国王（King Michael）已宣布他将于下个月复位！”

没有人可以想象自己将在监狱里度过十年或二十年。一个月后，莱昂特转移到另一家监狱医院，后来我们在那里再次见面。当他离开隔壁房时，他仍然抱着早释的希望。取代他的是法西斯铁卫队的领导人拉杜（Radu Mironovici），他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对犹太人却充满仇恨。

有一天，我请警卫达奇扶我坐起来，然后我问拉杜说，“当你在东正教教堂领受圣餐时，面包和酒是否转化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他说是。

我继续说：“你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如果酒变成了祂的血，那么就是犹太人的血了，是吗？”

无奈之下，他承认了。我接着说：“耶稣说，吃祂身体、喝祂血的人就有永生。因此，为了获得永生，你必须在你的雅利安人（Aryan）的血液

中注入几滴犹太血液。那么你又怎能恨犹太人？”

他没有答案。我恳求他明白，跟从耶稣，又恨犹太人，是荒谬的；就如一个共产党反犹一样荒谬。（因为共产党追随的就是犹太人马克思。）拉杜后来被转移到一个遥远的牢房，但他告诉达奇说：“我生命中虚假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了。我是一名基督徒，但太骄傲了，跟不了基督。”

2

我还在发高烧、恶心头晕时，狱警却来，蒙上我的眼睛，带我沿着走廊走。当眼罩摘下时，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大房里，窗户上有铁栅栏。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对着我。有人告诉我，这是法院，他们就是法官。

“已经有一名律师为你辩护，”法院主席说。“他已经放弃了你传唤证人的权利，你可以坐下了。”——警卫扶我在椅子上，同时给我注射药物以稳定我的精神。当恶心和头晕过去后，检察官站了起来，说我在罗马尼亚犯的罪，就如南斯拉夫的铁托（Josef Broz Tito）一样，都是错误的主义。我当时还以为自己神志不清，不能听得清楚。在我刚被捕的那年，铁托元帅正是国际共产党的大红人，被公认为英雄。我不知道他后来被

指控为叛徒。检察官继续对我的罪行进行漫长的陈述：说我通过挪威与瑞典教会宣道会，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进行间谍活动，传播帝国主义，渗透到党内，目的是摧毁共党。当他的声音继续时，我感觉自己开始从椅子上滑下，审讯暂停，他们又给我再加上一针。

辩护律师已经尽力而为，但做不了甚么。

“对于这些指控，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主席问。他的声音似乎来自远方。只有一个念头进入我的迷糊的大脑。

“我爱上帝，”我说。

然后我听到了判词：二十年的苦役。这审判只用了十分钟。当我离开时，他们又把我的眼睛蒙住。

3

两天后，达奇低声对我说：“你要走了。上帝与你同在。”另一个警卫跟在后面，他们把我抬到大门。我又看到了布城的景色。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下一次再见是六年之后。他们把五十磅重的铁链，用锤子固定在我的脚踝上。然后抬我上一辆卡车，车里已经有四十个男女。所有人，甚至病人，都枷上这种锁链。在我附近，一个少女开始哭泣。我试图安慰她。

“你不记得我了？”她抽泣着。

我仔细看了看，但不能辨认。

“我是你教会的成员，”她说。自从我被捕后，贫困使她开始偷窃。她告诉我，现在她必须服刑三个月。

“我很羞愧。我曾在你的教会，现在你是烈士，而我却成了小偷。”

“我也是一个罪人，蒙上帝的恩典得救，”我说，“信基督，你的罪就马上清除，一干二净！”

她吻了我的手，应许说她出狱后，马上就通知我家人。但我晓得她感到我活不了多久。

在铁路的支线，我们被装进一辆专门运送囚犯的火车厢里。窗户又小又不透明。当我们缓慢地穿过平原进入喀尔巴山麓（Carpathian）时，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患有结核病，于是肯定正在前往奥克纳监狱（Tirgul-Ocna），那所监狱有结核病的疗养院。大约四百年来，囚犯一直在这所监狱的盐矿工作，三十年前，一位著名的医生罗曼（Romanscanu）在当地建立了一所结核病疗养院，后来就捐赠了给国家。在共产党接管之前，这所肺病院名闻全国。

经过一天一夜，频密停顿的行程，我们才抵达二百英里外的奥克纳镇（Tirgul-Ocna）火车站。该镇有三万居民。我与另外六个也不能行走的犯人，一起被塞进一辆手推车的后座。其他的犯人

就拖着我们的卡车，到市郊的一所大建筑物，警卫在一旁监视。当我被抬入时，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阿迪医生。他曾是一名法西斯党，后来信主，成了我全家的朋友。他赶紧过来给我检查。

“我自己也是一名囚犯，”他说，“但他们让我执行医务。这里没有护士，只有我一名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彼此照顾。”

他量了我的体温并做了检查。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不隐瞒你，”他回答道。“我们做不了甚么。您大约还能活两周。尝试吃他们给你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好。否则……”他碰碰我的肩膀就走开了。

过了几天，与我同坐手推车的六人中，两个死了。先前我听到其中一个人沙声向阿迪医生恳求，“医生，我发誓我好多了。烧退了。今天我只咳了一次血。别让他们把我送去四号房。”

我问那位送粥的人，四号房是甚么。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盘子，回答道：“当他们知道你没有希望时，就送你去那里。”

我试着吃粥，但吃不下去。有人用勺子喂我。但食物不能下咽。阿迪医生说：“我很抱歉，但他们坚持这么做。你得去四号房。”在那里，我又与手推车的同伴们会合了。

我大概看来已经死了。囚犯们经过我的床脚时，都会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我经常是昏迷的。如果我呻吟，其他人就会把我翻过来，或给我水喝。阿迪医生很无奈。

“如果我们能获得一些现代药物就好了，”他说。据称这是美国新药，称为链霉素，对结核病有奇效。但当阿迪医生向上级要求时，党方说这纯是“帝国主义的宣传”。

在接下来的两周，和我一起进来的四个人都相继死去。有时我在谵妄中，不确定自己是死是活。晚上我睡得很短，常被剧烈的痛苦惊醒。我身上的十几个疮口流脓；我的胸部也因此而肿胀。我每天都吐血，这种疾病也影响了我的脊椎。为了减轻疼痛，狱友平均每晚将我翻身四十次。灵魂与身体联系的纽带，已经是最微弱了，我已经到了物质世界的边缘。我问我的守护天使说：“你是什么守护呀？如果你不能保守我免除痛苦，至少也要保守我脱离不合圣徒的亵渎思想吧？”在千分之一秒的闪烁中，我看到了他：他似乎有许多手臂，像印度神明克里希纳（Krisnan）一样，我同时听到他的声音：“我不能为你做我该做的一切。我也是一个中途返回的迷失者。”

早上，我想起东正教神秘主义者谈到“黑暗天使”，他们是堕落的天使，但却得以归服侍神。但我发现，无论一个人的回归是多么深刻，都不能完全涂抹过去（失败的痕迹）。那时我不晓得圣经，或是基督教的信条。那时我的大脑不能操作，于是不能判断这异象的价值。但这异象却给当时艰苦中的我，一些解释，于是就给我极大的帮助。

我渡过了第一次危机。阿迪医生的怜悯开始变成惊讶。我没有药物，但清早的一个小时，高烧稍微减低，我的头脑也开始清醒一些。我可以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和同伴。

5

这间房子有十二张床，都排的紧密，房间里有几张小床头柜。它位于一楼。大窗户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囚犯在菜地里干活。再外边就是在高墙和铁丝网。

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警钟，也没有大声喊叫的狱卒——事实上，这里几乎没有警卫。由于担心感染；狱卒们都回避病人。于是奥克纳监狱是远程管理的。因这缘故，它就成为罗马尼亚较自由的监狱之一。虽然我们囚犯们没有获得任

何供应。我们穿着被捕时的衣服。多年后，各人就必需利用任何到手的破布，补了再补。

普通罪犯把食物送到政治犯地区的门口，然后政客们把食物运到各个牢房。那些能走路的人自己去桶里取口粮；其他不能走的，就由他人送到床头。每顿饭都有水煮的卷心菜、几粒豆或一碗玉米或大麦熬成的稀粥。

身体状况还好的囚犯在大楼周围耕种。其余的人则躺在木板床上，闲聊着打发时间。但在四号房——这里被称为“死房”，因为还没有人活着离开它——气氛则完全不同。

当我在这四号房的期间，几乎每一位同囚的室友后来都死了，他们的床位由新人取代。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过世的人中，没有一个到死还是无神论。不论是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圣人、杀人犯、小偷、牧师、富有的地主和最贫穷的农民，在临终前都开始寻求与神和好。

虽然早些时候，这些人还经常彼此激烈争吵，彼此践踏，然而却没有一人，在还没有与神并与人和好之前就死去。

住在这死房时间最久的院长告诉我说，他屡次看到有人进来时，极为顽固不信；但在死亡临近时，他们的不信就崩溃了。

常言道：“一只猫过桥，并不意味桥身坚固。必须有火车通过，才能证实。”

因此，一个人坐在安乐椅上，与妻子共享点心时，自称为无神论，并不证明无神论可靠。真信念必须能承受巨大的压力，无神论从来就不能。

6

老莱昂特常向我们背诵莎士比亚的片段，或告诉我们有关他的自传，给我们欢乐。他第一次因政治煽动而被捕是在1907年。后来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在1948年来逮捕他时，他们对他说，“我在你们未出世之前，已经为社会主义下牢了。”秘警们建议他加入共产党，好共享胜利的果实。

“我告诉这些年轻人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拥有两只手臂的活体——左手是和平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右手是武装革命的共产主义。切断其中一，社会主义就成了独臂侠。’他们就笑了。”

莱昂特被判二十年监禁。“一名狱卒告诉我说：‘你会死在狱中。’我回答说：‘我可没有被判死刑！你们千万别杀我！’”

他告诉我们说，他最初是一名鞋匠。自学成才，向往生命中的美善。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以为教会总是站在压迫一边，神职人员受了富人给的小利，就许诺穷人在天堂得到回报，叫他们甘心在地上服侍富人。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莱昂特否认上帝的存在，其实

只是反对他对这神一词的原始概念。他并不反对爱、正义和永恒。

我就把这个告诉他。

他回答说，“我相信并爱耶稣基督，他是人类中最伟大的，但我不能将他视为上帝。”

这次谈话后不久，他的健康就崩溃了。两周后，在一系列的出血之后，结局到来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耶稣”。那一周有多人死亡，莱昂特赤身被扔进了其他囚犯挖的公共坟墓里。

当这个消息传到四号房时，托贝将军从角落里回应道：“这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党结盟的后果。”

伊斯库教长在胸前画了十字，说，“至少我们可以感谢神。莱昂特终于回归神。”

布库尔军士长不同意。“不。莱昂特说他不认为基督是神。”

我说：“莱昂特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肯定在那里看见了真理，因为他爱耶稣。耶稣不会拒绝任何爱祂的人。一个强盗在骷髅山（各各他）向耶稣说了一句好话，耶稣就许诺他天堂。我相信耶稣肯定接纳莱昂特的爱，虽然在地上他无法辨别真伪。”

布库尔不爱任何人，他只崇拜自己特殊的国家理念。他喜欢在他的村庄担任总督，在那里伸张他独特的正义。他对众人说，作为警长，他会如

何殴打小偷和乞丐。他也殴打自己的手下——如果他们敢顶咀。还有，他尤其喜欢殴打犹太人。

“他们身上不会留下任何伤痕，”他自豪地说。“你只要先把松散的沙包放在他们的背上。然后才打。这同样很痛苦，但他们却不能控诉你，因为没有伤痕！”

布库尔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在新政权下被废黜。他已经准备好打压反共人士，就如殴打任何人一般。

尽管布库尔病重，但他拒绝承认这个。一天晚上，阿迪医生给他做检查时，他突然喊道：“你为什么把我留在这房间？我没什么大问题。我和这房子里的其他病人不同！”

阿迪医生亚看了看温度计，摇头说，“不是这样的。你的病况是这里最糟糕的。你该停止争论，想想你的灵魂。”

布库尔勃然大怒。在医生走开时，他喊道：“你以为你是谁？”然后又说：“我怀疑阿迪有犹太血统。”这就是他字库里最恶毒的形容词。

布库尔又喜欢与他的临床伙伴莫伊吵架。莫伊是一个小个子的犹太中年人。

“铁卫队晓得如何对付你。”布库尔说。

可是莫伊却温和的回答道，“你知道吗？我正是因为被当作是铁卫队，所以才下牢的！”众人都大笑。

“真的！”莫伊辩护说。“当铁卫队失势后，凡是拥有铁卫队绿色制服的，就是可怕的罪行。我想我们犹太人在铁卫队手下吃尽苦头，如今应该捞回一笔了。我只要用贱价就能从商店买下剩余的绿色制服，染成蓝色，就可以出售了。当我的屋子充满了绿色制服之后，警察就来检查。他们不听解释。于是我就成为纳粹分子，银铛入狱。”

他们是一对奇怪的搭档：身材魁梧、好欺负人的布库尔和安静、具有敏锐讽刺感的小莫伊。两人中，布库尔常处下风。尽管他自诩为一名好战的基督徒，但他的一生都是与上帝的争吵。他去过教堂，但那里没有人引导过他。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神父。他村里的神职人员并不是什么宗教师，而是礼仪大师。现在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又濒临死亡，也不晓得信仰是什么。

当他越来越虚弱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你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但信心可以用两个词表达，‘虽然’和‘但是’。约伯说，‘虽然主杀了我，但我仍要信靠他。’圣经多次出现这样的形容。为的是给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可以有盼望。”

布库尔很高兴我对他感兴趣。但他仍然没有对自己过去的残忍表现出悔意，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阿迪医生是对的。“我快要死了，”他惊恐的说，“我是为了祖国而死。”

他静静地躺着。昏迷几小时后，醒来时他就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忏悔。我罪孽深重，我不能在死的时候想起它们。”他的声音令众人异常沉静。他告诉我们，他如何杀了数十名犹太人——不是按照命令行事，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受惩罚。他曾谋杀了几名妇女；有一次，他射杀了一名十二岁的男孩。他像老虎一样嗜血。

在说完这些后，他喃喃地说，“如今魏恩波先生必然恨我了。”

我回答说：“不。你如今自己恨恶这个杀人魔。你正在辱骂它，拒绝它。你不再是那个杀人犯了。人是可以重生的。”

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微弱的抓住生命。“昨天我还没有说明一切，”他说，“我缺乏勇气。”

他说他曾经向母亲抱着的孩子开枪，当他的子弹完了，他就用棍棒打死她们。他的暴行似乎没有尽头，但当最后完结后，他就昏睡了。他的呼吸变得沙哑而不规律，胸口急速起伏，好像无法呼吸到足够的空气。我们都沉默了。他双手在脏兮兮的毯子上握紧又松开，然后紧紧抱住脖子上的小十字架。他的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嘎嘎声，呼吸就停止了。

莫伊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向走廊里的一名囚犯喊道。很快，两个人来抬走布库尔的尸体：清晨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倾泻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但现在，那双血丝的眼睛闭上了，咀角的残

酷线条也放松了。他死后的面容显示出一种他生前从未体验过的平静。

7

四号房充满了仁慈和人性。其他囚室的犯人经常来和我们一起过夜，帮助临终的人。

复活节那天，一位朋友来探望前铁卫队成员加芬库（Valeriu Gafencu）。他带来了一份用纸包着的礼物。“这是走私货，”他说，“打开来看看。”

加芬库打开纸，露出两块闪闪发光的白色结晶——冰糖。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糖了。我们消瘦的身体渴望它。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加芬库和他手中的奖品。可是加芬库却慢慢地把糖又包起来。

“我现在还不需要吃它，”他说。“今天可能会有比我更困难的人。但谢谢你。”他小心翼翼地将礼物放在床边。

几天后，我的发烧越来越高，身体也越是虚弱。冰糖就从一张床上传到另一张床上，直到落在我身旁。

加芬库说：“这是给你的礼物。”我感谢了他，但没有动它，以防第二天有人更需要它。当我

的危机过去后，我把它给了索特里，他是两名希腊共党的老大，他的病情严重。

于是两年来，四号房里的糖从一人传到另一人，有两次又回到了我的床头。每次，患者都有力量抵抗，无需吃糖。

索特里和他的朋友格拉夫喜欢吹嘘他们在希腊内战初期的战果。他们曾经袭击了阿多斯山的修道院，抢劫了他们能携带的一切，砸碎了他们留下的东西。阿多斯山禁止女性参观，两千名僧侣中的许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女性了。“我们带着一群女游击队员同行，”索特里说。“你该看看那些老男孩们如何蜂拥而来。”

特里斯还可以说笑。当他还有盼望可以活着出去时，他可以吹捧自己的无神论。但当死亡临近时，他就开始求神。只有一位神父的呢喃，许诺天堂的应许，才能让他安静。然后他也找到了放弃这两块糖的巨大道德力量。

他的尸体由一名经常进来帮助我们的囚犯处理，准备埋葬。本房的人都称他为教授，他名叫波普(Popp)。他那稍驼的背、学者般的形象很少没有伴随着一位正在向他学习历史，法语等科目的学子。

我问他没有书写的材料，怎能授课。他说：“我们用一块肥皂擦桌面，然后用尖物划字。”当我钦佩他的坚持时，波普天真的蓝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我曾经以为，教书是我的生计。在监

狱里，我才了解到，我教书是因为我爱我的学生。”

“那么你正如神父所说，有一种使命吧？”

“正是，”他回答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价值。”

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看起来很不安。“牧师，我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例如，在我上一所监狱，奥克勒，里面的教堂变成了储藏室。党方要求人拆掉尖塔上的十字架。没有人愿意干……最后是一位神父自愿去上去拆。”

我承认说，不是每个圣职人员都有一颗祭司的心，也不是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都是真基督徒。“一个去理发店剃须的人，或是一位向裁缝订做衣服的人，都不是门徒，只是顾客。所以，一个来到救主面前，只为得救的人，是救主的顾客，不是门徒。门徒是一个对基督说：“我渴望做你的工。从一地到另一地，消除恐惧；带来喜乐、真理、安慰和永恒的生命”。

波普笑了。“但是那些在最后一刻才成为门徒的呢？我必须说，看到这么多坚定的无神论者最终变成信徒，令我惊讶。”

我说，我们的思维并不总是在同一个车挡运作。“天才有时也会讲笑，或者与妻子争吵，但我们不会照着他那时的笑话，评判他为一个傻瓜。我们也该在我们的思想的紧急关头如何表现，评估它的能耐。当在一个人面临死亡，他里面的人

正在挣扎求生时，他的选择才算数。那时他的无神论总是倒台。”

“你想为什么像布库尔中士这样的人，会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他问。

我说：“我曾经住在铁路附近，白天我并不察觉火车的经过，因为城里很吵。但到了晚上，我就清楚地听到火车在远处传来的汽笛声。生活的喧嚣可以叫我们听不到良心的声音。但在监狱的寂静中，人们就开始听到内心的声音。”

伊斯库院长一直在静静地听。如今他插话道：“在我上一所艾乌德（Aiud）监狱，有一个杀人犯被单独监禁。他在夜里不断醒来，大声喊道：“隔壁的是谁？为什么他不停止敲墙呢？”

“有什么好奇怪？”波普问道。

“为什么，隔壁牢房是空的呀。”

莫伊说，“在我上一个监狱有一位曾经谋杀一位拉比的铁卫队。他肯定那拉比一直坐在他的肩膀上，不断的挖他的肉。”

8

由于我没有力气洗澡，波普教授就为我清洗。我问他所住的牢房有没有淋浴室。

“当然有，”他说。“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我们拥有最新的设备，只是没有水。我们的淋浴间已经干涸多年了。”他挺直了腰，继续说：

“你听过一位共产党和一名资本家在地狱相见的故事吗？他们看到两道门。一个写着“资本主义地狱”，另一个则是“共产地狱。”尽管这二人是阶级敌人，但此刻他们却一起商议，哪一个比较好。那位共产党说，‘同志，我们到共产部门去。在那里，每逢有煤，就不会有火种。有火种就不会有煤。即使他们有煤又有火种，火炉也会整个崩裂。’”

听见的人都笑了。教授继续给我洗澡。农民阿里斯（Aistar）说：“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是亚当和夏娃。”

“为什么？”波普问。

“因为他们没有衣服，没有房子，连苹果也必须二人共享一粒——而依然以为自己正在乐园。”

笑话和故事对坐牢的我们非常重要。

人们整天躺着，只想着自己的痛苦，任何能帮助他们忘记自己忧愁的，就是一种恩慈。我经常连续讲几个小时，尽管我病了，而且饿得头晕目眩。一个故事就像一块面包，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当波普催促我保存体力时，我说我还有足够的气力，可以在那天早上讲多一件轶事。

“《塔木德》(Talmud)告诉我们，一位拉比走在街上，听到先知以利亚的声音说：‘你虽禁食祈祷，但还不配天堂的高位。因为那种尊荣只留给更好的人，就如马路对面的二人。’”拉比赶忙追上那二人问：‘两位先生，你们乐施好善吗？’

“他俩笑了。‘不，我们自己就是乞丐。’

“‘那么你们经常祈祷吗？’

“‘不。我们都是无知的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祷。’

“‘那么请告诉我，你们做什么。’

“‘我们说笑。当人们悲伤时，我们就使他们发笑。’”

波普看来惊讶。“你是说，那些叫人发笑的，可能比禁食的在天堂更有尊荣？”

“这就是《塔木德》的教义，这是一本犹太智慧书。但我们也可以在《圣经》诗篇第二篇读到，上帝也发笑。”

波普帮我穿好衣服，说道：“祂在这里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但果然有神吗？牧师，为什么祂不救助我们？”

我回答道，“一位牧师到一位遭丧的家。他看到那位母亲正在试图安慰她哭泣的女儿。这女儿问，‘牧师，你说神有慈爱的双手。如今祂的手在哪里？’牧师回答道，‘就在你的肩头上。你妈妈的手便是。’”

“基督在多种方式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祂，他们受到殴打和羞辱，却仍然继续帮助我们。瓦卡雷监狱的一些官方医生因为企图私下带药品进去，就受判十年监禁。

“其次是，基督也在那些努力减轻他人重担的神父和牧师身上，也在所有尝试给他人食物、衣服和扶助的基督徒身上。第三，基督也在那些教导我们有关上帝的人中，还有在讲故事的人中。祂不单是在那些服务你的人中，也在那些你可以服务的人中。

“耶稣告诉我们，在最后的审判中，上帝将把善人和恶人左右分开。祂将对右边的说：‘来吧，进入自创世以来就为你们准备好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是一个陌生人时，你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狱里，你来找我。这些义人会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基督就回答：‘当你对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样行，就是向我行了。’”

9

加芬库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监狱度过。他是其中一名刚认识基督的铁卫队员。如今他们一反过去的行径，力图服务众人，弥补自己过去的错

误。加芬库每天将自己微薄的口粮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我们当中最弱的人。他已经完全放弃反犹太主义了。当他的一些老战友到四号房探望时，他说，“我希望看到我们罗马尼亚完全由犹太人统治。”他的战友们都惊呆了。

“是的。”加芬库平静地说。“总理、议员、公务员——所有人。只要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像古代犹太统治者，如约瑟、摩西、但以理、圣彼得、圣保罗和主耶稣基督。因为如果我们再有一些像安娜这样的犹太人，那么罗马尼亚就完蛋了。”

加芬库十九岁时就入狱了。他的青春已经过去了，他还没有认识过一个女孩。当别人谈论性时，他问：“性是什么样的？”

有一天他告诉我，“我的父亲被俄罗斯人从比萨（Bessarabia）驱逐出境。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我在学校遭到殴打，然后因为逃学，参加铁卫队而入狱。我从未见过一个善良、诚实、有爱心的人。我对自己说：‘基督不过是一个传说。今日世界没有这样的人，我也不信过去曾经有。’但我在监狱里几个月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我遇到了病人，他们乐意献出了自己的一点口粮（面包皮。）我曾和一位主教住在一间牢房里，他是如此善良，以致你觉得触摸他的长袍就能获得治愈。”

加芬库在四号房已经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无法仰卧，因为太疼痛了。他须要人不断地

扶持着。每一天，他对身体的控制力都在进一步恶化。他常常在床上大小便，等待他人清理。有时晚上必须等几个小时。体格较壮的外面病人必须为我们这些不能行动的人洗衣服、枕套，有时一天二十件。他们必须在院子里破冰才能到达冰冻的水。我自己的衣物在脓血中总是硬邦邦的，但当我试图阻止一个朋友洗它们时，他却生气了。

那位朋友也曾是一名铁卫，如今把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基督徒责任。加芬库从不抱怨。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有时会稍微移动一下头，表示同意或感谢。当得知他性命不久时，他的朋友们都聚集在他的床边，眼中含泪。他的遗言是“上帝的灵十分妒忌，要得着我们。”

当他走后，其他人跪下来祈祷。我说：“耶稣告诉我们，一颗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果实。人也这样。我们的肉身必须死去，才能获得更新。加芬库的内心已经充满基督的灵，如今必然结果。”

一位神父为他祈祷后，同伴们就用床单包裹他的遗体，送往太平间。在晚上，外面的犯人们把他埋葬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每逢想到加芬库，我们就想到他的冰糖。

不断涌入奥克纳监狱的新人，给我们带来外界的消息。有时，我们感到自己在监狱里的情况，似乎不会比外面差。“自由罗马尼亚的快乐工人和农民”的工资空前低迷。当局已经宣布每天只须工作八小时，但你可能需要十二小时才能完成你的‘正常积业’，然后还要‘志愿’加班，或参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于是家庭生活就全无时间了。无论如何，每个公寓里，都住着两家或多家人。

罢工是非法的。我们的一位新来者，一位名叫鲍里（Boris Matei）的老工会成员告诉我说：“四十年前，我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被旧政府抓入狱。如今新政府（共产）上台，我必须在监狱里工作十四个小时。”他的罪行是给德伊同志（总理）写了一封匿名信，代表他的工友抗议他们的恶劣条件，并声称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都有权拒绝劳动。于是秘密警察拥入他的机车仓库，采集了一万名员工的笔迹样本。经过数周的调查，他们就指控鲍里试图煽动罢工，判他十五年徒刑。

尽管如此，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依然没有动摇。鲍里完全不同情那些与他一起被坐牢的异议人士，包括共济会、扶轮社、神学士、通灵论者。他也无法同情那些因独立观点而被关押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以为这些人该知道，最好不要追求客观的真理。

鲍里认为，列宁在他的书中，强调在生活中必须寻找一种观点，而且坚持这一种观点。

“就是坚持党的路线吧？”我说，“但是这种说法颠倒了所有哲学概念。如果我从床上看牢房，我只能看到窗户。如果我从你坐的地方看，我就会看到门。如果我往下看，便只见地板，看不到天花板。於是每个观点其实就是一个盲点，因为它使你不能看到其他的观点。只有当我们放弃所有“观点”，并接受我们对整体的直觉时，我们才能找到真理。圣保罗说‘爱相信一切’——不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信条。”

但谈到宗教，鲍里就生气。他说，“没有上帝，没有灵魂。只有物质存在。我不信你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说他的论点肯定是来自共产主义的手册。我曾在那手册读到接吻的定义：“接吻是两对咀唇的结合，于是有微生物和二氧化碳的相互传播。”他听了笑了，但我坚持说：“这不是笑话。共产主义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人类精神，试图把人压缩在马克思主义的狭小紧身衣中。难怪亲吻的爱与渴望、在你的哲学中没有地位。当人缺乏了内里的精神，也会影响外面的物质。共产主义夺去了工人们的心，使人无心工作。于是共产国生产的東西，品质差劲，成了国际笑话。”

鲍里说：“我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在我们共产党

看来，所有人的存在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丧失，是走向完美的第一步。”

我想即使是狗，也会为自己口中衔着的骨头，与任何人打斗。但如果十五年的刑期不能治愈鲍里的幻想，那么争论就不太可能改变他。

而且我还有一种不愉快的想法：会不会他也是最新的线人之一？

打小报告就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你可能会因谈论上帝，或大声祈祷，就惹上麻烦；即使学习外语或教授外语，也可能被指控。通常，这些告密者是一位亲密的朋友——甚至在残酷的压力下，也可能是儿子、父亲、妻子、丈夫。事实上，对监狱外的“自由”人，被人指控的危险，比我们狱中人更可怕，也更令人恐惧（就如贫困对富人，比对已经贫困的人更具有威吓力。）而四号房比罗马尼亚任何监狱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因为在这里，人人都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11

在1917年11月，就是“震惊世界之十日”的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波普教授乘着鲍里不在牢房的时候，讲了一件轶事：

在共产主义胜利一周年的纪念日，新统治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举行了一场狩猎。后来他们在火边休息，列宁问：‘同志们，可以说说，你们以为什么才是人生第一乐趣？’

‘战争，’托洛斯基（Trotsky）回答道。

‘女人，’季诺维（Zinoviev）说。

加米涅夫（Kamenev）说：‘演讲——叫让一大群人着迷在你的魔力下。’

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但列宁坚持他也发表意见：‘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斯大林终于说：‘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快乐。真快乐就是恨一个人，同时多年来假装他是你的最好朋友。直到一天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的胸前，那时你就用利刃插入他的后背。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

房里许久无人说话。虽然那时我们也听闻一些有关斯大林的冷酷，但只在他死后，他的同志们才透露他如何杀害自己的众老友（包括列宁）。

第三章

好一段时间，人们一直在焦急地谈论苏瓦(Suceava)监狱和皮特(Pitesti)监狱实行的新制度，就是“囚犯教育囚犯”。这种制度不用书本，只用拳头。导师们通常是前铁卫成员。党方把他们组成为《笃信共产的囚犯协会》，简称《共囚会》(PCC)。据说成立这会的，就是杜卡(Turcanu)，利未(Levitkii)并福玛(Formagiu)。他们的行为似乎像野蛮人。

我们担心奥克纳监狱也会引入这种制度，但鲍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不信他以前的左派同伙们会允许暴行。

他说：“他们知道‘恐怖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思想家卡尔(Karl Kautsky)在俄国革命之初所写的。”

我说：“是的。我记得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托洛斯基（Trotsky）回答说：‘卡尔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将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可悲的是，托洛斯基自己的思想，不久后也被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有效清除’了。”

教长叹了口气，说，“我担心，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行使一项奇迹，这种长期恐怖和酷刑肯定粉碎任何人的抵抗。”

“我不信奇迹，”鲍里说，“没有奇迹我也能过得很好，谢谢。目前还没什么可以改变我的信念。”

在“再教育”领导人福玛短暂探访并指示启用该系统后，监狱的气氛变得更加糟糕。直到目前，尽管囚犯们有时也会被判折磨了大半天，但狱警们迟早也要去吃饭或睡觉，於是囚犯得到歇息的机会。现在有共囚会成员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他们有权随意日夜殴打我们、还手持橡皮棍。他们是当局精心挑选最暴力的囚犯。我们无处可逃：每五十名囚犯中就有十到二十名共囚会成员，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增长。那些愿意变成共产党的，必须也“劝服”他人入党，表明自己的诚意。

残酷的暴力不时夹杂着更加精致的残忍行为，并在医疗监督下确保囚犯不会死亡。医生本身往往也是共囚会成员。我认识一位图尔库（Turcu）的医生，在“检查”一名狱友后，他会叫停，给该囚犯注射以增加他的抵抗力，然后继续折磨。

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监狱。结核病患者被脱光衣服，躺在石头地板上，并用许多桶冰水淋湿。他们又把猪泔水倒在饥饿多日的囚犯面前。囚犯们双手被绑在背后，扒在地上舔食。无论多么卑鄙的羞辱，都无法幸免。在许多监狱里，人们被迫吞吃粪便和喝尿液。罪犯还被迫在公开进行性变态。我没想到会有如此下流的嘲弄。

那些坚持信仰的人最是受苦。基督徒被绑在十字架上四天。每天他们都把十字架倾倒，放在地上，众囚犯必需在被钉者的脸上和身上排便。然后这十架又重新竖立。一位被带进四号房的天主教神父告诉我们，在皮特监狱，星期天，他就被推入厕所的粪坑，用大便给人颁发圣体。

“你有服从吗？”我问。

他把脸埋在双手里哭泣。“我受苦比基督还多，”他说。

这些事情是在布城命令下，在监狱管理部门的鼓励下完成的。当局安排杜卡、福玛等专才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招募囚犯加入共囚会，确保这种运动不会失温。党的领导人，甚至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官员，如康斯（Constantine Doncea）和内政部副部长马林（Marin Jianu），也来参观。鲍里曾与马林共事，他就大胆地冲破警卫线，向马林抗议。但如果马林认出了他的前同事，这时他也不承认。他只说：“当一只猪殴打另一只猪时，我们不会干预。”实际上，党方已经与

共囚会划清界限，但允许他们继续酷刑。马林说：“把他带走。”鲍里就被殴打，直到他求饶。

这位昔日的工会斗士彻底崩溃了。狱方安排囚犯，日夜不断的羞辱和折磨他，直到他的精神几乎失常。他爬过去亲吻那些折磨他之人的手。

他说：“谢谢你们，同志们。你们给我看到了亮光。”然后他开始狂热地赞叹共产主义的美好和快乐，以及他过去的错误。在经历了这样的崩溃之后，他的自尊就要求他彻底转变；不然他在自己眼中就会显得可笑了。鲍里加入共囚会，而第一个挨他警棍的就是阿迪医生。

这种从俄罗斯引进的再教育制度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受害者把他们在数月的严酷审讯中保守的秘密，也供了出来。他们开始控诉自己的朋友、妻子、父母。于是又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捕。

2

在这期间，狱方从铅矿带了六名病人到奥克纳监狱，其中有神父。以后又有新“囚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久这些新犯就向铅矿的神父作忏悔，从而赢得神父们的信任。铅矿的神父们坦然谈及他们秘密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当他们被转

移到一个更大的牢房接受再教育时，才晓得他们一直在与奸细交谈。

其中一个来自铅矿的人被抬进四号房，满身是伤痕和血迹。他告诉我们说，负责的再教育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总是微笑，常常会问：“疼吗？很抱歉。让我们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吧。你喜欢这个道具吗？”

这受害人说：“如果我抓到那个人，我会活活剥他的皮。”

“没错，”老农巴達说，“再加上盐和胡椒！”巴達每天祈祷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神必消灭共产党，让他们受苦，折磨他们，可恶的猪！”

“为什么这样说？”我问他，“这不是基督徒的做法呀？”

他挥动拳头向天呼求。“我这么说是因为，神不许任何不诅咒这些混蛋的人进入天堂！”

许多人也像巴達。他们一心坚持活下去，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有机会能折磨他们的施虐者。他们相信有地狱，好煎熬共产党。

“我们决不能屈服于仇恨，”我说，“像鲍里这样的人，是因为遭受可怕的压力才崩溃的。”

但鲍里现在成了四号房的一个伤痛。由于他曾经攻击阿迪医生，狱中人人都恨透了他。由于监狱饮食恶劣，阿迪医生的背部和肩膀上长满了疼痛的疖子，那一阵子鲍里就专门击打医生的背部

。囚犯们会为阿迪献出生命，因为阿迪正在为他们献出生命。在阿迪被打后，他也必须躺在四号房。这时有人来说有一个重病的犯人请求见医生。

教长说：“医生病得太重了，不能动。”

阿迪问：“是谁？”

那人回答道：“鲍里。”

阿迪痛苦地从床上爬起来，跟那人走出房间。没有人敢说些什么。

3

以色列教长有时会谈到他在运河奴役营的经历，那里有数千人死于虐待和饥饿。这条运河主要是俄罗斯怂恿下开始修建的——因为这能更有效地消耗罗马尼亚的财力。同时，这伟大工程也有助于提高共产党的威望。当时的党方那么热衷于这个计划，以至当受命探测的工程师们发出警告，说河水不足于提供灌溉，又提供运河的航行水位时，他们就被视为“经济破坏者，”被拉去枪毙。罗马尼亚为该计划投入了大量资源，1949年至1953年间，超过20万名政治犯和刑事犯参与了该工程。

院长被送到阿尔巴（Alba）奴役营。这里有一万二千名囚犯住在围着铁丝刺网的简陋营房，每

人每天必须徒手搬动八立方米的泥土。在看守的殴打下，他们推着独轮车爬上陡坡。冬季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五度，送往营地的水，都在桶中结冰了。疾病盛行。许多囚犯为了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故意闯入集中营周围的禁区，希望被枪杀。

最残暴的罪犯就充当各营队的头目。每队约有一百名囚犯。当局按照各队的工作积效，给各头目个人的报酬，包括食物或香烟。基督徒归入“牧师队”，在那里，任何人画出十字形的标志（这是东正教教徒的习惯），就遭殴打。奴役营没有休息日，没有圣诞节，没有复活节。

然而，以色列教长说，在阿尔巴营他看见可贵的事。一位年轻的天主教神父克里斯（Cristea）惹上一位党奸细的不满。那奸细是一名前东正教神父。这奸细问克里斯：“你为什么经常闭上眼睛？是在祈祷吗？我挑战你说实话：你还信上帝吗？”

回答“是”意味着鞭打。

克里斯神父想了想，就回答道：“安德烈，我知道你正在试探我，就如过去的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一样。但耶稣回答真情，我也告诉你真相。是的，我相信上帝。”

“那么，你也相信教皇吗？”安德烈又问。

克里斯回答说：“我也相信教皇。”安德烈赶紧去找政治官员，政治官员走过来，马上吩咐克里斯站出来。克里斯很瘦弱，疲惫不堪，衣衫褴

褻，瑟瑟发抖。那位军官却是吃得饱足，穿着大衣，戴着俄罗斯毛皮帽。

“我听说你相信上帝？”他说。

克里斯神父就开口回答。在那一刻，人们就明白为什么登山宝训写道，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这是一件奇事，因为没有人闭咀说话。现在克里斯开口，人都知道，这是决定的时刻。基督徒们都留心听。

克里斯说：“当我被任命为神父时，我知道史上有数以千计的牧者为他们的信仰舍命。每当我走向祭坛时，我便向神承诺，‘现在我穿着美丽的长袍侍奉你，但即使他们把我关进监狱，我仍然会侍奉你。所以，中尉，监狱并不是反对宗教的理由。我相信上帝。’”

接下来的寂静只有风声打破。那位政治官似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你相信教皇吗？”

克里斯回答，“自从圣彼得以来，就一直有一位教皇。直到耶稣再来，还是有一位教皇。如今的教皇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他的承继者也不会。是的，我相信教皇。”

院长结束他的故事说：“我感到难以原谅我的东正教兄弟，就是那告密者。我虽然不是罗马的追随者，但那一刻我几乎要喊叫，教皇万岁！（Viua il Papa!）”

“克里斯神父怎么了？”有人问道。

“他被关在钉箱里一个星期，然后挨打。当他仍然拒绝否认信仰时，他就被带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4

在再教育制度下，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人们感到，除非有什么行动，否则我们要么就是被杀，要么就是向共产党投降（成为共产党）。有传言说共党囚犯正在酝酿某种抗议。这种囚犯是我们中间最大胆的：狱警们不那么粗暴对待他们，因为这些今天入狱的，昨天还在掌权，明天又可能会复位。

基督徒们彼此争论该如何做：如果发生骚乱，我们应该加入吗？或者是“让他们打我们的另一边脸”？几名囚犯争辩说，我们不该参与任何争斗。

我说：“人们常把耶稣描绘成‘温顺’的，但其实耶稣也是一名战士。祂用鞭子将商人赶出圣殿，并为祂的第一批追随者提供了《旧约》的指南，包括其中的火热行动。”

于是我们决定与叛变的囚犯合作。由于我们中间有很多告密者，还有反犹人士和犹太人之间的猜疑、农民和地主的不和、东正教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于是没有事情能以保持秘密。

但大家一致认为，一有机会就会同时采取一些行动。在奥克纳小镇，唯一的消遣是每周在距离监狱仅一箭之遥的体育场举行的足球赛。在五月一日，我们得知下午五时将在体育场举行一场劳动节比赛，全镇的人都会到场。这正是我们示威的机会。信号就是打破一只玻璃窗的声音。

比赛开始后不久，某处就传来微弱的玻璃破碎声，整个监狱顿时陷入混乱。四面八方的窗口都被击破了。盘子和杯子被扔到下面的庭院上。有人砸椅子。在一片喧闹声中，有人开始呼喊：“救救我们！救命！”从高窗俯瞰体育场，人们喊道，“我们在这里遭受折磨！你的父亲、兄弟、儿子都被谋杀了！”

比赛中止了。人群站了起来，很快就有数百人聚集在墙下的路上。里面，一名囚犯割伤了手腕，看守正试图用棍棒重建秩序。街上的人群很快就被挥舞着枪托的部队驱散了。剩下的任务就是恢复监狱秩序并清点伤亡人数。其中包括鲍里，他在试图从看守脚下救出另一名囚犯时被撞倒并受重伤。阿迪医生必需再次照顾他。我们发送了问候的消息，但没有回复。后来才知道当局已经把他送去另一所监狱了。

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当局没有马上进行报复，只是加强监狱的监管。凡被怀疑是主谋的，都被转移到其他监狱。由于其他监狱缺乏医疗设备，许多被转移的人不久都死了。

在拥挤的四号房，以色列教长每天咳嗽的时间更长了。他的身体因多年的饥饿和在运河中的暴露，生出可怕的脓疮。我们躺着看他死去。有时他认不出前来帮助他的朋友。当他清醒时，他会花几个小时低声祈祷，并且总是给人安慰的话。

运河上的其他幸存者也被送到奥克纳监狱。他们讲述的恐怖故事，让我想起以色列在埃及的奴役。但与以色列奴隶不同的，是这里的囚犯还必须赞扬压迫者。党方迫使狱中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写歌，称颂斯大林。以后每天早上，各营队出发前往运河奴役时，就必需一路排操，一路歌颂压迫者。

有一次，当一名囚犯倒地，医生宣布他死亡时，阿尔巴指挥官阿本上校（Colonel Albon）喊道：“懒虫！”他踢了尸体一脚。“工作去！”

我的床位于院长和年轻的瓦西之间，瓦西是运河的另一种受害者。他是一名普通法罪犯，受命带领“牧师队”。他不断地命令神父们不停工作，直到他们累倒。但为某种原因，阿本上校不喜欢瓦西，就残酷待他，几乎把他害死了。他的肺结核已到晚期。瓦西并不是一个天生邪恶的年轻人。他有一张粗糙的方脸，深色的卷发低垂到额

头，使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头小公牛。相貌坚强而无知，他太喜欢寻找他认为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以至无法安定下来，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的生活艰难。

他告诉我们，“一旦你们进入这些营地，你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离开。营长承诺，如果我照他的吩咐，就会得自由。”他想要好衣服，想要一个可以带去跳舞的女孩。党方让他选择加入受酷刑者或施酷刑者的行列。

“他们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到一个特殊的营地，就是训练秘密警察的地方，”他说。“他们命令我们射杀猫狗，然后用钢刺杀死幸存的。我说，“这种事我干不了。”教练就说，“那么我们就必需这样对付你。”

瓦西现在为自己感到难过。他一再告诉我，他在运河所做的种种可怕事。他没有放过修道院长以色列。他显然快要死了，我试图给他一点安慰；但他无法休息。一天晚上，他因呼吸困难而醒来。“牧师，我要走了，”他说。“请为我祈祷！”他又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喊着：“我相信上帝！”然后开始哭泣。

黎明时分，以色列教长叫了两位囚犯来，吩咐他们说：“把我抬出去。”

他们说：“你病得太重了，不能移动。”整个房间都骚动起来。“什么事？”有声音说，“让我们来帮忙！”

“你不能这样，”以色列说。“扶我出去。”

他们把他抱起来。“带我到瓦西的床边，”他说。

院长坐在折磨他的年轻人旁边，轻轻地将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不要怕，”他安慰道。“你还年轻，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用布擦去男孩额头上的汗水。“我全心全意地宽恕你，其他基督徒也会宽恕。如果我们宽恕，基督比我们好，祂更会宽恕。天堂里也有你的地方。”他聆听了瓦西的忏悔，也给了他圣餐。然后才让同伴们把他抬回自己的床上。

当晚，以色列教长和瓦西双双去世。我相信他们正在携手走向天堂。

6

第二天，阿迪医生告诉我，我应该是患有气胸，必须进行一个简单的手术，只需将一根空心针插入胸部，让空气进入就行了。这不怎样痛，然后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很高兴地发现波普教授坐在我的床边。他已经在吉拉瓦监狱关押了几个月，在再教育制度下也受了很多苦。我们聊了几个小时。

教授告诉我，吉拉瓦发生过很多自杀事件。其他监狱也是如此。在盖拉（Gherla）监狱和皮特甚（Piteshi）监狱，不断有囚犯跳楼自杀，直到

当局必须用铁丝覆盖天井，才能阻止他们。另有人用玻璃割腕，或上吊，或喝清洁液。一位可怜的东正教老神父曾多次从最上层的床铺摔到地板上，好几次死不了，直到最后头骨破裂，才能去世。

“他曾受过酷刑，”教授说。“他担心如果再教育者再次对他下手，他可能会崩溃并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曾有一位囚犯向他认罪，说自己曾经为共产党效劳。这老神父就禁止他领受圣餐，为期十五年！”

其中一些自杀者是名人，比如战前罗马尼亚政界的一位伟大人物布拉蒂(George Bratianu)，他悄悄地饿死了，在缺少彼此关怀的囚犯们中，没有引起注意。另一位是自由党领导人罗斯库。他在锡盖特(Sighet)监狱自杀：他曾经说，我国的共产党不像俄罗斯共产党那样可耻。但在共党利用他作为傀儡（当我国的宗教部长）一阵子后，就把他监禁，指控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再教育”运动在许多监狱引起了骚乱，而奥克纳的叛乱气氛仍在酝酿之中，这时又发生了两起事件，改变了局势。

在一次监狱视察中，人人憎恶的一位秘警上校塞皮努(Sepeanu)在巡视时发现菜地周围有一道新栅栏。“你为什么年建造这个？”他问司令官。“把木头这样使用，实在是浪费了。这些木头用来棒打反革命份子才好！”他说了就大笑。

这故事很快在监狱里流传开来，人人激愤。一位前少校喊道：“必须做点什么！”于是就决定他自己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塞皮努走后，这少校就对狱卒说，他有重要消息，必需直接告诉首都大官。

首都的高层就派遣一名特别官员前来。少校告诉他说：“正如你所知，我因为处决俄罗斯囚犯，所以服刑二十年。但是，作为一位旅长，我无需亲自动手。你知道行刑的人是谁？这人当时是一名中尉，名叫塞皮努。如今他成了共产党秘警的上校。”

塞皮努上校因此被捕，判处二十年徒刑。在审判期间，他透露了再教育运动在监狱造成的后果。

第二起事件涉及另一名秘密警察韦斯上校。他曾是安娜和其他政府高官的朋友。后来他失宠并被送进监狱。在皮特甚监狱，他落在共囚会残酷的领导人杜卡(Turcanu)的手中。一名帮助杜卡折磨韦斯的人后来告诉我说，“当杜卡折磨韦斯时，韦斯在一小时内晕倒了三次。我们用冷水浇醒他。他终于说：“好吧，别再折磨我了。我会把隐瞒的一切都说出来，看看你的老板受不受得了。”杜卡相信自己终于获得绝大的机密，肯定能叫自己获得释放。他对韦斯说：“如果你撒谎，我就杀了你。”韦斯说，“我有些事要披露，但不是对你。这事非同小可，涉及高层的叛徒。”

韦斯就被送往布城医院数周，那时他已经很虚弱，几乎性命不保。他在那里见到党的中委成员，就是安娜，卢卡，与乔治集团的政敌。韦斯告诉他们，这三位全能的部长请他们为他们制造假护照，以备匆忙之间，可以逃离罗马尼亚。他们也已经转移了大量资金到瑞士银行。这一信息立即传给该党秘书长德伊，他正在密谋对付安娜集团。

韦斯上校对再教育有很多话要说，并展示了他自己身上可怕的伤疤。高官们都吃了一惊。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同样的苦头。没有人晓得党的成员命运如何。今天的党领袖，可能就是明天的笼中鸟。于是党方开始调查。领导再教育的人都被带到秘密警察总部受酷刑。其中包括杜卡。他被判死刑。

反对派利用再教育丑闻，对付内政部长乔治。后来这也成为1952年政治清洗的重要因素。自从共产党接管以来，统治罗马尼亚的三巨头政府就被推翻。卢卡和安娜就成了国家通货膨胀，并集体农场失败的替罪羊。

7

许多来四号房帮助我们的外部囚犯都是农民，他们反抗土地被没收，所以下牢。罗马尼亚监狱满了这样的人。其中有数千人被枪毙。

他们讲述了令人痛心的故事。他们的屋子财产被没收，根据1949年的“土改”法，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偿。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奋起反抗，落在他们手中的官员就被枪杀，殴打或用汽油活活烧死。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农民缺乏组织，他们的叛乱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政府可以轻松地逐个镇压他们。

一位老牧人吉卡（Ghica）告诉我说，“秘密警察向我展示了两支生锈的步枪，说是在我的谷仓里挖出来的。如果我加入集体农场，就可以免受审判。我同意了。但是当他们来拉走我的牲畜时，我失去了理智，试图阻止他们。他们殴打我，逮捕我，把我关在这里十五年。于是我什么都丢了：土地、羊、妻子、和孩子。”

几乎每个农民都是按照这个方程式下狱。

另一位农夫讲述他的经验。他恳求至少可以保留羊脖子上的铃铛。官员们笑了，就让他采下铃铛。他把铃铛拿回家，用绳子连接，整晚不时地摇铃。天一亮，他就穿过村子，跑到党部，将书记刺死。

那一年，入狱的乡下人减少了。德伊在1952年出任总理。他放慢集体化进程，赢得民众的支

持。卢卡、安娜和乔治都被免职。随着他们的倒台，以及随后的党内清洗，德吉完全控制了大权。我们希望监狱条件会更加人道。但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变化。一切改变都必需来自莫斯科。

冬天来了，随着大雪，屋顶上挂着厚厚的冰柱，窗玻璃上都是白霜。外面的寒冷让你喘不过气来。到了十二月，积雪有六英尺。人们说这是百年来最冷的冬天。囚室没有暖气，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人都有两三条毯子，因为每次四号房有人死了，我们都会拿走他的床单。然后在狱方检查时，各人又只剩下一条毯子。整个冬天我们都穿着衣服睡觉。我们常常没有面包。烂胡萝卜汤更稀薄了。

在平安夜，监狱里的话题变得严肃了。很少人争吵，没有人说脏话，笑声也少。每个人都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我们感到一种与其余世人相连的感觉。这感觉是平日不能感到的。外面的人们离开我们那么遥远。

我谈到基督，但我的手脚冰冷如铁，牙齿打战，胃里冰冷的饥饿感似乎蔓延到全身，直到只剩下心还活着。当我无法再继续下去时，年轻的农民阿里斯就继续。他从未上过学。然而，他描述耶稣诞生的场景，就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谷仓里。听众们都眼中含泪。

监狱里的某个角落，有人开始唱歌。起初他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无法穿透我对妻子和儿子的思

念。但渐渐地，它在清新的空气中奇妙地广传，直到它响彻走廊，每个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当他唱完了，我们都很安静。守卫们缩在自己宿舍的火炉边，整晚都没有出来。我们开始讲故事。有人要求我也说一个。我想起方才的歌声，就告诉他们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

以色列王扫罗把牧童大卫带回王宫（大卫刚战胜歌利亚。）大卫爱音乐，他很高兴看到宫殿里挺立着一架非常美丽的竖琴。扫罗说：“我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件乐器，但我被骗了。我所有的琴师都试过了，但它只会发出怪声。”

大卫拿起它来尝试，就奏出美妙的音乐，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动了。竖琴似乎在笑、在唱歌、在哭泣。扫罗问，“怎么我的乐师们都不能使用这把琴，唯有你能？”

这个未来的国王大卫回答说：“在我之前，每个人都试图用这琴演奏自己的歌曲。但我让这琴唱它自己的歌。我想起这琴曾是一棵年轻的树，鸟儿在它的枝桠上歌唱，它的绿叶在阳光下自由摇动。后来它长大了，有人来砍它；你听到它在我手指下哭泣。我便向它解释说，这不是结束。虽然作为一棵树，它当时的确受伤以致于死，但也是新生命的开始，它最好的一部分木料被制成一只竖

琴，歌唱神的荣耀；因此你又听见它在我手指下欢呼。

“弥赛亚来时，许多人也尝试用祂的琴唱各人自己的歌，于是总是不对调。我们必须在祂的琴上，唱祂的歌，祂的生命、爱、喜乐、苦难、死亡和复活。唯有这样，这音乐才是真实的。”

我们在奥克纳监狱的那个圣诞，就听到了这样一首歌。

8

阿里斯在二月去世。我们需要挖开厚厚的积雪，然后敲破冰封的地面，把他埋在监狱的院子里。他埋葬的地点，与刚过世的同伴们并排，就如修道院长伊斯、加芬库、布库尔等。他的床就给了阿弗朗（Avram Radonovici）。阿弗朗曾是布城的音乐评论家，熟悉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乐谱。他可以独自哼唱几个小时，却也动听。但他带来了一件更珍贵的礼物。由于结核病影响了他的脊柱，他进来时，躯体包着石膏。我们看到他将一只手伸进石膏外壳的胸口底下，掏出一本破烂的小书。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过任何书了。

阿弗朗躺在那里静静地翻着书页，直到他意识到有几双热切的眼睛盯着他。

“你的书，”我说，“那是什么书？你在哪里得到它？”

“是约翰福音，”阿弗朗微笑道。“当警察来抓我时，我及时把它藏在石膏下面。”

“你看着我，就像乞丐看着一个人享用美餐一样。你想借用一下吗？”

我把这本小书拿在手里，就如一只活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救命药比这更珍贵了。我曾经背诵过很多经文，并在神学院里教授圣经，但现在却每天都在遗忘更多的金句。虽然缺少圣经也有一种特殊的好处：当我们阅读神过去对先知和圣徒所说的话时，就常忘了聆听祂今日对我们说的话。

这福音书从一人传到另一人。每个人都难以释手。我想监狱对于知识分子更为艰难：工厂工人和农民在监狱发现另一种群体，是他们过去未曾晓得的。但对读书人，坐牢就像一条鱼被扔在沙滩上。

许多人背诵了整本福音书，我们每天都讨论它；但我们必须小心哪些囚犯可以进入我们的小圈子，因为怕奸细。阿弗朗那本破烂的福音书帮助许多人归向基督，其中包括波普教授，过去他通过许多基督徒，开始接近信仰。约翰福音就给他完成最后的一段路，但还有一个障碍。

“我又尝试祈祷，”教授说，“但除了背诵我小时候学到的东正教公式，和向全能者求恩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给他讲了一位牧师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准牧师到一位临终的老人床边，准备在扶手椅上坐下时，老人却说：“请不要坐在那里。”于是准牧师拉了一张凳子过来，听老人的忏悔，并给了他圣餐。

老人这时稍为清醒，就说：“我且告诉你那张扶手椅的故事。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位老牧师问我是否有祷告。我回答说：‘不。我可以向空气祈祷吗？如果我大声喊叫，楼上的人也听不到，高天上的神怎么能听见我的声音？’那位老牧师温和地回答说：‘那就不要尝试祈祷了。早上只安静地坐着，在你面前放一把椅子。想象坐着的是耶稣基督，就像他坐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家庭一样。你要告诉他什么？’我说‘老实说，我会对他说我不信祂。’‘也是好，’牧师说，‘至少这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可以更进一步挑战祂：如果祂存在，让祂就证明这个。或者，如果你不喜欢上帝管理世界的方式，为什么不告诉祂？你不会是第一个抱怨的人。大卫王和约伯也曾告诉上帝说，他们认为祂不公正。也许你想要一些东西？便准确地告诉祂那是什么。如果你收到了

，请感谢祂。所有这些交流都是在祈祷的范围内。不要背诵祷告词！说出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这垂死的人继续说，‘我不信基督，但我相信那老牧师。为了取悦他，我就坐在那张扶手椅前，假装基督就在那里。一连几天，这都只是一场游戏。然后我知道祂真的与我同在。我和一个真正的耶稣谈论真实的事。我寻求指导并得到答案。祈祷变成了对话。牧师，五十年过去了，我每天都与那张椅子上的耶稣交谈。’

“当那老人去世时，这准牧师也在场。老人向他那无形朋友，就是坐在扶手椅上的那位，伸手道别。”

教授问：“你就是这样祈祷的吗？”

我说：“正是。我想象耶稣就站在我身边，就如你在我身边一样。在拿撒勒和伯利恒遇见耶稣的人，并没有向祂背诵祈祷文。他们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波普说：“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在巴勒斯坦与祂交谈的，许多却没有跟随祂？”

我说：“因为人们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干扰了他们的习惯。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祈祷弥赛亚的到来，而犹太人的最高议会，祷告的声音尤其大。但当基督（既是弥赛亚）来时，这些人

却嘲笑他，向他吐唾沫，把他送往死地。因为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有人扰乱了他们的舒适生活。如今许多人也是这样。连多数基督徒也是。”

波普教授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告诉我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感到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这种直觉在监狱里并不罕见。当外界与我们的视野隔绝时，我们就有一种新的感官。这是一种无需肉眼的透视。

我们变得非常亲密。有时他会静静地坐在我身边，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应该如此，但却很少如此。

9

冰柱在三月融化了，墙上的积雪开始变成碎片。光秃的树上长出了花蕾，我们听到鸟儿在唱歌。虽然我们手冻伤了、脚裹着破布、脸也冻僵，但我们感觉到生命又开始了。

有一宗令人震撼的消息，在整个监狱传播。一名囚犯在被送往镇上的医院时，看到一名妇女一边擦地板一边哭泣。“怎么了？”他问。那妇人回答说，“我们的父亲斯大林死了，这是报纸的头条新闻。”但没有一个囚犯流涕。每个人倒兴奋地猜测着这意味着什么。

波普说：“如果斯大林死了，斯大林主义也就死了；独裁者死后，他的独裁政权就无法生存。”

“但共产主义在列宁死后仍然存在呀，”有人回答。

几天后，我们听到火车鸣笛和钟声响起。这是罗马尼亚纪念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葬礼。监狱里回荡着笑声和咒骂声。狱卒们表情严肃，官长们都紧张。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经过数周的不确定性后，法律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我们晓得他是被派来调查监狱的情况。当他从一个牢房到另一个牢房询问时，却无人敢回答他。许多人想，这又是一种欺骗手法。当他到达四号房时，我说：“我有话要说，但除非你答应听我说完，否则我不会开始。”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这位官员礼貌地说。

我说：“检察官，你有一位出名的同行，名叫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当时人们要求他审判一个他知道是无辜的人。他对自己说：‘没关系，难道我必须为一个犹太木匠，丢了自己的事业吗？’

“尽管两千年过去了，这种违背公理的行为却没有被人遗忘。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所教堂，你都会听到众人念道：‘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遇难。’”

四号房的众囚犯都为我担心。

我说：“看你的良心，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受害者。即使党方以为我们有罪，该受处罚，但这里简直等同慢性的死刑。在你写报告之前，看看我们的食物、缺乏暖气，缺乏简单药物、污垢和疾病。问狱卒有关我们野蛮刑法。不要像彼拉多那样洗手不理耶稣。”

检察官阴沉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他听取我的发言的消息传遍了监狱，鼓励其他人发言。在他离开之前，我们得知司令办公室里传出了愤怒的声音。那天晚些时候，警卫们变得非常有礼貌，几乎带着歉意。一周后，这所监牢的司令官就被解职。

随着监狱生活的改善，我开始每天下床走几步。阿迪医生带了官方医生来看我。阿迪说：“我们无法弄清楚你的情况。你的肺部已经破碎，脊椎受到影响；我无法给你打石膏，也无法做任何手术。你的情况没有好转，但也没有恶化，所以我们要把你从四号房搬出去。”

我在那里的朋友都很高兴。因为我在那儿两年半，却还能活着离开这死房，这给他们看到希望。

“牧师你怎能办到？”一个人开玩笑地问道。“你这老残的身体怎么不听从医生的吩咐死去？”

我说：“如果你要真正的答案，我想你最终可以在医学字典里找到。但是在二战期间，我得到

了一个很好的教训。我遇到了一些去过俄罗斯的我国共产党员。我问他们，当时的苏联为何会放松对宗教的打压。一位党员说，“你告诉我们吧。”我回答说，我想这是由于英美的压力，因为她们曾帮助俄罗斯战斗。那位官员笑了。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这就是我要给的回答。但如果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就会说这是神垂听祈祷。”我沉默了，因为他说的很对。圣经也说一头驴曾经斥责一位愚昧的先知。所以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真像，我得以存活，是神听了祷告！”

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祈祷，包括囚犯们和我的教会成员。多年后我才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人为我祈祷。

第四章

四号房就像一座祭坛，人们在其中，为自己的信仰被融化，受改变。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但离开它却是一种降级。我又回到充满争吵、虚荣和自负的一般监狱中。在这里，许多人都很计较自己的地位，名份，阶级，头衔，令人可笑又可悲。这里有诸位“阁下”互祝美好的未来；饿到半死的将军们彼此询问健康状况。他们谈论将会重新获得过去的美好时光。

我给一位上等阶级，东卡先生，一根绳子，好牵住他的裤子，免于掉落（绳子在监狱是珍品。）第二天当我与他说话时，他并不理睬，因为我忘了称他为“准将。”

东卡就如许多人，会为一根香烟干任何事。如果没有办法找到香烟，他就找烟头。香烟的唯一来源是警卫，但法规指明，警卫不得给囚犯香烟。整夜这些警卫都在抽烟，把烟蒂扔到满地都是。早晨牢房打开时，犯人的班长和告密者们最先出来，因此他们得以在院子里收集烟蒂。但有时，其他囚犯也会找到一枚，他的朋友们就围过来，轮流吸上一口。

在一个早晨，“准将”东卡侧身靠近一名懒洋洋地抽烟的年轻警卫，紧迫地问：

“守卫！你要甚么我都给，只要你送我那根香烟。”

守卫笑了。“准将，你有甚么可以提供？”

东卡一无所有。但他他试图吹嘘。

“我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你给我的每一种好处都会有回报。”

“高位的朋友，嗯？那么准将也是一名共产党了，是吗？”

“我是一名忠诚的罗马尼亚人，中士。”

“如果准将真的是一名忠诚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我可能会给你这支香烟。”

东卡犹豫了一下，偷偷地环顾四周。守卫开始移动，似乎要走开了。

“不，等等。当然，我是一名忠诚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

警卫示意他的同伴们过来分享娱乐。

“准将，看来你应该会跳俄罗斯舞吧？就给我们跳一场！好像北俄大熊！”他诱惑地递出了香烟。

于是东卡张开了双臂，嘴唇上吐出一些泡沫，开始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警卫们笑到滚在地上。那守卫把香烟丢下。东卡就在囚犯们的脚下急忙寻找。

在狱方把东卡转移他处后，他的床位就给了一位新人，斯达将军。就如修行的习惯不能创造一位修士，军队的肩章也不能创造一名真军官。但斯达却是一位天生的将领，与东卡正好相反。虽然他个子矮小，但他的人格却叫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侏儒。他勇敢又有恩慈。他喜欢称呼全体同房的囚犯们为“男子汉们！”

斯达将军是一位赤足将军。他已经把自己的军鞋送了给人。我就与他共用我的，我们轮流隔日出去运动。他进来不久，第一次狱方容许家人送来食物包裹就到了。其中一包是斯达将军的。他在众目睽睽下，打开包裹。众人吃了一惊。里面有咸猪肉，火烤的香肠，葡萄干蛋糕，和巧克力。他的太太必然耗费巨大为他买了这种东西！可是斯达虽然已经挨饿八年，吃的只是一丁点面包

皮，却把这些珍品又包起来，交给我说，“牧师，做做好事，把这些平分给大家。”

2

在排除一切对手之后，德伊就是我们的独裁者。他坦白承认过去的重大错误，包括运河计划。在劳动了三年，花费数百万英镑，丧失几千条性命，只挖了五公里。原订的计划是四十公里。当局如今指控主要的工程师和运河管理层，说他们吞吃国家财产。三人被判死刑，其中两个马上处决。三十人被判刑十五年或终身监禁。新一轮评估，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多瑙河的水不足以维持运河的航运与浇灌农田。这正是开工之前，首两批工程师们的警告（那些工程师都因此被枪毙。）

这便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头十年里，罗马尼亚的主要“建设”工程。

运河沿途的劳改营如今用来收纳爆满的监狱囚犯。可是这依然不足容纳源源不绝的新囚犯。

当我们正在讨论运河工程的惨败时，波普教授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自从我回到奥克纳以来，我一直对你隐瞒了一些事。阿迪医生认为，你当时的健康情况可能受不了这个消息：你妻子被送去了运河奴役营。”

波普从不同的囚犯拼凑出这个事实。萨宾娜比我晚两年被捕。当局没有对她提出具体指控。她曾领导我们教会的妇女，拒绝按照党方给予的路线传教。在阿尔巴奴役营（Poarta Alba），萨宾娜被调到一队用独轮车运土的妇女小组。凡不达标的，当晚就没有面包。这群人包括爱国女学生和妓女、上流社会妇女和因信仰而受苦的妇女。在四公里众营，指挥官哥莫（Kormos）后来因强奸三十名女囚犯而被判处苦役：罪名是“损害政权的威信”。

阿尔巴营由臭名昭著的阿本（Albon）上校管理。为了生存，萨宾娜像动物一样吃草。囚犯们把老鼠、蛇、狗等动物都吃掉了。一些吃过狗肉的人都说狗肉很好吃。但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再吃时，他们都摇头。萨宾娜又小又弱，所以守卫们最喜欢把她扔进冰冷的多瑙河里，然后再把她捞出来。但她却没有死。这运河计划的失败救了她一命。过后她被送到养猪的国营农场。那儿又是另一个噩梦，艰苦的工作也几乎令她丧生。

教授说，瓦卡雷监狱的一名囚犯曾在那里的医院里与萨宾娜交谈过。

“她病得很重，”波普说，“但她会活下去。她知道你存活。她周围的妇女们谈到了一位已经垂死，依然在墙后讲道的牧师。她们告诉你妻子说，自从1950年，她们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相信你已经去世了。但她依然坚信你还活着，尽管所有证据都是相反的。”

这消息几乎令我崩溃了。那一刻，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联系萨宾娜。我试图祈祷，但一股阴郁袭上我的心头。一连几天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一天，我在监狱的院子里，看到警卫室旁边有一位非常神圣的老神父，他的白胡子在寒风中飘扬。他刚刚抵达，守卫们就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位警员在周围徘徊。

“这老神父在这里做什么？”其中一个问道。

“他是来听取囚犯忏悔的，”另一个笑道。

这位神父苏罗（Suroianu）果然不久就这么做了。他身上有一种神圣的光环，叫你想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也向他坦白透露了我的绝望感，并我以前未承认过的罪。原来罪恶的根源不常在忏悔室里揭露，却是向某些特定的人。但我越是指责自己，苏罗神父就越发用爱的目光看我，毫无轻蔑。我不信认罪是一种圣礼，但这时的我却是真的在忏悔。

其实苏罗比我们任何人受到更残酷的打击。他的瘸腿的女儿失去了丈夫（丈夫被当局关在我们的奥克纳监狱。）另一个女儿和丈夫被判二十年。他的一个儿子死在监狱里。第二个儿子，苏罗曾指望会成为神父，却反而指控父亲。由于父母的“反党活动”，他的孙子们被学校开除或被工厂解雇。然而苏罗整天都在给众人打气，鼓舞各人。

他从来不会用“早上好”来跟人打招呼，而是用圣经中的“喜乐！”他告诉我，“当你不能微

笑的那天，就不要开店。微笑只需要脸上十七块肌肉，皱眉却需要四十三块！”

我问他，“你遭遇了这么多不幸，怎么可能高兴呢？”

“为什么？不这样做就是一项重罪呀，”他说。“我们总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天上有一位神。祂也在我心中。今早我吃了一块面包，多么美味！你看，现在阳光明媚。这里有很多人爱我。你不欢喜快乐的一天，就是错过了的一天，我的孩子。你再也不能重渡那一天了。”

3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实现我一直怀抱的期望——成为一名监狱牧师。通常一位牧者需要敲响教堂钟声，等人们上教堂，才能传讲信息；但在这里，我的教友们都住在“教堂”里，与我同在。他们必须时刻听道，就算是不太情愿。

一天晚上，年轻的拉萨（Lazar Stancu）打断了我，他是一位流利的语言学家，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为一家外国通讯社工作。他说，

“够了，不要再谈基督教了。毕竟还有其他有趣的宗教。”

“嗯，”我说，“我对孔子和佛教也颇有心得。”然后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约》寓言。

当拉萨称赞这教训的美丽又新颖时，我便说这其实也是基督的教训。“你为什么看外教胜于自己的宗教（基督教）？”我问，“是像罗马尼亚的谚语，说他家的母鸡总是火鸡？”

拉萨回答道，“萧伯纳曾说，人们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少量的基督教教育，以至他们很少能真正明白基督教。”

一天傍晚，一名新进牢房的年轻囚犯突然跳起来喊道：“住手，住手！”其他人惊讶地看着他，他猛地倒在床上。我走到他身边。他有一张精致而敏感的脸，但下巴和脖子都受了伤，缠着马虎的绷带。他含泪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掉头不看我。我想我当时只会让他更加不高兴，所以就没有坚持跟他说话。

阿迪医生告诉我，说他名叫约瑟夫。“是个好孩子，”医生说，“但他的面部溃疡将给他留下终生的疤痕。他又是一个骨结核患者。”阿迪向我讲述了约瑟夫的往事。四年前，约瑟夫只有十四岁，他在试图前往德国姐姐家时被捕。秘密警察使用恶狗监视他。他只要轻微移动，这种警犬就会跳了起来咬住他的喉咙。他被吓坏了。他的喉部与下巴都受了伤。至今他依然不停地述说在边境上的凶狗。然后他又被怀疑是某些国家的线人，于是被带到布城酷刑。过后就被送往运河，挨饿并感染了结核病。

我看着约瑟夫在我们中间坐下来。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诚实和开放，是苦难还没有腐蚀的。有时，他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把乌黑的头髮抛在脑后，对一些古老的监狱笑话哈哈大笑。但他更常把手放在受伤的脸上。这脸疼痛：但更糟糕的是，他想到自己将永远失去英俊了。

我确信我能帮助他，所以我等待时机。

4

斯大林刚去世的几个月，我国监狱特别宽松，容许囚犯的家属，可以每月一次给狱中人送包裹。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些包裹。在给家人的明信片上，我写道，除了食物之外，我还要香烟和“菲隆医生的旧衣”。

尽管我不喜欢吸烟，但我总是要求容许一个囚犯的最高香烟配额，好分发给这里的烟民。但结果却不好。那些我没有分发的，就会怨恨；那些我给予的，就怀疑我给别人更多。

我要求菲隆医生的衣服，令我的家人大感困惑。那医生是小个子，我却是身材高大。我希望家人能意识到我真正的希望，是链霉素。阿迪医生告诉我，社会主义医学如今承认这种十年前在美国发现的药物，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我收到这

药物，阿迪就能治疗我；但我们却不能在明信片
中提及它，或索取它。

在那一刻，即使是简单的阿司匹林也会受到欢
迎。那时我正遭受我们每个人的牙痛。由于缺乏
食物，牙齿很快就腐烂。不然就是被打断。有时
我的脚踝上缠着五十磅重的铁链，叫我无法走几
步来缓解疼痛。疼痛最厉害的一段时间，我正在
奥克纳监狱。一颗上颚的牙叫我一整天都痛苦不
堪；日落时分，疼痛转移到下颌。我们没有牙医
，也没有缓解的希望。据说巴斯卡（Paskal）用
数学问题来对抗牙痛，我便尝试写讲章；但疼痛
肯定比较适合用数学对抗，而不是写作，因为写
出来的都是绝望的讲章。我又尝试写诗，但写出
的都是悲痛欲绝的诗。

我试图与约瑟夫交谈，好忘掉痛苦。一天晚上
，我坐在他旁边，问他为何听到我说话时就生气
。

他说：“我恨上帝。如果你不停止，我就叫警
卫。”然后他又开始流淚。

但这男孩本性的善良总是占上风，一两天后，
他就告诉我，他希望与他在德国的姐姐团聚，然
后前往美国亲戚的家。

“那么，你必须开始学习英语了，”我说。

“我很想学，但是这里谁来教我呢？”

我说我可以。

他欣喜若狂，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聪明而认真的学生，尽管我们没有书、纸或铅笔。

我告诉他说，我读过好些英语文学，就让他记住圣经的许多段落。

5

约瑟夫并不是唯一威胁要举报我的囚犯，真正的危险是隐藏的线人。这些人常常利用爱国主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尤其是对年轻人。

在罗马尼亚山区反共多年的游击队，启发了许多年轻人组建自己的反共团体。许多十七，十八岁的男女因此被逮捕，关进监狱：甚至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也在我们当中。他们喜欢听一位名叫阿尔米（Armeanu）的前情报上校讲述关于我们的国王斯蒂芬大帝（Stephen the Great）和其他反抗外国统治的爱国英雄的故事。

斯塔将军以前认识阿尔米，他告诉我不要相信这人，并建议我们密切留意他。

那天晚些时候，我慢慢走过，阿尔米正在和一位名叫提比的年轻游击队员交谈。“他们逮捕了我，”提比说，“但其他人仍在继续战斗……”当我再次走过时，我听到他说他的女朋友在游击队中。阿尔米看到我在附近，就拍拍那少年的肩膀，走开了。

过后我请约瑟夫去听。阿尔米对约瑟夫没有戒心。几天后的晚上，约瑟夫听到了一些谈话的片段。

“跟我说说你的心上人吧，提比。我敢打赌她一定很漂亮。她叫什么名字？……玛丽亚——她从哪里来的？...是的，我知道那个地方。事实上，我和一个叫塞利内的家庭很相熟，他们有一个同名的女儿……啊，你的玛丽亚是库扎小姐。她的父亲呢？陆军上尉，是吗？不会是二十二团吧？哦，第十五团。是的是的。”

收到这份报告后，我同意阿尔米很可能是一名特工，玛丽亚将在几天内被捕。斯塔将军想立即与阿尔米对质，但我说我们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后来我发现阿尔米独自一人时，就开始与他交谈。他问我为什么进监狱，我看到了一个急需的机会。

“因为间谍活动，”我说，并补充说我知道我可以与像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坦诚交谈。“我的被捕并不重要。我只是组织中的一个小齿轮。”我进一步暗示，并允许他哄骗我的“联系人”的姓名和地址。他没有掩饰自己狡猾的胜利表情：他认为他已经获得可以确保他获释的信息。

第二天牢房一打开，斯塔就看到阿尔米正在与警卫低声说话。随后，阿尔米就被传唤进行“医疗检查”——这是咨询线人的常见借口。然后我

就被政治官员叫去。在那位官员想象自己的肩膀上已经多了一颗星，因为他并没有试图保护阿尔米，而是立即要求了解我提到的那个伟大的国际间谍网络的全部实情。

“中尉，”我回答道，“如果你把我昨天给阿尔米的信息转给布城，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你只会伤害自己。”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发明的故事。我只是想证实我对阿尔米的怀疑。”

那位警官难以置信地盯着我好一分钟。然后，令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开始大笑。

我回去告诉斯塔，他带着平静的愤怒对阿尔米说：“勇敢的人在你的指挥下牺牲，如今你自己倒成为叛徒。”

阿尔米试图扯谎掩盖，但从那天起他就被众人抛弃。多年后，我听说他死在监狱里。他所有的背叛只给他带来耻辱。

6

不久后我收到一份包裹，里面有一百克链霉素。我的暗示成功了。想到我过去在四号房的同

伴们，我就请斯塔将军把它送给那儿最需要的病人。

“那是苏塔（Sultaniuc），”他厌恶地说。“那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铁卫法西斯分子。他其实已经快要死了，尽管他不承认。最好你自己用……很好，如果你坚持的话。”

斯特很快就回来了。“苏塔想知道药品是从哪里来的，当我告诉他这是你的时，他说他不会接受铁卫队敌人的任何赠品。像这样的狂热分子是没办法的。”

但我想也许另有办法。斯塔离开后，我请约瑟夫充当中间人，没有人会怀疑他。

“告诉苏塔，将军搞错了。只说这是格拉（Graniveru）的礼物。格拉也是铁卫队成员，我听说他最近收到了一些药品。”

约瑟夫也不成功。“苏塔不信格拉会给他任何东西。他说除非你发誓说这不是你的。”

“我当然可以发誓。”我说，“我已经给了他药物，当然也可以一拼送他一个誓言。”

当我收到链霉素时，阿迪医生正在别处忙着。后来他听到这个，就说不出话来。就连斯塔也对我的发假誓感到困惑。他说：“我以为你们神职人员总是坚持全部真相，除了真相，甚么也不说？”

我回答说：“这也是事实。链霉素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的。从我收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它献给了上帝。”

斯塔很快就有了一个例子，看到坚持“全部真相”的后果。

有两名新囚犯，因为彼此指控，就关进我们的牢房。一个是天主教的主教，他想给罗马教廷知道他的教会正在大受迫害。第二个是一名律师，他将主教的秘密信件交给了教宗大使，当时布城还有梵蒂冈的办事处。当律师交上信件，出来时就被捕了。他否认送信，于是警方把那位主教带来，与律师对质。主教说：“我不能撒谎。是的，我确实给律师一封信。”两人都受到酷刑，最终一起被送往奥克纳监狱。他们无休止地争论谁是谁非。主教期望我的支持，但我无法提供。我说：“如果一个人拒绝说谎，那很好，但他应该把危险的信息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他决定让别人也一同冒险，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那位朋友了。”

主教抗议道：“这整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悲伤，但我怎能撒谎？”

我回答说，“如果我们善待我们的敌人，我们更应该帮助我们的朋友。如果我的女主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准备一顿烧焦了的晚餐，我仍然觉得有必要称赞她：这不是谎言，这是礼貌与同情。当这里的同胞们问，‘美国人几时来到？’我告

诉他们说，‘肯定不会很久了。’恐怕这不是事实，但也不是谎言。这是一句给人打气的话。”

主教不服气。我继续说道。“如果你真的样样事情都讲求绝对的真实，那么所有的艺术都成了谎言。浮士德并没有真正与魔鬼签约，那只是一个骗子（歌德）在扯谎。汉勒根本不存在——那只是莎士比亚吹的牛皮。最简单的笑话（我希望你会喜欢笑话，）许多也是捏造的。”

“那可能是，”主教回答道，“但是，当你受到审讯时，魏恩波牧师，你不觉得自己必须说实话吗？这有关我们的个人信誉呀？”

“我当然无需说实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句话，只要它能误导那些试图诱捕我朋友的人。你真的希望我会向这些共党提供攻击教会的情报吗？我是神的牧师！”

后来当我们独处时，约瑟夫问我：“那么甚么才是谎言？”

“谎言是一句意图伤人的话。你不认为你向苏塔传达的假发誓是谎言，对吗”

“哦，不。”约瑟夫微笑着说道，“那是一种爱的行动。”

约瑟夫正在改变。他的怨恨得到了缓解，有一天英语课结束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说你恨上帝？”

“为什么？”他重复道。“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上帝创造了结核杆菌。”他觉得这样就可以结束谈话了。

“我可以解释，”我说，“只要你肯听。”

“如果你能解释，我会听一整夜！”

我警告他，他的话必须算数。我说这问题是所有人类痛苦和邪恶的根源。约瑟夫不是唯一发出这问题的人。为什么仁慈的神会容许这些痛苦发生。也许所有坐牢的人都会这样问。这问题的答案不只是一个，而是几个。

“首先，我们常以为不愉快的事，就是坏事。狼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吃羊，这让我很不高兴。其实狼对羊并没有任何道义的责任，倒是我们有这责任。我们饲养它、喂养它、给它喝水，当它完全信任我们时，我们就割断它的喉咙。这才是可恶。然而却没有人责怪我们。”

约瑟夫坐在那儿看着我，一言不发。

“杆菌也是如此。一种杆菌可以给面团发酵；另一种则损害了一个孩子的肺部。这两种细菌都不知道它的作用，但我喜欢其中一种，谴责另一种。所以事物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我们是根据它们对我们是否方便来标记它们。我们只是宇宙的

微小居民，却希望宇宙中的大小事物都符合我们的好处。”

牢房里很黑，十分安静，所以我继续说下去。“其次，”我说，“我们所谓的坏事往往只是未完成的好事。”

“我需要一些证明？”约瑟夫补充道。

我说：“四千年前有一个与你同名的人，被长兄们出卖，作为奴隶，在埃及遭受了许多苦。然后他升为宰相，救了埃及，也救了他的兄弟们脱离饥荒。所以，就如约瑟一样，你决不知道目前发生的，是好是坏。当画家开始作画时，你只见到他涂上模糊的颜色。画中人需要时间才能出现。每个人都欣赏《蒙娜丽莎》，但达文西（Leonardo）用了四十年才完工。”

“但是躺在监狱里的人，”约瑟夫说，“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什么美好的结果了。”

“但其中也有人能看到。如果德伊同志未曾坐过牢，他能在罗马尼亚掌权吗？”

“那么对已经死在牢中的人呢？”

“拉撒路死于贫病，”我说，“但耶稣告诉我们，天使随后就带他进入永恒的幸福中。我们每个人都肯定在死后会得到报答。于是只有在看到死后的报应，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任何事。”

约瑟夫答应思考这个。

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治好牙痛，就是一个好消息。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叫我好似登上天堂。里面说萨宾娜已经出狱了。虽然她仍然不许跨出布城，但我儿子却可以来看望我。这封信就此结束：这是党方审查允许的所有信息。

我最后一次见到米海是在九岁的时候，现在他十五岁了。我无法想象我儿子如今会是怎样的模样。我们一直是那么亲密。我开始为这会面而担心。那大日终于到了，狱卒带我进入一个大厅，我必须坐在一个包厢里。里面只有一个装有铁栅栏的小窗，外面的访客只能看到我脸的一部分。警卫叫道：“米海·魏恩波。”米海就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他脸色苍白，瘦弱，脸颊凹陷，还长出了小胡子。

米海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说，即使你死在监狱，也不要悲伤，因为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充满安慰的第一句话！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我振作起来。“她怎么样？家里有吃的吗？”

“妈妈已经康复了，”米海回答。“我们有食物。我们的爸爸非常富有。”

被指派听我们讲话的警卫咧咀笑了。他们以为我妻子已经再婚。米海对每个问题都用一句金句

回应，因此在我们被允许的几分钟内，我只听到很少的家庭消息。但在我们的时间耗尽之前，米海告诉我说，他带来的包裹留在警卫站。

我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包裹，超出了我每月的许可分量，因为米海同时寄给“理查·魏恩波”，又寄另一份给我在监狱里的假名，乔治斯库。但几个月之后，狱方又回复了过去的限制，禁止探访，禁止包裹和信件。

9

在稍微轻松的时光结束之前，一名警卫将一个篮子拖进牢房，里面装着床单和毛巾——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奢侈品。每个人都得到一份。

“他们算错了人数，这里有一条多余的毛巾。”裁缝埃米（Emil）说。“我们把它剪成衣服吧。我可以轻易用这些东西造成一些温暖的衬衫。”

律师伊恩（Ion Madgearu）不安地说。“这是窃取国家财产。”

“谁晓得呢？这里没有记录。”

“我是政治犯，不是罪犯。”

“你真是个笨蛋。”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十分激烈。约瑟夫请我做了一个表决。

我说：“这些国家财产，其实都是我们的。党方从我们窃取的这些。如今我们当然有权拿回一丁点。我们欠我们家人一笔债，就是尽我们所能的挨过寒冬。这就像早上狱警半睡半醒地进来问，今天这牢房里有多少人时，我们都会试图夸大我们的人数，好得到多一点面包一样。那也是完全合法的。”

伊恩说，“我还是宁愿遵守法律。”

“但是法律总是不公平的。”我回答道。“法律吩咐一位百万富翁不要偷窃，它对你我也说同样的话。一位富翁完全无需偷盗，但我们急需粮食衣服。大卫吃了圣殿里的陈设饼，耶稣完全没有责备，因为祂晓得当时大卫非常饥饿。”

伊恩最终也不再争辩。但后来他告诉我，他另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我曾经是一名检察官，在我任职期间，我已经将数百人送进监狱。我想，无论我说什么都没区别；党方都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后来我因为一些错误而成为替罪羊，自己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当时我惊呆了。他们送我去瓦莱亚监狱（Valea Nistrului）的铅矿。在那里，一名基督徒囚犯主动与我交朋友，也把他的食物分给我，并保护我免受看守的伤害。我觉得我们以前曾经见过，就问他为什么进监狱。‘哦，’他说，‘我帮助了一个像你一样落难的人。他来到我的农场寻求食

物和住所。后来他因为是游击队员，所以被捕；我也被判二十年。’

“我说，‘这是可耻的审判，’这位基督徒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突然我记起了。我正是他案件的检察官。他从来没有责备我。但他以德报怨的榜样，叫我决定成了基督徒。”

10

约瑟夫边唱边试穿埃米为他做的衬衫。它果然合身，虽然看来有些奇特，但约瑟夫只要有一些温暖的衣物贴在身上，就很满足了，即使这是国家财产。

“现在每个人都会偷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斯塔说：“如今年轻的一代，都把不诚实当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这十年来，我国已经变成了贼国。小偷，骗子和小告密者到处都是。农民从他们曾经拥有的土地上偷窃；理发师偷窃自己店里的剃须刀（因为如今他的理发店已经属于国家的了）。然后他们必须撒谎掩盖。牧师，你有没有准确的纳税呢？”我承认没有。我也不觉得拒绝把教友的钱交给共党，有什么不妥。

“接下来，偷窃将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斯塔说。约瑟夫插咀说，“我在学校什么也没听。老师说比萨拉（Bessarabia）一直是俄罗斯的

一部分时，可是大家都知道比萨拉是苏联从我们这里偷去的。”

“好小子，”将军说。

“我也希望你也不要接受他们的反对宗教言论，约瑟夫，”我补充道，并告诉他我认识的一位教授必须定期讲授无神论。可是当他独自在房间里时，却画十字，请求上帝的宽恕，然后才出去告诉学生们说上帝不存在。

“嗯，当然，”约瑟夫说，“他们会监视他。”他无法想象一个自由的世界，就是一个人不必防备告密者的世界。

话题转向了一位名叫吉瓦（Jivoïn）的告密者。他是一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南斯拉夫抗战失利后，他逃到罗马尼亚，就被罗共逮捕下牢（当然是指他抗战不力，偷懒）。如今他力图讨好当局，每逢狱卒对我们稍微宽松，他就向当局举报，给狱卒们麻烦。

约瑟夫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决定一起把他压倒，揍他一顿，狱卒们不会给我们太多处罚。”

我说，“且等一等。我有一个更妥当的方法。”

因为狱室里的每个人都不与吉瓦交好，当我与他谈及他的家乡时，他很是开心。不久他就开始谈及克罗地亚的笑话，与塞尔维亚的箴言，又提及

莫奈特尼格的美丽风景，歌曲与舞蹈。我不断鼓励他，他越发兴高采烈。

“你们的新国歌如何？”我问。

“嘿，了不得——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呀！”

他马上开始唱。外面的守卫起初并不觉察这是一首铁托歌，直到副歌才叫他们猛然发现。吉瓦马上被架走，去面对一个满脸怒容的政治官。

“那就是他的下场了。”约瑟夫说。我们都笑了。

在吉瓦事件后不久，一位前铁卫队成员，史特莱队长（Captain Stelea），从走廊另一端的牢房搬到了我们这里。他遗憾与上一个牢房的一位老战友分开了。

“他叫什么名字？”斯塔将军问道。

“伊万克林（Ion Coliu，）”史特莱回答道，“我到达奥克纳监狱的第二天晚上，就碰到他。我们聊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斯塔问史特莱是否有告诉伊万克林，有关他在审讯和酷刑中隐瞒的秘密。

“是的，一切，”史特莱说。“他是最亲密的朋友。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押在他身上。”

当斯塔告诉史特莱说，伊万克林是奥克纳监牢臭名昭着的奸细时，他简直不敢相信。我被要求证实。史特莱像一名被炮弹震荡的士兵，呆呆的

坐在床上几个小时。然后他跳起来，开始歇斯底里地对我们发怒，直到警卫把他带走。

每个监狱都会为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预留一个房间。他们被关在那里，任由他们发狂、在地板上大小便、互相打斗，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食物只是从小洞口推进去，任凭他们抢夺。没有警卫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进去处理他们。

11

约瑟夫的刑期只剩几周。他已经为未来做好了规划。他说，“我在德国的姐姐将为我办理前往美国的许可证。我学成英语后，就要学一门手艺。”

但他还是憎恨自己的破脸。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海伦（Helen Keller）虽然双目失明、又聋又哑，却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女士。我描述她如何自学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仅靠牙齿叼着一根木头，触及钢琴，作为聆听工具；以及她的工作如何为成千上万的盲人带来盲文。

“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写道，虽然她从未见过星空，但她心中有充满星星的天堂。这就是为甚么她能给人看见神创造的美丽。就是拥有眼睛的我们也不能看到的。

我告诉约瑟夫，海伦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如果她像其他女孩一样正常，拥有所有的感官，她可能会在富有少女的琐屑事上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遭受世人所谓的“悲剧（眼睛失明）”，才能達到非常的成就。

约瑟夫若有所思地说，“海伦肯定是人类绝无仅有的极少数人之一。”

“不，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俄罗斯作家奥斯特（Ostrovsky）双目失明、瘫痪，而且非常贫穷，他只能在包装纸上写小说。但今天这些包装纸小说已享誉世界。伟大的人往往都是病人；席勒（Schiller）、萧邦（Chopin）和济慈（Keats）都像我们一样患有结核病。波德莱尔（Baudelaire）、海涅（Heine）和我们自己的诗人埃米（Eminescu）都患有梅毒。科学家告诉我们，此类疾病的病菌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提高我们的意识和创造力，尽管它最终也可能导致我们发狂或死亡。结核病可能会使坏人变得更糟，但好人却会变得更好。他们看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耗尽，就希望能善用剩下的时光。”

约瑟夫常在四号房帮忙。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肺结核患者的平静、温和与清醒？”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确实如此，这多么奇怪。”

我说：“几千年来，人们都认为真菌有害。直到二十五年前，弗莱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发现一种真菌，青霉素（盘尼西林），

可以治愈许多疾病。目前我们还不晓得如何利用肺病的结核细菌。但在我们能克服这种不治之症后，我们就可能为孩子接种一小剂量的结核病菌，增强他们的智力？”

“神造天地，还有你的生命，并如此多的美丽事物，约瑟夫。你的痛苦也是有意义的，就像耶稣的痛苦一样。正是因为祂死在十架，我们才能得救。”

约瑟夫穿着他的新衬衫，但依然瑟瑟发抖，这件衬衫已经磨损了。我拿出亲戚送来的羊毛夹克，撕开里面的一层，说留着自用，就把外面的夹克送给他，一定要他收下。他就用双臂抱住他狭窄的胸膛，表示有多温暖。

约瑟夫在那天开始转变。在我们的课程中，我经常和他谈论耶稣。但他仍然不肯承认救主。他还需要一些最后的催动，帮助他跨越怀疑，抵达信仰。

那一刻就在分发面包的时候。这些面包成排放在桌子上。每份的重量应该是三安士半，但有些大一些，有些小一些。囚犯们常为了抢站头位而争斗。然后他们又会互相询问：哪一块才是最大的？在听取了友辈的意见后，他们又怀疑自己上了当。友谊就因一口面包而丢失。在这一天，一位名叫特莱斯（Trailescu）的囚犯试图欺骗我。约瑟夫看在眼里。

我对特莱斯说：“也拿去我的一份吧。我知道你有多饿。”他耸耸肩，就把面包塞进嘴里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下来将新约经文翻译成英文，约瑟夫说：“我们现在几乎已经读完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但我仍然想知道祂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当我在四号房时，有一位牧师会放弃他的一切：他的一点面包、他的药、他身上的外套。我有时也会捐出这些，虽然我自己也需要。但在其他时候，当人们饥饿、生病和有需要时，我却沉默不动；我不够关心。我所说的牧师却真的像基督。你觉得只要摸到他的手，就能痊愈。有一天，他正在与一小群囚犯交谈，其中一个人问他，耶稣是什么样的？这牧师简单而谦逊地回答：“耶稣就像我。”那个经常得到牧师善意的囚犯就微笑回答说：“如果基督像你一样，那么我就爱他。”

“约瑟夫，很少有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意义。相信祂并不难；变得像祂才是最棒的事。”

约瑟夫的眼里涌出了泪水。“牧师，如果耶稣像你一样，那么我也爱祂，”他说。

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纯真与平静，我知道我成功了，虽然约瑟夫给我的评价肯定过高了。

我们又继续英语课。我告诉他，耶稣如何回答那些要求看见神迹，才考虑是否要相信祂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的祖先们，看到天上掉下的面包，就是摩西为他们行的。”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面包。到我这里来的人，永远不饿

也不渴。你们的祖先吃了摩西给的天粮，还是死了，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天粮。我才是天上赐下的食物，人吃了就永远不死。”

约瑟夫在次日，就对我说：“我最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我就用锡杯里的一点水给他施洗，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他所有的痛苦都离开了。

在他出狱的那天，他含着泪水拥抱了我。他说：“你帮助了我，就像我的生父一样。现在我可以与神同行。”

多年后，我们再次见面时，他仍然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伤疤仍然存在，但现在他却很高兴拥有那些伤痕了。

12

不久后，我们的监狱管理层就渡过斯大林去世的恐惧，又恢复旧有的压制，还加上新的。尽管医生抗议，党方还是把窗户都关上，而且还涂上一层漆。晚上当警卫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只能偷偷的把窗户打开一英寸。在夏天，炎热和恶臭令人窒息。

在监牢外面，教会的苦难也在增加。我们从最近被捕的东正教牧师那里听说，查士丁主教已经完全成为党的工具。

他最可耻的行动，是对付维罗修女（Mother Veronica）。维罗是一位在罗马尼亚广受尊敬的修女。几年前，维罗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女孩时，声称自己看见圣母出现在田野，要求她在当地建造一座修道院。经过数度的显现后，捐款纷至沓来，修道院很快建成。两百名年轻女孩戴上了面纱，成了该院的修女。在接下来的几年，这地就成了朝圣中心，类似法国的卢尔德（Lourdes）。在共产党接管后，众人都听到有关圣母将会拯救罗马尼亚的传闻。

有一天，查士丁乘坐一辆豪华轿车抵达，把修道院教堂的神父们逐出教会。然后，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他建议修女们说，她们放弃今世的享受，为渺茫的来世准备，实在愚笨。为何不现在就出去享受今生的快乐。修女们不理睬他，也拒绝离开修女院。于是在查士丁访问后不久，秘密警察就进行了突袭。他们暴力对付不听指示的修女，强行关闭修道院。

整个罗马尼亚都震惊了：连党方也暂时感到忧虑。维罗修女在秘密监狱中受到巨大压力，被迫承认她的看见圣母只是一种幻觉。出狱后，她结婚生子。罗马尼亚的卢尔德神话就此结束。

对信徒的另一个打击是针对圣人彼得拉（Petrache Lupu）。他是奥尔特城（Oltenia）的“牧羊圣徒”。许多年前，当他看守羊群时，遇到一位老人，自称是上帝，宣称必须建造更多教堂，给穷人更多的金钱援助。尽管彼得拉是一位

遗传性梅毒患者，说话口吃，但人们依然相信他的故事。成千上万的人来看望他。战争爆发时，政府空运他到前线去鼓舞士气，士兵们竞相亲吻他的手。他从一个战区到另一个战区，告诉军士们说，上帝希望他们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当他被共产党逮捕下牢后，彼得拉问坐牢的同胞们，牛仔（美国人）几时会来营救。

“为什么要等牛仔？”他们问。“你的那位老夫子上帝肯定会来释放你吧？”

彼得拉咯咯笑道：“祂很想这么做，可惜祂没有枪！”

这些东正教神父们也悲伤的提及另一个行神迹的僧侣博卡（Arsene Boca）。他的随从们说，他们无需向他认罪，因为他一眼就晓得他们的过失。博卡在牢中过了一段日子后，就放弃他的僧侣习惯，娶了妻子，就如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了。

党方对宗教的打击只是砍掉了迷信的枝条，让真正的信仰比以前更加健全。但人性有一个弱点。当宗教的迷信突然被砍去后，取代它的常是另一种迷信。如今许多人开始崇拜屠夫斯大林，也相信斯大林的无神论，就如过去崇拜圣人圣像一样。这后来的魔鬼比先前的更可怕。

有一天，波普教授宣布来了一批新囚犯，其中一个被打得很惨。这人正要找我。我就和波普一起去见他。

原来那人就是鲍里。自从《再教育》以惨败告终，这位老工会成员已经被关押在好几所监狱。如今到了这所监狱，守卫们就把他抛在地上。他已经昏迷了。牢房里没有人，因为都出去体操。在波普抵达之前，没有人给鲍里任何帮助。当我们把他放到一张木板床上时，他呻吟着醒来。凝结的血将肮脏的衬衫粘在背上。我们慢慢地、痛苦地把它浸湿，露出了布满丑陋伤痕的背部。如果是弱一点的人，肯不定活不了。这就是鲍里与《再教育计划》合作的奖赏。

囚犯们回来，开始鱼贯而入。他们用仇恨和蔑视的目光看着鲍里。

“我是该死的，”波普和我给他清理伤口时，这老硬汉说。

“你也知道自己该死？”有人问。

鲍里斯抓住了我的手臂。“我遇到了一个你认识的人。帕特拉叫我传一条信息给你。”

鲍里说，前共产主义正义部长帕特拉（Lucretiu Patrascanu）已被处决，他在1948年曾与我同在卡利监狱（Calea Rahova）。斯大林去世后动荡的一年里，党的领导人就如我们的警卫们一样，个个担心自己会下台。他们认为被监禁

的帕特拉是一个拥有广范支持的人，他随时可能复出，领导一场自由化运动，并对他们进行报复。于是他们先发制人，处死帕特拉。当时帕特拉已经入狱六年。

鲍里曾短暂与帕特拉在一起。他说，帕特拉为共产主义的上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去世前却被同党们酷刑。当他说牢房很冷时，他们就给他厚衣，戴上了铁链（叫他不能脱衣）。“还冷吗？”他们问，然后加热牢房，直到帕特拉浑身是汗，乞求关掉蒸汽。他们就急速冷却，直到零下。帕特拉交替被烤和受冻，由于他依然死不了，最后只好拉去枪杀。

鲍里说：“他告诉我，如果你再次见到魏恩波，请告诉他说，他讲的对。”

阿迪医生来给鲍里做检查。不久就把他送去四号房。

我尽所能的在死亡室（四号房）里陪同鲍里，几天后他似乎正在好转。虽然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承认，但他其实是很高兴能回到友善的氛围中。

他向邻床——耶和华见证人——点了点头。“老洛松在为我祈祷。他祷告的分量，已经足够我们二人了。”他提高声音说：“洛松，你已经把我们的一切需要都告诉了上帝，不是吗？”

“当然，”老家伙说，“我还为全室的人祈福。”

“我注意到，神似乎未曾回应你？”鲍里说。
“也许祂在扯你的后腿？或给你考验，就如约伯？”

当时我正在给鲍里清洗，他抓住了我的手，说，“这是牧师神父必须解释的事情，不是吗？年复一年，人们都在祈祷自由，祈求家人的消息，求得一顿像样的饭。他们得到了什么？”洛松试图说话，但鲍里继续说，“我曾在罗马尼亚最糟糕的监狱吉拉瓦。在那里，我的同伴们祈祷说，‘神啊，如果你爱我们，请给我们一些没有蠕虫的食物。’”

“那些食物有改进吗？”洛松问。

“不，情况更糟了。为什么神不帮忙？”

我说：“你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请问，医生给你看病时，不是常常要给你带来痛苦吗？”

“想一想在科学实验中死亡的动物。如果一只实验中的狗，知道它的痛苦可能会拯救数百万高等生物的生命，也许它就会很甘心地接受痛苦，甚至死亡。同样的，我们的苦难也可能有益于后代。耶稣承受痛苦，因为知道这会拯救人类。”

洛松介入说，“每天，世界各地的人都呼求‘我们的天父’，祈求神国降临，但神国却没有到来。但我想我知道它的缘故。这是因为那些祈祷的人其实不真的希望神的国。他们只希望铁卫队重新掌权，或者美国人到来，或者米迦勒国王复辟。目的是：他们希望脱离目前的痛苦。（神的

国是什么呢？是服侍众人，叫众人得益处。这完全不是大多数囚犯心底里的愿望。）”

我看到鲍里正在认真听。

洛松继续说，“正是，其实我们心中最不喜欢的，便是天国，虽然我们可以轻易获得它。只要出少许气力就行。

“在我的村子里，教友们曾经为穷人举办祈祷会。所有的农民都来了，只少了一位富有的农民。正当我们各人都想，自己是多么虔诚时，那位缺席者的儿子却带来四大袋麦子。他把麦子放在教堂门口，说：‘我父亲已经把他的祷告送来了。’那个缺席者正在采取实际行动，实现神的国。”

我说：“鲍里，这就是给你的答案。《圣经》承诺犹太人将从天涯海角回来，并在巴勒斯坦重获自己的国土；但如果像赫茨（Herzl）与魏斯曼（Weizmann）这样尽心竭力的人没有出现，这个预言可能再过一千年也不会实现。”

附近的其他人，在这个死亡室里，面容憔悴的问我祈祷的意义，以及祈祷可能怎样帮助他们。我便说我的想法：“许多人将上帝当作一个富翁，是人人求助的对象。但监狱给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更纯正的宗教。我们的祷告便是爱，接纳与思想。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呼求天父。但既然我们是神的孩子，孩子也分担父亲的职务，于是众人的祈求也是对我的祈求。

“于是，当众人说，‘愿人都尊你的名’时，我便当尊神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就必须为结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邪恶统治而奋斗。‘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指好人的心意成就，不是坏人的欲望。‘宽恕我们的罪’，我就必须宽恕众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就必须尽力避免绊倒人，不叫自己的行为成为他人的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我就必须尽力救邻里脱离罪恶。”

此后，洛松和我就成了朋友。他是一个有趣的农民，虽然他也同时是耶和華见证人，却带有良好的判断力。我发现是这教派选择了他，而不是他特意去选这教派。由于对东正教的幻想破灭，并且遇到生活的危机，他就接受了他遇到的第一个其他选择。许多来自大教派的人，都是这样脱离母会，加入各小派的。如果洛松当时碰到我国认可的教派，就如浸信会或安息日会，他就无需坐二十年监狱（证人会在罗马尼亚是属于非法组织。）

有一天，当我和他谈话时，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他身为一个证人会成员。“许多年前我犯了一宗严重的性犯罪。我悔改了，请求上帝让我受苦赎罪。我如今还在赎罪中。”

洛松如今正在垂死中，听不了另一个教理。

但我试图安慰他：“即使是圣徒也很难克制性的冲动，”我说，“耶稣知道这一点。祂已经为我们赎罪了，你不用再自己赎罪。”

“但我还是忘不了。”他回答。

几天后，我走进房间，发现洛松的床空着。他是在夜间去世的。

15

这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仍然受年轻时的错误困扰。但这并不稀奇。在监狱，男人没有发泄的渠道，很快就有色情梦。囚犯们坐着凝视着空白，日夜想到，都是性幻想。我的狱友试图挑引我谈及尴尬的问题。

已婚的男人最是困难。我们这里至少有一半人，在下狱之后就失去妻子。要么是她们已经与别人同居，要么就是她们要求离婚。她们与被判刑的“反革命”丈夫离婚，只是一种简单的手续。她们受到巨大的压力，逼使她们离婚。

一位称为弗里穆（Frimu）的囚犯正在等待上诉结果。当他被叫到司令部办公室时，他欣喜若狂——“我告诉你们，我肯定获得释放了！那时。。。 ”他就在自己的一根手指上响亮的吻了一声。不久之后，他气愤愤的回来，说不出话来。

有人问出了什么事。“甚么事？”他勃然大怒，“那个贱妇跟我离婚了。她与国家剧院的一位导演结婚。当我出狱时，他们有的瞧的了。那时上帝也难救他们了。”

弗里穆是一个中年男子，在牢房里被称为“大情人”，他经常吹嘘他年轻漂亮的妻子；现在他却开始咒骂女性，谈种种的复仇。

我说，“如果坐牢的是我们的妻子，我们却自由在外面，我们中有多少人会保持忠诚？”

弗里姆喊道：“你不必给我们教训！”

我说，“我对你的坏消息感到抱歉，但是你还指望什么？你总是谈论你引诱过的女孩和占有你朋友的妻子，又说你出狱后打算将要征服的女人。有你这样的男人四处溜达，我们怎能希望有纯洁的女人？”

一位大教堂的牧正诺瓦，平时总是害羞不说话的，现在却开口了。“丈夫并不总是该受责备的，”他说。“我总是让我的妻子高兴。我以为我做到了。可是在我第一次坐牢回家时，开门的是一个陌生人。我妻子随后出来说，‘我现在和他结婚了——所以请走吧。’我试图和她说话，但她大声咆哮：‘我的麻烦已经够了。我不想家中有一个反革命分子！’”

于是我必须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度过了第一晚。

“你是个傻瓜，”弗里穆说。

飞行员彼得问，“第二天晚上怎么样？”牧正涨红了脸，转身走开。

农夫厄密（Emil）说及他第一次期满出狱时的经历：

“当我走到半路，离开家还有整排店铺那么远时，我的狗就闻到了我的气味。它把铁链从栅栏扯下来，冲过来迎接我。我弯下腰，她就跳起来舔我的脸。然后，我走进我的房子，发现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床上。”

“牧师，他们中的哪一个是畜生？”

16

共产党竭力腐蚀道德，但即使没有他们的影响，从我们周围的谈话来看，基督徒是否真的听从圣经有关于性的教训？

几位基督徒囚犯就尝试进行一项调查：“你是否常常遵从经上的吩咐，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保持贞洁；婚后又对伴侣忠心？”

三百位基督徒囚犯中，只有两人回答是。一位是神圣的老神父苏罗，另一位是十五岁的男孩。

斯塔将军说：“教会似乎必须重新思考了。一支不听从命令的军队，绝不能上战场。”

新闻记者士旦说，“一个牧者宣扬没人实践的教训，只会贬低自己的价值。”

牧正说：“这可能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我们牧者总不能违背圣经。”

我说：“当然，我们不能向罪恶妥协，但我们也需要更明白罪人。在古代，女人都戴着面纱，衣着朴素。你必须是一个恶行高手，才能勾引到一个女孩。如今，她们的衣服是为了挑拨男人而设计的，而且犯罪的机会很多。

“也想想耶稣如何处理那位通奸的女人。当时众男人没有一个敢自称无罪。他们都离开了，没人抛第一块石头（证明各人心中的淫念。）耶稣怎么处理？祂就让他们走了。对那行淫的妇人，耶稣也让她回家，只给她一句劝告。”

“罪必须受到谴责，但罪人却必须得到理解 and 爱。”

诺瓦牧正表示担心。“年轻人有那么多犯罪的机会：他们需要指引。”

“是的，”我说，“但我们也必须教导，性是上帝赐予人的美丽的礼物。我们必须说出全部真相，免受淫秽的污染。神造两性也带有神性。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书籍《摩纳瓦法论》说得很好：女人是一座祭坛，男人在其上，为他的后裔向神献上祭品。”

天主教记者士旦打了哈欠说，“这一切都相当崇高。但我们大多数人都用平淡的眼光看女性。

她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东西；给人快感的工具，或有吸引力的装饰品，或是一个仆人，负责清洁和做饭，甚至是一个偶像，令我们甘心为之服务。但几乎没有人把她当作与自己相等，即使在性事上也如此。”

“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能让你快乐的伴侣，”牧正说。

“或者反之也是正确，”我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一个男人，选了村里一个平凡的姑娘，因为他想这姑娘没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对象。”

“多么浪漫啊，”士旦笑道。“婚姻只是一份契约。当我的父母找到一个好女孩，又带有足够的嫁妆，交易就完成了。我们相当满意，夫妻各行其是。”

“那么你们其实完全没有结婚。”

“我们的婚礼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士旦说。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为了物质利益而举行的婚姻在上帝看来是无效的，即使教皇本人祝福也无益。”

士旦笑了。“那么，世界上就充满了无效的婚姻。许多男孩把自己卖给有钱的女孩，就像贫穷的女孩被卖给有钱的男人一样。为漂亮的外表而婚娶，不是更不实际吗？美容很不耐久呀？”

我回答说，我教会会有一个年轻女子，被父母压迫，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经过多年的不快乐的生活之后，她爱上了为她制衣服的裁缝，就与他

同住。许多常去教堂的人都排斥她。当然，与人同居是有罪的，但我试图理解她。我知道她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压迫的。继续那种婚姻是更大的罪。于是目前的工作是把已经破碎的婚姻重新安排，进行再婚程序。我请求会众不要仓促地评判她。教会的规则认为她的第一次婚姻是无效的。

“那女子流着泪来感谢我。我说教会名册与神的名册不同。上帝理解你为何会投入另一个男人怀抱。就算众人都不能同意，上帝一样爱你。她就搂住我的脖子并亲吻我，就在那时我的妻子进来了。”

众囚犯哄堂大笑。士旦问：“那你怎么向妻子解释？”

“我没有解释，因为无可解释，”我说。“那妇人与那位裁缝快乐的生活了许多年。当裁缝死后，我才告诉太太那天发生了甚么事。”

17

许多人以为监狱可能使人发生同性恋，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说法的证据。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疾病、疲惫和过度拥挤。

波普教授强烈谴责一两宗可疑的事件。

我说同性恋无疑是一种罪。但我们应该尝试了解这些不快乐的人，原谅他们的过错，就像我们

对待人类其他的过错一样，并力图治愈。许多伟人都是同性恋——亚历山大、哈德良、柏拉图，还有列奥纳多；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基督教情感，还有被称为“基督之前的基督徒”的苏格拉底。又有米开朗基罗，并我们这个时代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安德烈·杜南。

“是的，我知道他们的荣誉名单，”波普说，“但是他们中的很多都在剧院等场合将私人的事变成公开。既然社会谴责这种行为，他们至少应该收敛一点。”

一位拉比介入了讨论，他引用犹太智慧书《塔木德》（Talmud）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拉比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至少也要戴上面纱，到另一城去干，然后才回来宣讲法律。”

这里的大多数囚犯，虽然食物极其不足，但还是把性的需求视为与食物相等。在最后的审判中，人们将会因为没有给饥饿的人食物而受责备；但我们会不会也因没有满足伴侣的性需求而受罚呢？

当然，正如存在社会和经济不公正一样，也有性要求的亏欠。它是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一条法律，甚至神圣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公正的因素。法律对富人和穷人、性欲不足和性欲过多、无知者和知识分子，制定了相同的规则。

我想婚姻是一个荣誉的问题，它是一种责任。但世人的爱只是一种情感（注：神的爱大有异于人的爱），所有的情感都会改变：年纪大了，感情就平淡了。这是自然的倾向。因此感情不能保证幸福的婚姻。人必须有一种意志力：决定对你的伴侣忠诚，决定让他人快乐。

由于人类显然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性需求，因此我们也谈及守贞作为替代方案。天主教规定神职人员必需独身。

我说：“如果强制独身，一位禁欲不成的神父，信心就可能破灭。”

“缺乏性满足可以成为一种巨大动力，”教授说。“斯宾（Spinoza）、康德（Kant）、笛卡尔（Descartes）、牛顿或贝多芬似乎都不晓得性事。”

教授说的不错。但我想单身是神给少数人特殊的恩赐，不能强制于每个人，或每个神父。

18

几个星期以来，波普和我轮流照顾鲍里，他躺在四号房，咳嗽得很厉害。阿迪医生说：“如果他能进食，可能还能维持十天。我的探访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他看到我依然内疚。我怕我的到来只会加重他的痛苦。”

我问是否可以让鲍里搬到我的牢房里，便于照顾。阿迪就安排鲍里到我身边的床，我照顾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在我们眼前逐渐衰残。头髮只剩几根，脸颊凹陷，皮肤变灰，大汗淋漓。我日复一日地用海绵擦拭他。

“很快就会结束了，”他喘着气说。“一位神父曾对我说，‘你会在地狱里腐烂。’就这样吧！”

“是什么使他这样说？”我问。

“我因为身上疼痛，就咒骂上帝。他说我将永远受惩罚。”

牧师瓦伦丁（Valentin）说：“人们诅咒共产党，但最终共产党还有可能会释放他们。如果地狱是无尽的，那么上帝不是比我们的秘密警察更坏吗？”

鲍里惊讶地睁开了眼睛。“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有不灭之火？”

“《圣经》果然提及永远的地狱。但地狱是什么？杜托斯基（Dostoevsky）说它是良心的一种状态，而他还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在《卡拉马兄弟》（Brothers Karamazov）中，他提及地狱，说，“我相信这是一种痛苦，就是没有办法爱他人。”牧师回答说。

“我想我不会介意那种地狱吧，”鲍里说。

我说，“也许你还不知道生活在没有爱的地方，会是怎样的。当坏人只有坏人陪伴时，想象那

光景。据说希特勒下地狱时，到处张望，直到他找到墨索里尼（Mussolini）。“老友，这里怎样？”希特勒问。墨索里尼回答说，“不算太糟，但有很多强迫劳动。”说罢就开始抽泣。“来吧，老英雄，”希特勒说。“让我们面对最坏的情况。”墨索里尼说，“你看，我们的督工来了，是斯大林！””

鲍里笑了。“我当然不愿意在下面见到我的前老板安娜·保克。”他躺着思考。“那个说我要永远被烧的天主教神父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他仍然认为，神为了报复（我的咒诅），肯定要永远折磨我。他比他所信的神更好。”

瓦伦丁牧师说：“我毫不怀疑那些在地狱里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无限的惩罚：就像监狱对我们就如无止境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人们也开始爱上帝，他们也会发现自己错了。在耶稣说及的地狱中，也是如此。那是拉撒路的比喻。那富人在地狱里内心开始改变。他曾是自私自利的；如今却开始想到兄弟的安危。于是在地狱中还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一种希望。”

鲍里软弱地向同伴们喊道：“好消息，孩子们。瓦伦丁牧师说我们毕竟不会永远被烧烤。”众人都笑了。雷利，斯达等人也来了。

斯塔将军并没有笑。“我在学校和教堂得到的教导是，上帝将会永远惩罚那些死时依然未曾悔改的人，”他说。“这是公认的教条。”

我用这些话结束了讨论：“你果然在理智上接受这些教条，但不在你心里。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在大痛苦中咒骂上帝，否认祂的存在，他们肯定将会为此受审判。但当你看到一个陌生人的面临生命危险时，你肯定是第一个跑去帮助他的。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他们的邻居将会在地狱里永远受折磨，他们肯定会不断催促邻居们悔改。基督徒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心中不信这个！虽然他们在脑袋上承认地狱是真的。”

19

鲍里的旧有偏见一一消失，但他非但没有变得开朗，反而沮丧。“我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他说，“我曾自以为聪明。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欺骗了很多人。如果你的上帝存在，祂肯定不会要我住在天堂。所以我必然要下去找那头老母猪安娜，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他经常在睡不着的时候，要求我和他说话。

“当我去世后，谁会为我祈祷？”他问道。他想路德宗是禁止为死者祈祷的。我说路德的意思，只是不想让人们以为，无论他们犯了多大的罪

，只要付钱给牧师，请他代祷，就可以叫死者脱离地狱了。

瓦伦丁牧师说：“我们为每天都在死去的狱友祈祷。当一个灵魂离开身体后，我们就中止为他祷告，不是爱的行为。我们何必因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四百年前为公祷的争执，就停止这种祈祷？”

“这对去世的人有帮助吗？”

“当然有用。”瓦伦丁牧师说。“在神面前，人都是活的。于是死去的人，其实依然活着。如果他们还活着，祈祷就有益。”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祷告浪费在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身上。”鲍里笑道，然后又激烈地咳了一轮。

瓦伦丁说：“我确信你也做了很多好事。当然有很多比你更糟糕的人。但我为最糟糕的人祈祷——斯大林、希特勒、希姆莱（Himmler）、贝利亚（Beria）。”

“你祈祷什么？”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说，‘神哪，请原谅那些大恶人和罪犯，在最坏的人中，也请原谅我。’”

那天晚上，瓦伦丁，我，并鲍里一起坐了很久。房间里很安静，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牢房弗里姆吹嘘的声音。他们正在为他的性趣闻爆笑。

几个小时以来，鲍里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睡着了。突然他低声问道：“那会是什么样子？”

“什么？”我问他。

“神的审判。祂是否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当众灵魂来到祂面前时，祂就说：“这个下地狱去；这个往天堂；这个下去！这个上来！这个。。。？我无法想象那个形象。”

我就告诉他我心目中的情景。

“我想上帝坐在宝座上，祂身后有一块巨大的帷幕，我们都来到祂面前。然后上帝用右手做了一个手势，从帷幕后面来了许多活物。一个比一个更美：它们如此辉煌，以至于我们都不能正视它们。这些辉煌的超人类，各个都站在我们各人的后面。我们就问：‘站在我后面的美丽活物是谁？’上帝回答说，‘那就是你，如果你听从了我的话，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听了，就大大懊悔，逃到永远的地狱，因为不敢看自己失去的机会。”

“悔恨，”鲍里低声说。

夜间他发生出血；然后他陷入昏迷。他静静地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的脉搏微弱，但在我的手指下仍然还继续跳动。突然他把手抽回，半坐起身。他发出了一声仿佛要将灵魂从身体撕裂的呼喊——“上帝啊，宽恕我！”

周围的一些囚犯被惊醒了，愤怒地嘀咕着，然后倒头又睡了。

天亮时，我开始清洗尸体，准备下葬，就在这时，有人通知了另一间牢房里的东正教主教。他

过来开始丧事仪式。我继续清洗。主教时不时地打断自己，对我发出嘶嘶声，“站起来。尊重一点。”但我没有抬头。仪式结束后，主教再次斥责我。

我说：“上周这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想要水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喝水？为什么你最后才来——举行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

20

在1955年春天，出现了政治解冻的明显迹象。好些监狱长官因“破坏经济”而被捕。其中也有被送来奥克纳监狱。于是当局必需转移这里的囚犯，让出床位。在六月初，我也必须搬迁到另一个监狱。

阿迪医生说：“你不适合移动，但我们无能为力。你必需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能得到链霉素，不要再给人了。”我向朋友们道别。“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知道，”波普教授说。

我听到守卫喊我的名字，就加入了院子里的一排人。我们是一群相貌奇怪的人，剃着光头，穿着补丁的衣服，各人手里都抓着一捆破布，这是他所有的一切。有些人几乎无法行走。刑期较长的人被命令向前一步，坐在地上，就有铁匠上来

用脚镣扣锁脚踝。一位政治官站在铁匠旁边。轮到我的时候，那军官露出不愉快的笑容，

“瓦斯利，对于戴上镣铐，你肯定有话要说？”

我侧身躺着，抬起头回答道：“是的，中尉。我可以用一首歌回答。”

他双手交叉在背后说道：“哦，拜托。我们都想听听你的歌声。”

我唱起了党歌的开场白：“断链留在我们身后……”铁匠的锤子又敲了几下就完成了任务，在不安的沉默中我补充道：“你们唱断链留在我们身后——但这政权比任何其他政权捆锁更多的人。”

中尉还没有想到如何回答，警卫室里就传来一声喊叫，宣布火车抵达。我们被赶进车厢，躺了几个小时后，火车才开行。它嘎吱嘎吱地穿过乡村。透过小窗户上的洞，我们瞥见了林地和山脉。那是一个温暖而美丽的夏日。

第五章

从布城向西穿越平原的旅程大约有两百英里，但沿途停顿的次数太多，几乎花了两天两夜，才抵达人人惧怕的百年监狱：克拉监狱(Craiova Prison)。

他们在铺着石板的庭院里，把我们的铁链打断。然后在行走在黑暗通道中时，一路殴打我们。他们把我们三五成群地塞进走廊两旁的牢房里。里面传来大声的抗议：“这里没有地方了。我们已经快要窒息了。”守卫们强行挤人，就像挤地铁人潮一样。

我感到脊椎被大力一推，整个人就向前撞去，门在我身后平然关上。牢房里充满了令人作呕的恶臭。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摸了摸，就触及一个人大汗淋漓的身体。慢慢地，当我习惯了昏暗光线（一粒单独的低瓦特灯泡），我看到一层的床铺，一直叠到上层泥板。每一张床都挤满了喘气的人。有些囚犯半裸着，坐在地板上，或者靠在墙上。这里太拥挤，只要你一移动，就会弄醒他人，这就引起咒骂，惊动众人。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只有一次走出这牢房，就是提马桶去臭气熏天的粪池。

我告诉众囚犯说，我是一名牧师，并为众人作了一个简短的祈祷。有一些人咒骂我，但许多人静静地听着。然后有人在一个黑暗的上层床铺叫我的名字。

“我认得你的声音，”他说。“多年前我曾听过你在异教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当我问他的名字时，他回答说：“我们明天再谈。”

漫长的夜晚在凌晨五点结束。起床声号是铁棒敲击一段悬垂的铁轨。

原来昨晚说话的那人，是一个回教教师。他是个小个子，头上缠着一块布，他下来和我握手。

“幸好昨天是在晚上。我才能认出你的声音，”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说。“要不然我真的不能认出你。我可以看到，党方已经对你的

抗议进行了报复。你多瘦啊。”他是一位名叫纳西（Nassim）的回教教师，曾代表穆斯林小团体出席 1945 年的异教大会。

在克拉监狱，我们的友谊在吃第一顿饭时就开始了。油腻的汤在抵达牢房之前就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腐烂的卷心菜丝和未洗的内脏（动物的肠子）漂浮在浮渣中。但进食是一种责任，我把自己的一碗喝光了。

“你怎么能办得到？”纳西问，他的胃已经开始作呕。

“这是基督徒的秘密，”我说。“我想起圣保罗的话：‘与喜乐的人要同乐。’然后我就想起美国的朋友们现在吃着烤鸡，于是就喝第一口汤。接下来，我想到英国的朋友们可能正在吃烤牛肉，味道鲜美，就喝第二口。因此，通过许多友好国家，我与那些快乐的人同乐，就把汤喝完，就得以存活。”

在炎热、闷热的夜晚，纳西和我共用一张床铺。我很幸运不必躺在地上。

“你一动不动地躺着，”纳西说。我们周围的其他人都在咳嗽、坐立不安。“你在想什么？圣保罗现在有没有帮助你？”

我回答说：“是的，现在我为西方人感到高兴，想到他们舒适的家、他们拥有的书籍、他们可以计划的假期、他们听到的音乐、他们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我又记得《罗马书》的这节经文，它

下一段是：‘与哭泣的人同哭。’我确信在西方有成千上万的人记得我们，并正在为我们祈祷。”

2

监狱里的人都感到必须肯定自己。他们喜欢争论。他们常为了一句话，就火冒三丈。当他们发现有人不会回咀反驳时，他们就更加折磨他。在克拉监狱，我面临的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当我讲道时，我必须与呻吟声和假装打呼噜声竞争。囚犯们感到非常无聊。他们没有内在的资源。他们渴望得到熟悉的消遣。我发现布道很快就变成了讨论，然后变成了争吵。但若有人讲故事，尤其是犯罪的故事，就一定会有听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我自己发明的惊悚故事，其中基督教信息扮演了核心但不起眼的角色。

我最受欢迎的故事，是一个名叫皮帕的强盗，罗马尼亚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我描述了我母亲还是一位少女时，如何在法庭上见过他，并且从未忘记过他那张野蛮的、被追捕之神情的脸。

皮帕的父母很富有。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小皮帕由一位监护人照顾。那监护人骗走了他的财产。后来皮帕在一家旅馆打工，店主答应帮他存钱，等他服完兵役回来后，全数交还。皮帕同意了。当他从脱役回来时，店主

却否认过去的合约。这少年在愤怒中就刺死了店主。

皮帕成为一名亡命之徒，并从他的山中藏身处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全都针对旅馆。多年来，他一共杀死了三十六名旅店老板（此时听众们都发出惊讶声。）他并不缺乏同伴。他和另外两个歹徒，穿着偷来的最好的衣服，来到一个村庄，说服了三位少女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在酒里下了药，然后把昏迷的少女们带到了他们的洞穴里。

这些都是事实。但在我的版本中，女孩们醒来时，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给他们讲故事，与绑架她们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浪漫的故事以最漂亮的女孩讲述福音故事并赢得不法之徒归向基督而告终。

同样广受好评的还有迪林杰（Dillinger）的史诗般的叙述，他从饥饿的穷困潦倒的人，变成美国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这是我的许多听众所熟悉的模式。悲惨的童年和社会的不公，常是犯罪生涯的前奏，迪林杰的犯罪生涯是从抢劫电影院收银员的几美元开始的。我说，当我们了解皮帕和迪林杰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时，我们就可以怜悯他们；怜悯产生爱，人类之间的爱便是基督教的最高目标。我们常常谴责人，但却很少提供可能使他们免于犯罪的爱。

我可以一天讲二十四小时，依然不会耗尽对故事的需求。很快的，我发现自己在借用带有基督

教观点的经典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罪与罚》、托尔斯泰（Tolstoy）的《复活》，都是分集讲述的。

“牧师，”一位名叫拉迪（Radion）的护林员说，“我听过很多犯罪故事，但没有一个像你的，最后都是罪犯、受害者和警察一起去教堂。”

众囚犯都笑了，但还是继续听。他们也常常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说的总是滑稽的，不然就是悲惨的，或两者合拼。拉迪就像他照料的林木一样高瘦。他的生活曾是平静的。直到一天，他和两个朋友在森林里漫步，回头看到森林正在燃烧。

“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村庄时，警察就逮捕我们，指我们放火，”他说。“他们殴打我们，直到我们承认纵火，目的是为了破坏当地的集体农场。但在我们的审判中，真正的罪魁祸首出现了，我们就被判无罪。

“别以为我们就可以回家，”他低声说。“他们又把我们带回警局，说：‘现在就承认你们还做了什么。’在酷刑下，我们承认了一个完全捏造的破坏阴谋。我会说任何话来停止那种痛苦！”他们每人被判十五年徒刑。

在克拉监狱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不久之后，我们就彻底彼此了解。监牢里的气氛高度紧张。没有人能够忍受不同的意见。囚犯们失去一切分寸感或逻辑感。

当我重述汉姆生 (Knut Hamsun) 的小说《饥饿》时，这些人的眼睛都亮了。当大家散去吃晚饭时，一位名叫海格 (Herghelegiu) 的囚犯告诉我他有多么感动。我建议他分一点面包给纳西，因为纳西担心肠汤里可能含有猪油，这是《古兰经》禁止的。但如果海格的心灵受感动，他的胃口显然没有受感。他没有接纳我的建议。

知识分子是言语的囚徒。如果有人谈及一种美国的科学发现，就会被讥讽为美国的宣传者。如果有人谈及一位现代的俄罗斯作家，他就会被斥为“国家资助的共产宣传家”。天主教徒拒绝犹太哲学家的智慧，虽然还没有听过那是怎样的言论。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思想，也知之甚少。

有一次我描述了一本我在漫长的夜晚思考的宗教书。听众马上进行判决。

“这是一本充斥着路德宗想法的书！”一位东正教徒喊道。

“很容易看出你是新教徒，”另一位说。

几天后，在与同二人谈话时，我大量引用了“伟大的罗马尼亚作家”奈耶 (Naie Ionescu) 的《真理问题》。这二人的反应非常好。于是我决定，如果我想要读者们公平地思考我的观点，最好匿名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其实是同一本。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学生在背诵自己的一些诗歌时，无人理睬。我悄悄地建议他读另一首诗，并宣布它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于是他继续朗诵自己的新诗。“太棒了，”众人齐声说。

我在末了公布了亚历山大的秘密。就是他方才朗诵的，不是莎氏的十四行诗，只是他自己的创作。我告诉众人不要被名声吓倒，而该公正地做出判断。莎士比亚和拜伦——仅以英国诗人为例——其实常在他们的作品中颂扬卑劣的思想。

当一位英国文学学者称颂莎士比亚思想的高贵时，我回答说，当莎士比亚写作时，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问题正在激烈争斗；然而，一个只读过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学家甚至不会意识到基督教已经到达了英国。

“在他所有的戏剧中，没有一个基督教角色，”我说，“可能唯一的例外只是可怜的科迪（Cordelia）。其他的出名主角扮演甚么呢？克劳（Claudius）杀死了他的对手。女王嫁给了杀她丈夫的凶手。汉勒（Hamlet）梦想着复仇，他不会也不能原谅。波叻（Polonius）是一个阴谋家。奥菲莉（Ophelia）唯一的解脱就是疯狂。奥赛罗（Othello）是一名职业杀手。苔丝（Desdemona）只是对她的公牛扮演母牛的角色。伊阿古是一个欺诈人的怪物，不理睬自己的行为会不会伤害人……莎士比亚是一位大诗人，又深谙人的心理，但他完全不晓得神，也不晓得真美德。”

那位学者说：“或许真的没有所谓的真美德，或基督徒的品格？”

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只刚来监狱几周；当他过多一些时日，他就会明白更多一点。他会看到我所经历过的一些美好光景：那些在最后一刻忏悔

的罪人，和那些宽恕凶手的圣徒。我们至终都希望得到宽恕。

我也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些诗句，显示这位名家本可以成为怎样出色的基督徒作者：

他们说临终之人的舌头，就如深沉的和音，
引人注目，

他们的言语稀少，绝不白说。

因为那痛苦呼吸的人，吐露的是真理。

如果把这种文字形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是多么合宜。

关于服从上帝的旨意，小纳西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经常提醒我们，《古兰经》的每一章都以“以仁慈、充满怜悯的安拉之名”开始，他试图把“服从”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纳西每天跪在地上五次，朝向麦加。当人们取笑他时，我告诉他们说，“当华人要面包，德国人要brot，英国人要bread时，他们其实都是要求同样的东西。格奥是一名天主教徒，所以他用一种方式画了十字符号。东正教信徒卡罗尔也画十字，只是先右后左。浸信会信徒伊恩则紧握双手。那么纳西朝麦加祷告，有何不对？我们朝见神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祂透过我们的爱，洞察我们的内心。

纳西在肮脏和混乱的牢房里铺位崇拜。他谈到他的信仰，说穆斯林相信天使加百利向先知传信，他的热情瞬间改变了那个阴沉的地方。令我惊讶的是，他谈到耶稣时充满了爱。“对我来说，耶稣是一位最神圣、最智慧的先知，他说的是上帝自己的语言。但在我们看来，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我希望我没有冒犯你。”

“绝对没有，”我回答道。“事实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你怎能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一个孩子是男女结合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没有基督徒相信耶稣是这样生出来的。我们称他为神子，是另一种意思。祂之为圣子，因为祂带有上帝的印记，就像一个人总有他父亲的特征。祂是圣子，因为祂充满了爱和真理。”

“这样说我也接受。”纳西回答。我告诉他，耶稣不会拒绝任何爱祂的人，即使一个人不知道他所爱之人的真实头衔。

3

我们牢房里的囚犯，总是旧的去了，新的就来。唯一不变的就是空气。新加入者中有卡莱将军（General Galescu），他曾任军法首长。他希

望上次的大战，能再打一次。他承认说，大多数的战争都发生在“闺房（女人的卧室）”里。他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战争期间：“有那么多漂亮的女间谍——如果她们对我好的话，我总是试图放过她们。”

当卡莱不在谈女人时，就是谈食物。一天晚上，他宣布：“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邀请大家共进晚餐。”由于他年轻时在巴黎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庆祝会——“我们将在马克西餐厅吃饭。请做我的客人。”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惜费用地用酒店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佳肴来款待我们。

“酒店领班。”他喊道。“你推荐什么？马赛鱼浸泡在浓郁的藏红花酱中？一开始就是这一道菜，会不会太重了？那么就来自一碟鹅肝，配来自佩里戈的松露，并热烤面包，新鲜的诺曼底牛油。这一切都太简单了。然后鸭酱橙子——你喜欢鸭子，不是吗，牧师，或者红酒公鸡；还有，对于纳西，必须是插着火焰剑的烧鹅！”

每道菜都附有一份葡萄酒单。将军轻声点了最好的勃艮第和霍克，再加上一大瓶香槟。他又点了一杯金色的伊金城堡酒和陈年白兰地；然后选择了名牌雪茄：亨利·克莱牌子、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欢乐的款待还没有停止，门就打开，盛有腐烂牛肚和卷心菜汤的桶就送了进来。

在谈论食物时，就像在色情白日梦中一样，想象力尽情发挥。比卡莱更简单的灵魂发明了香蕉炸鸡、草莓酱土豆和许多其他幸好我忘记了的菜

单。事实上，克拉监狱的食物是我所遇到最糟糕的，只有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外。这完全是一个惊喜。一天警卫送来一大罐热气腾腾的洋葱汤，然后又送来真正的炖牛肉和新鲜胡萝卜。里面有土豆泥（马铃薯捣成的糊），每人获得两卷白面包。还有一大篮苹果。我们几乎期望可以获得一支芬芳的雪茄！

这意味着什么？囚犯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改变中看到重大意义，我们都希望看到新的奇迹。下午，卡莱将军兴奋地叫我们到窗前：“女人！该死的，她们要走了！”我们挤在那个有铁栅栏的小窗，看到五六名衣着考究的女士由司令官领出了大门。后来，一名咧着咀笑的警卫告诉我们，她们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女性”代表团，逗留了一小时才离开。她们对我们监狱的食物大感满意。

接下来一周的食物比以前更糟。后来我们听说，参观者对罗马尼亚模范监狱的亲眼所见，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流传。

4

那些时候，我们见过几次这种导游服务。

当俄罗斯领导层易手时，共产集团对西方的态度常有短暂的解冻，过后再冻结。而这一次，在斯

大林的继任者们暗自斗争后，最终是元帅布尔加宁（Bulganin）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卡莱说，这位前战争部长的上台意味着“美国人终于必须开战了。”他的观点得到了大量监狱谣言的支持。有消息说，艾森豪总统“亲口”说：“我只要扣上我制服上的最后一颗扣子，东欧的俘虏就会重获自由！”

卡莱的梦想是，一旦红军被击溃，国王就必复位。农民和地主也是这样想。原因很简单：“当国王在时，我有我的田地和牲畜。现在他走了，我就失去了一切。”

在罗马尼亚的前朝国庆日的那天，牢房中许多人都参加了一项仪式，其中包括为国王、王后和太后的祈祷。就连党方的线人也感到，不干涉为妙。我们中间有一位是左派的共和党人，校长康斯坦。他总是反对君主制度，但林务员拉迪安却说，“排场和荣耀对你可能是无需的。但这些对于一个国王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无需与谁争斗。他与政治家不同，政客必须通过战争建立自己的声誉，总是以我们为代价。但国王却给我们平安生活。所以我拥护国王！”

拉迪安也击败了喜欢嘲笑宗教的卡莱将军。

将军说：“如果耶稣真的能把水变酒，为甚么不开一间酒廊，为自己创造财富？”

拉迪安回答道，“如今要证明救主把水变为酒，已经为时太晚。但我可以向你证实，耶稣能把酒变成家私。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那么奇妙？”将军问。

“正是，”拉迪安说。“在我悔改之前，我把赚到的每一块钱，都用来买酒。我太太连坐的椅子也没有。当耶稣进入我心后，我们就有钱买家具了。”

那年春天带来了消息，这次是官方的。它结束了卡莱将军的战争游戏。俄罗斯人承诺将会从奥地利撤军，“冷战十年后，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峰会”计划在日内瓦举行。很快，舆论都说“和平共处”。左翼校长康斯对此充满了兴趣。“为什么西方不应该与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谐相处？”他问道。

我说：“我不是政治家，但我知道至少教会不能与无神论和解。”

“那么你讨厌无神论者吗？”康斯问。

“远非如此，”我回答道。“当然，我讨厌无神论，但我爱无神论者；就如我讨厌盲目，但爱盲人一样。由于无神论是精神的盲目，因此我必须与之斗争。”

康斯假装惊恐的说，“牧师，你说争斗？要打架了？我还以为基督徒总是转过另一边脸？圣法兰西不是救了一只狼脱离猎人的手吗？这圣徒曾说，‘不要杀死狼兄弟，它也是上帝造的。’”

“我深深地敬佩圣法兰西，”我回答道，“但如果我不射杀狼哥哥，它就会吃掉羊妹妹。我杀狼的职责，是受到爱的启发。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但当别无选择时，祂自己也使用武力。上帝每天夺走千万人的生命：祂的本性之一是给人死亡，就如祂给人生命一样。”

刚来到克拉监狱的工程师格洛（Glodeanu）说，他听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说西方列强不该再试图干涉共产集团的内政。

我反对道：“如果我在船上敲一个洞，然后对你说，‘别干涉——我打的这个洞是在我一边，’你会同意吗？当然不。你会说，‘你在你那儿打洞，可是它最终也会淹死我。’”

“共产党，”我继续说，“占领了整个国家，并用仇恨毒害年轻人。他们企图推翻全世界的。这不是内部事务。”

“这是国际土匪行为，”卡莱说。

康斯叫道，“将军，西方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他说，“斯大林也不是完全邪恶的。他曾说，人类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本。”

卡莱哼哼道：“这就是我们被关起来的原因。”但康斯坚持认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工业与文化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他说。

我回答说：“古代到埃及的游客会对法老的金字塔感到惊讶，但上帝并不欣赏它们。它们是奴

隶的作品，上帝倒关心那些奴隶。在今天的俄罗斯和卫星国，当局强迫百姓建造你所说的工厂和学校。我们的学校现在教的是什​​么？教导仇恨西方。”

康斯说：“共产党人说他们的计划，是放眼未来。这可能会牺牲目前的一两代人，但我们正在为人类未来的福祉奠定基础。”

我说：“为了让后代幸福，人们必须做好自己。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却不断地互相指责。苏联最有权势的共产头领们，每一个都被他们的党内对手谋杀了。有哪一位共产党能高兴？他们不晓得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他们也有好的一面，”康斯反对道。“没有人是完全坏的，共产党人还保留着上帝的形象。”

我同意。“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起初，他改善了大多数德国人的命运，使他的国家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他为德国打下许多国家，却摧毁了德国的灵魂，甚至是在德国战败之前，他已经破坏了他的灵魂。共产主义的成功也是通过牺牲人类最重要的本质，即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

“世界需要和平，”康斯说。“你的选择是什么？原子战争？”

“核战争不是一项选择；没有人要那个。世界有严重的毒瘾问题，但我们不会效仿希特勒，将毒瘾者送进毒气室。但我们依然不能与贩毒团伙‘和平共处。’即使我们要奋斗五十年，也必须

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如何能够与那些无法自己和平相处的人们谋求和平？他们的领导人想要的只是权力。共产党人想做的就是在下一次发动攻击之前，叫我们放松防备。”

我无法给康斯任何印象，因为他坚信苏联自吹的形象。由于他正在我的下层床，于是我就弯下身子，拔起他用来枕头的小包。他的头撞到墙上。他很愤怒。

“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和平共处呢？”我问道，“我已经准备好成为朋友了，现在我已经偷了你的枕头包裹。”但在话题转向其他事情之前，我必须先归还他的宝贵枕头包。

康斯是迷信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在列宁和斯大林学派中，受过训练的党员将善意视为可以榨取利益的弱点。于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必须先击败他们。爱不是万灵丹。共产党统治者是国际罪犯，罪犯只有被打败了，才会悔改；那时他才能被带到基督面前。

我肯定西方的要么就是摧毁共产主义，要么就是被共产主义摧毁。

5

为了在东方与西方首脑会议之前，展示共产的好处，当局就停止了我们在监狱中一些最无人道的暴行。过去在萨尔（Salcia），当局对犯人的惩罚，包括吊起囚犯的后跟，以及将妇女浸泡在冰水中几个小时。如今那所监狱全体职员被捕。官方证据显示，在“大队长”之间的竞赛中，有 58 人死亡。当时各队长正在比赛，看那一队能把最多的囚犯累死；事实上，转移到克拉监狱的幸存者说，当时累死的至少有八百人。

为了表现司法正义，党方把萨尔监狱的职员们判了长期徒刑，这次清洗也震撼了其他的监狱。狱方不再殴打囚犯。狱卒们变得小心翼翼。当吉拉瓦（Jilava）指挥官格奥（Gheorghiu）上校提问，谁有所投诉时，有人把一盘麦糊抛向他。那名罪犯得到的处罚不过是单独监禁一天而已。

然而，这改革是短暂的。不久又开始殴打和侮辱了。大约一年后，当西方各国已经遗忘这些监狱暴行后，萨尔大屠杀的凶手们不单获得复职，而且还得到晋升。只有那些成为他们酷刑工具的普通罪犯，仍然关在狱里。

在这次监狱大变动中，我多次被迁移。一系列噩梦般的旅程在我脑海中合为一个。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群没剃胡须的光头囚犯在火车上颠簸。我们总是戴着五十磅重的铁链，这些枷锁割破我们的衣服，在脚上磨出伤口。我们营养不良，需要几个月的才能痊愈。

有一次，我们的火车在夜间停下来，一声哀号打破了沉默：“我被抢劫了。”

我坐起来，发现小丹，一个来自布城的小骗子，从一个趴着的人移动到另一个趴着的人，把每个人都摇醒。人人都骂他，但他继续嚎叫，“我藏了五百元，现在都不见了。这是我所有的财产！”

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说：“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不会怀疑牧师偷窃，但如果你怀疑，你可以对我进行全身搜查。”

其他人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也让小丹搜查他们，但是什么也没找到。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黎明时分，我被一场新的、更严重的骚乱吵醒。其他十八名囚犯也都失劫了。

“我们中间肯定有小偷，”小丹哭道。

几天后，在我们的下一站——一度臭名昭著的艾巴监狱，我向一名因盗窃罪服刑一年的男子讲述这失窃的事。他哈哈大笑，说道：“我认识小丹很久了。他正在玩把戏，好知道你们各人把值得偷的东西藏在哪里。”

艾巴监狱有很多“小丹”，在这监狱，“政治犯”和普通罪犯关在一起。有一次，一群人在玩自制的骰子，我打瞌睡，突然醒来，发现一名囚犯正在解开我的一只鞋带。另一只鞋已经被他脱掉了。

“你拿我的鞋子做什么？”我问道。

“我刚刚通过骰子赢得了它们，”他咧咀一笑。当我坚决不给时，他很生气。

盗贼的世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发现他们喜欢谈论自己的经历，而且风险越大越好。他们在刺激和危险中茁壮成长，就像其他男人喜欢喝酒、赌博或女人一样。我一直对他们的专业精神感到好奇。

一天晚上，当大多数囚犯都在外面时，门突然打开，看守扔了一个扒手，大家都称他为“手指”。他在地板上打滚，喘着粗气，呻吟着。我把一块抹布浸在水里，用海绵擦去他肿胀的咀里的血迹。看来他是从厨房偷东西的。

“你不是一个坏人，牧师，”手指说。“下一次我有好收获时，我不会忘记你。”

我说我希望他能找到一种不会带来如此后果的生活方式。他笑了。“他们打我是徒劳。”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怎样也不会放弃。”

我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告诉他：“谢谢你。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

“你什么意思？”手指问道。

“如果殴打不能令你放弃你的职业，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为赢得灵魂，我也该精心思考。我越听你的故事，就越得帮助。”

他痛苦地笑了笑，“你在开玩笑，牧师。”

“真的，”我说。“例如，你在晚上工作，如果你第一晚失败了，第二晚再试。所以我作为牧师，也该整夜祈祷，如果不能获得想望的，也不放弃。你偷别人的东西，但小偷之间也有诚实：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也该如此。你们小偷不怕惩罚；我们也无需退缩。正如你冒一切风险，我们也是，因为知道可以赢得天堂。”

艾巴监狱便是我妻子经历过的运河奴役营。我知道她如今在布城。我不断在想着她。我们住在一系列长屋里，每间小屋住着五十个人。我们周围有许多废弃的营房，还有莎宾娜一定熟悉的菜田。几周后，当我又搬迁时，这种带着忧郁的安慰也离开了我。

“手指”来对我说再会。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名叫卡拉波（Calapod）的同事，这人是一名出名的强盗，曾令整个郊区恐惧。他拍着我的背，喊道：“这就是那喜欢与盗贼的圣牧师！”

“卡拉波先生，”我说，“耶稣并不介意将自己比作小偷。祂应许说，‘我会在夜间像小偷一样来。’正如那些被你抢走的人永远不知道你几时会来一样，有一天晚上，耶稣会来讨你的灵魂，你却还没有准备好。”

在克拉监狱和艾巴监狱的潮湿寒冷中度过了几周后，我的肺结核又全面复发了。我的又一个监狱，是盖拉监狱(Gherla)。它位于特兰西山脉(Transylvanian mountains)。我立即被关进了一排称为“医院”的牢房。我们的医生是一位名叫玛丽娜(Marina)的年轻女子。她告诉我说，盖拉是她的第一个医务区。其他病人说，当她初到的第一天，当她从一个牢房到另一个牢房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所受的训练并没有给她心理的预备。这里的肮脏、饥饿、缺乏简单的药品和设备、粗心与残忍，是她未曾料到的。他们以为她会晕倒了，但她却还能坚持，直到检查完最后一个囚犯。

玛丽娜是一个身高、脆弱的女孩，金色的头发衬托出一张疲惫的脸。但她有巨大的勇气。检查后，她告诉我：“你需要营养的食物和充足的新鲜空气。”

我忍不住笑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吗，玛丽娜医生？”

她的眼里涌出泪水。“我还能说什么？这是我在医学院学到的。”

几天后，高级官员来盖拉访问。玛丽娜医生在我们牢房外的画廊里，紧张的对他们说：“同志们，这些人没有被判死刑。国家付钱给我让他们活下去，就像付钱给你们，要你们确保他们关

押稳妥一样。我只要求一些必须的条件，让我能做我的工作。”

一个男人的声音粗暴地说：“意思是你站在这些亡命之徒的一边？”

“督察同志，对你来说，他们可能是亡命之徒，”她回答道，“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病人。”

情况并没有好转，但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胜过药房里所有的药物。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前，狱方允许亲属探访。

我们都异常兴奋，神经紧张。某一时刻，一个人会欣喜若狂；另一会儿，他又几乎要哭了。有些人已经十年或十二年没有家人的消息了，而我八年没有见到莎宾娜。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守卫呼叫我的名字，带我进一个大厅，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大约二十码外，我看到妻子坐在另一张桌子后面。指挥官和他的手下站在我们背后的墙边，就如主持一场网球比赛。

我凝视着莎宾娜，在我看来，在她受苦的岁月里，她获得一种我未曾见过的平静与美丽。她双手合十地站在那里，微笑着。

我抓着桌子喊道：“你在家还好吗？”

即使我自己，也感到我的声音很生疏。她回答说：“是的，我们都很好，感谢上帝。”

司令官插话道：“这里不能谈上帝。”

“我妈妈还活着吗？”我问。

“赞美上帝，她还活着。”

“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许提上帝。”

然后莎宾娜问道：“你的健康怎么样？”

“我在监狱医院——”

指挥官说：“你不可以透露你在监狱里的位置。”

我又尝试说：“关于我的审判，还有上诉的希望吗？”

指挥官又说：“你不准讨论你的审判。”

就这样，直到我说：“回家吧，莎宾娜，亲爱的。他们不让我们说话。”

我妻子带来了一篮子食物和衣服，但她连一粒苹果也不能给我。当他们把我带走时，我回头看，见到她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穿过大厅另一端的门。指挥官点燃了一根新香烟，他的思想飞到别的事物去了。

那天晚上，玛丽娜医生停在我的床脚，一脸关切。“哦，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妻子的来访会给你很多好处。”

几周以来，玛丽娜医生和我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没有受过任何有关宗教的教育，但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这些年头，大家不都是无神论吗？”

有一天，我和玛丽娜以及另一名基督徒囚犯一起在她施手术的小房间，我提到那天是五旬节。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执勤的警卫正在检查文件，我等他带着他想要的卡片离开，才回答：“今天是神赐律法的日子。几千年前，在这节日，神给了我们十诫。”

我听到警卫回来的脚步声，就大声补充道：“医生，我咳嗽的时候这里很疼。”

警卫把卡片放回档案里，又走开。我继续说道：“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到使徒们身上的日子。”

看守的脚步声又响了，我连忙说：“晚上我的背疼得厉害。”

玛丽娜医生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笑出来。我继续我被打断的布道，而她则拍着我的胸口，叫我咳嗽，并盯着我的喉咙，直到最后她突然大笑起来。“停下来，”她喘着气，用手帕捂住咀，警卫冷漠的脸再次出现在门口。“稍后再说。”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告诉她福音的故事，当我和盖拉监狱的其他信徒引领玛丽娜医生归主后，她冒着更大的风险来帮助我们。多年后，在另一所监狱，我听说她死于影响心脏的风湿热。她肯定是工作过度了。

我又被带回瓦卡监狱。就是我多年前，在内政部牢房里单独监禁一个月后，送去的监狱医院。这里比以往更加拥挤。结核病患者和其他病人必须共用房间，互相感染。

两名拷问我的秘密警察，问我如今对共产主义看法如何。“我该怎么说呢？”我回答。“我只能从监狱里看共产主义。”

他们笑了，其中一个说：“现在你可以从一位贵宾那里了解多一点。前财政部长卢卡（Vasile Luca）就在你的牢房里。”

1953年3月，卢部长就因货币丑闻被解职。德伊正在打压安娜保克集团。卢卡和内政部长乔治（Theohari Georgescu）一起被开除党籍。现在这三人都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里，与他们统治五年期间关押的受害者们，一同坐牢。在卢卡掌权的日子，奉承他的人多，爱他的少。现在，狱卒和囚犯都趁机蔑视他。卢卡独自坐在我们牢房的角落里，咬着手指的关节，自言自语——他又老又病，样貌已经不像报章头版常见的那人了。

一个基督徒，无论遭遇甚么困难，都知道他是为了信仰。他如今走基督受苦之路，就有末后的指望；但卢卡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却毫无希望。如果反共人士（民族主义者）夺取了政权，或者美国人来了，他和他的战友将是头一批上吊的。而目前他们却被自己的同志们处罚。两头都

是死路。当我们见面时，卢卡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他告诉我，在被拉下台后，他在酷刑下承认了最荒谬的指控。军事法庭判处他死罪，随后减为无期徒刑。

“他们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他咳嗽着说。

他习惯对党内的敌人大发雷霆。有一天，当他吃不了我们牢房里的发臭汤糊时，我把我的面包递给了他。他如饥似渴地接过它。

“你为什么这么做？”他问。

“我了解到在监狱中禁食的价值。”

“那是什么？”

我说：“首先，它表明精神是身体的主人。其次，这就让我免了与人争吵。第三，如果一个基督徒在监狱里不禁食，他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人的？”

卢卡咽下面包，承认说，自从被捕以来，帮助他的都是基督徒。但他的内心的苦毒又发作了。

“然而，我认识的恶棍牧师太多了。作为党中委的一员，我对宗教的管控非常严格。我的部门对全国的每一位牧师都存有档案——包括你的档案。我诧异罗马尼亚是否有一位神父不会在天黑后敲我的后门（行贿求助）。真的是一群好兄弟啊。”

卢卡对世界的怨恨不允许他承认任何人的善良。他背诵出无神论者常提的，有关教会迫害科学

的历史。我让他想起许多基督徒科学家——从牛顿、开普勒 (Kepler) 到巴甫洛夫 (Pavlov) 和麻醉剂的发现者辛普森 (Sir James Simpson) 爵士。

卢卡轻蔑道：“他们只是顺应了当时的习惯，所以上教堂！”

我说：“你知道发现微生物和疫苗的巴斯德 (Louis Pasteur) 的宣言吗？ ‘Je crois comme une charbonniere le plus que je progresse en science.’ 他像煤矿工人一样相信，就像上世纪的女煤矿工人一样。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保留了最简单工人的信仰。”

卢卡愤怒地说：“教会迫害的科学家呢？像伽利略，他被抓送去监狱。佐丹奴 (Giordano Bruno) 被烧死了……”他停了下来。

我说：“于是你在两千多年里只能找到两起案件。以任何人类标准来看，这都是教会的胜利。比较一下过去这十年来共产党的暴行。仅在罗马尼亚，就有数千无辜者被枪杀、折磨。你自己也是被伪证和威胁、还有党方贿赂获得的虚假口供陷害的。你认为在共产掌权的各国，会有多少误判？”

但卢卡对宗教封闭了自己的思想。

一天晚上，我谈到最后的晚餐，以及耶稣对犹太人说的大话：“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

过了一会儿，卢卡对我说：“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上帝，但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唯一的祈祷就是‘你要做的，快做吧！’”

他的病情恶化。他吐血，发烧时额头上冒出冷汗。

就在那时，我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在我离开之前，他许诺会为自己的灵魂思考。我不知他将会如何，但当一个人开始与自己辩论时，他找到真理的机会就很小了。悔改常是瞬时出现的。神的信息刺痛人心，从内心深处立刻出现一些新的、具有治愈作用的东西。

那时我遇到了很多像卢卡的人，并经常与朋友讨论当共产主义垮台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共产党的头目和他们的随从。基督徒都同意宽恕敌人。可是依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宽恕应该完全，另一派则认为宽恕也有限度。耶稣告诉彼得，宽恕“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而共产党人早已大大越过七十七次了。

我的观点是，对每个人进行了个别的辨别，明白各人行恶的缘故，就将各人放在他们不能作恶的地方。共产党人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彼此惩罚。有传言说斯大林毒杀了列宁，又用冰镐杀了托洛斯基。赫鲁晓夫憎恨斯大林，以至于毁掉了斯大林的名誉，并盗窃了他的坟墓。卢卡、乔治、安娜鲍克等人都受害于自己残酷的制度。

我的下一个旅程是走公路，乘坐一辆贴有“国家食品”标签的卡车（罗里车）。囚犯保安车上经常贴有这样的标志，以隐藏不断移动的囚犯人数。这也许是担心囚犯被人营救。当时与我同车的有两位囚犯。其中一人是前铁卫队首领，被判二十年徒刑。另一名是一名小偷，已入狱六个月，预计不久就释放。

“我不会再看到这些了，”铁卫队长摇晃着锁链，很高兴地说。然后，他背对着我，告诉小偷说，官方已经同意在大国首脑会议之前，要释放所有的“政客”。小偷就说，他想要的只是一份正当的工作，可是却没有人给他。

那位铁卫队长表示同情。然后，突然他抓住邻居的袖子说：“是了！我有一个好主意！为什么我们不能互相帮助？既然俄罗斯人已经让步，美国人将在一个月之内抵达我国。我在政府高层有好些具有权力的朋友。假设我们交换了身份——在下一站，你回答我的名字，我回答你的名字。一旦我用你的名出狱，我就为美国的接管做准备。你用我的名字，不久就会当作政治犯获得释放。其余的由我来办——你的未来肯定有保障！”

小偷很高兴。我还没来得及干预，我们的这部面包卡车就抵达监狱，两人回应对方的名，被带

到不同的所在。十天后，队长被释放了。小偷眼睁睁地看着几周、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美国人的消息。面对履行他人的长刑，他告诉了司令官真相。于是那名铁卫被追捕回来。但这小偷却也被判二十年，罪名是帮助法西斯罪犯逃跑。

这新监狱名为吉拉瓦(Jilava)，意为“潮湿地”。进入其中时，卡车沿着陡峭的坡道驶下，我们就落在地下潮湿的黑暗中。吉拉瓦最深处，达三十多英尺。它原是一座堡垒，周围有战壕，不知情的人可以在上面走过而不知道它的存在。羊群在上面吃草，我们感觉被活埋在数千吨的泥土下。吉拉瓦可以容纳 500 名士兵，但现在它却关押了2000 名囚犯，这些牢房和隧道也有加以扩大的，成为给囚犯们体操的庭院。在某些地方，有水顺着墙壁流淌，墙壁上沾满了大片绿色的苔藓。

我旁边铺位上的波佩上校(Popescu)是敖德萨的前警察局长，他说，当他到达时，情况要糟糕得多。一百个人挤在我们的小牢房里，窗户用木板封住，有些人窒息而死。

波佩又说，战后他在一个山洞里藏了十二年，避开俄罗斯人。他睡在稻草上，吃的东西，是外面的朋友从一个小洞塞进去的食物。但最终，秘密警察找到了他。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蹲了这么久，他的双腿已经开始麻痹。出来几个月后他才能行走。

从波佩粗俗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宗教多年来一直不在他的思想中。我问他怎样渡过孤独的山洞。

“我构思了一本小说，”他说。“如果我把它写下来，可以长达五千页。但没有人敢发表。”

我问为甚么。波佩就背诵其中的一段，我就明白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淫秽的洪流。

幸运的是，走廊里的一声喊叫宣布我们开饭了。我拿着自己的那碗腐烂胡萝卜汤，到一位邻居的铺位上，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他是一位年轻的无线电员，曾为一个爱国团体向西方传输信息，他提到他是通过摩尔斯电码，认识主耶稣的。

“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我在内政部的牢房里受到审讯，当我在那里时，隔壁一位不知名的牧师通过墙壁向我敲击圣经经文。”

当他告诉我他牢房的位置时，我说，“我就是那个牧师。”

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逐渐建立了一个基督徒核心，在整个监狱中传播神的道。但有一个人却是人人都撇弃的，就是格奥（Gheorge Bajenaru）。他是一位东正教主教的儿子，也成为一名神父，可是外号却是“罗马尼亚最邪恶的神父”。原来他是通过伪造父亲的签名来获得荣誉和学位。后来又盗用他妻子的校长名义盗用一所学校的资金。当妻子自杀以掩盖他的罪行时，格奥完全没有任何悔意。他甚至为了钱而告发自己的父亲。

然后他又假扮难民，跑到西方。在那里他很快就被任命为主教，控制着所有罗马尼亚东正教流亡者。他从他们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里获得了资金。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则在等候时机。

格奥是一个世俗而傲慢的人，身体魁伟如公牛。但现在他却消瘦了。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前往奥地利参加一位富有的罗马尼亚人的婚礼，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一天晚上，他从一家法国区的餐馆出来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四个大汉向他扑来。他感觉有一支针刺进了他的腿。

“我在奥地利的苏联区醒来。墙上有一面镜子，但我不认识镜中的人。我的黑胡子不见了。他们把我的头发剪短，染成红色。我被飞往莫斯科的卢比监狱（Lubianka prison）。拷问官们以为我是英美间谍界的关键人物。他们想知道《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铁幕后的阴谋，以及罗马尼亚流亡西方者的秘密计划。我什么也说不出，因为我只是在享受人生。可是俄罗斯人不信。“好吧，主教，”他们说，“我们必须用手术激发您的记忆。”

格奥举起双手，显示他的指甲，几乎全部都被拔除了。“他们逐一拔掉，”他说。“医生穿着白衣服。两位护士也是。他们有一切医生的道具，只是没有麻醉剂。”

格奥被酷刑数周。当俄罗斯人确定他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可以提供时，他已经快要疯狂了。俄人

就把他移交给布城的秘密警察。在那里他们又重新开始折磨他。

在吉拉瓦，党方对他的审讯仍在继续，当他审问完毕回到我们的牢房时，囚犯们指责他告密。事实上，他只希望为自己的所作的赎罪。苦难净化了他。但其他人却不信，尽管格奥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他的改变。有一次，他举行公开礼拜仪式，大声为国王和王室祈祷时，有人告诉守卫。他和我以及其他一些神职人员一起被送到“黑屋”。

我们被赶下一段陡峭的台阶，来到堡垒深处的一个地下室，这可能是一个废弃的弹药库：因为外面的炮弹肯定不能穿透到这里。水从房顶滴下来，把地面浸湿。即使在夏天，这里也冷得刺骨。当时在黑暗中有人说：“我们必须不断行走。”于是我们形成一队，开始不断的兜圈步行，在黏糊糊的地板上滑倒，又起来再走。几个小时后，我们精疲力竭，摔得遍体鳞伤。

我们很幸运。有人说过去有些人被脱光衣服赶下去。又曾有十八人在黑屋里存活两天。为了避免冻死，他们在黑暗中形成了一条人蛇。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前面的人取暖，他们缓慢地绕圈子，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秽。经常有一个人倒下，但其他人总是把他从污泥中拉上来，强迫他继续前进。

格奥继续为国王祈祷。他最后一次被传唤受审，回来时平静地说，他已被判死刑。格奥终于達

谦卑。我注意到，谦卑的人犯了大罪后，往往比灵性高尚的基督徒更能抵抗迫害。生活在罗马战车比赛时代的圣克里斯顿（St John Chrysostom）曾说：“如果一辆由正义和骄傲的马儿牵引的车，与一辆由罪孽和谦卑牵引的较量，我相信第二辆会先抵达天堂”。

波佩上校建议格奥尝试上诉。格奥回答说：“我不承认这些法官。我只服从上帝和国王。”

在他被转移到死囚室后，波佩承认说，“也许我们对他的批判是错的。”

我们已经四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然后他又回到我们的牢房，他的死刑已经改为无期徒刑。尽管他性格完全改变了，但大多数犯人还是拒绝他。当党方建议他为秘密警察效劳，就可以释放时，他回答说：“当最后一个牧师也获释了，我才会离开监狱。”

格奥被转移到另一间牢房，在那里他遭到囚犯们的拳打脚踢。他曾两次试图自杀。后来他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并在那里去世。

9

我在吉拉瓦时，所见的首次处决，是阿尔诺两兄弟（Arnautoiu）。他们作为游击队员在森林

里生活了多年，直到一名妇女探望他们的藏身处。这女人被士兵跟踪，那两兄弟就被抓获。

处决是在严肃的仪式下进行的。黎明时分，走廊里站满了警卫，数百名囚犯在牢房里透过裂缝观看指挥官带领一小队人进入院子。首先走来的是两名高级军官。然后，兄弟俩带着锁链，两侧都有警卫。一名医生尾随其后。更多的警卫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机关枪。当这二人的锁链被打断后，他们的头被套上麻袋，然后被推进车里，车开到不远的郊外。在那里，一位侏子手向他们的后脑勺近距离射击。我们听到了枪击声。

那位侏子手是一位名叫尼塔（Nita）的吉普赛人，他每次都获得500里尔（罗马尼亚币，lei）的奖金。他是我们这里最有礼貌的看守：囚犯们称他为“吉拉瓦黑天使”

“我总是在他们的行刑日之前，在牢房里给他们最后一支烟，”他告诉我们。“我试图让他们保持勇气，这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在最后一刻获救。”

奇怪的是，这确实发生在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鲁格（Lugojanu）身上。他的父亲是前朝政府部长，在监狱被酷刑致死。那少男就在一些朋友协助下，对军警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后来一名参与者被捕，又吐露了实话，因此鲁格与其余八人都被判处死刑。

头两个人被带到院子里处死，然后是第二对。其他人听到锁链被拆除的声音。他们听到警卫过

来接下一对。其中一位后来告诉我，“我感到非常平静。我看到了基督，祂对我说温柔的话。我有信心我会被缓刑。”当他的牢房的门打开了，却是指挥官本身。原来从布城传来指令，吩咐其余的死刑犯都获减刑。在监狱里，我多次看到这种神秘的力量在最后时刻支撑着人们。

黑天使的礼貌是他个人对这份丑恶工作的道歉。但其他狱卒却没有这种感动。

吉拉瓦监狱是一个中站。囚犯们常在这里遇见过去的仇人。许多囚犯都是过去的警员。共产党时常利用前警官训练秘密警察。然后，在用尽他们的好处后，学生们就逮捕他们的教官，因为他们曾是反共分子。最终没有一个旧政权的官员能够逃脱被清算的厄运。

但有一天，这些囚犯们找到了一个发泄憎恨的对象。

那人是从另一个牢房转送过来的囚犯。这人伤痕累累，衣衫褴褛肮脏，下巴松垮，惊恐地看着我们。一声怒吼响起：“阿尔本！”阿尔本上校曾经是艾巴监狱的指挥官，他曾将数千人逼死。现在阿尔本成了运河失败的替罪羊。我们记得阿尔本如何迎接新来的囚犯：“教授、医生、律师、牧师和所有的聪明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大脑；我们只需要双手，就是你们的高贵的手。作为报酬，你们会获得呼吸的空气。别以为你们将会获释，除非你们死了——或者是他们停止运河工程，把我关起来！”

现在，这位无所不能的阿尔本就像一只被催眠的兔子一样盯着我们。一名囚犯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了起来。另一个人把他转身。第三个人踢他的下体。阿尔本在猛烈的打击下倒地，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我试图救他，但那些人却转向我：“那么，你也站在这凶手一边？”

阿尔本在嘲笑声中挣扎着站起来，浑身是血和灰尘。他双手捂住脸，在走向门口的途中再次摔倒，被床铺的尖角严重割伤。衬衫被粗暴地从他的背上撕了下来。最后，他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阿尔本从一个牢房转送到另一个牢房，受折磨，最后当局把他送往玛里监狱（Ocnele-Mari prison），就是专门容纳失宠的党官之的监狱。

几天后，我认出了另一张熟悉的面孔，杜上校（Dulgheru）。他曾是秘密警察的首席检察官。他曾在卡利单独监禁牢房，审问我一个星期。我马上警告他有关阿尔本的命运。于是他试图不让人认出他，但总有人很快就发现他。

他告诉我，他被指控是前朝政府的警察细作。当共产党要坑害一名同志时，常用这种指控。他描述了他被捕的情况。当时他带着三名下属，前往牢房审问一名囚犯。他们礼貌地打开牢房门，让他进去，就在他身后关上了门。杜尔发现自己被锁在一间空牢房里。他打门要出去。他的手下

却大笑。他听到其中一个人说：“这一次你便是笼中鸟。”

当杜尔的身份在吉拉瓦被发现时，他遭到囚犯的野蛮袭击，以致必需被转移到马里监狱去。那所党方的监狱很快也爆满了。

他离开后不久，我被带到布城接受审讯。在秘密警察总部，一位身穿制服的上校向我提出的问题，似乎是为观察我对当局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听我的回答。他没有告诉我他见我的真正目的。

监狱里人满为患，“秘密”囚犯共用牢房。我和一个身材魁梧、闷闷不乐的人关在一起，他原来是首席“再教育者”图尔（Vasile Turcanu）。他被判死刑。过去党方曾给他杀人的准证。如今党方不立刻杀他，是为了在需要转移国民视线时，才宣布处决他。

图尔提及他的前老板、可怕的安娜鲍克（Ana Pauker）。他说，她也遭受酷刑。他们首先把她与被她逮捕的法西斯妇女们关在一起，然后再把她关在精神完全错乱的妇女囚室中。图尔也提及1953年清算时，内政部长乔治（Teohari Georgescu）被捕的情况。

乔治自己的三名保镖拿着左轮手枪进来时，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的一排电话机前。他们命令乔治起立，转向他自己的金边肖像，脱下裤子给他们搜索。

我在秘密警察总部期间，听到的最令人吃惊消息是，在苏联，斯大林被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

Khrushchev) 谴责为杀人犯和暴君。还有，新总理赫鲁晓夫在 1953 年圣诞节前夕处决了贝利亚 (Beria) 和他的六名得力助手，以及数千名较小的苏联头目。罗马尼亚也开始诋毁斯大林。罗马尼亚新独裁者德吉正在推行一项更受欢迎的政策。德吉自己也喜欢过好日子，他的性情比安娜包克圈子里的人好的多。

10

我带回吉拉瓦监狱的消息，令牢房哗然。每个人都为斯大林失神座（逝世又蒙羞）感到高兴。各人都希望这能加速他们自己的释放。

但波佩说，“我了解共产党。他们会谴责强盗，但不会偿还被抢劫的人。”

“无论如何，斯大林已经完了，” 另一名囚犯说。

“愿他烧在地狱中。” 第二个喊道。在欢笑声和嘲笑声中，两名囚犯一起跳着华尔兹舞蹈，尖声喊着“乔叔叔（斯大林小名）”的猥亵言论。只有狱卒们沉默不语。斯大林的失势可能危及他们。

波佩对我喊道：“你看起来不太高兴，牧师？”

我说：“我不能对任何仇恨感到快乐。我们不知道斯大林的命运。他可能在最后一刻得救，就如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

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言论。在斯大林犯下这么多罪行之后，怎么还有人会这么想？

“也许他就像一个富翁，一生只做了一件好事，最后却上了天堂。”我便告诉他们这个故事：

“曾有一个靠剥削穷人而发财的富翁，满心憎恨他乡里的牧师，仅仅是因为那牧师为人善良。当他们在街上相遇时，这富翁总是向牧师的脸上吐口水，而牧师却不回避，心想，这可怜的富人大概没有别的乐趣了。然而，这位名叫博德的富翁每年都会去一次教堂，总是在耶稣受难日。当他听到受难的故事时，两滴眼泪就会从他肥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他偷偷地把它们擦掉，然后在奉献袋开始流传之前，就起身回家。

“在一个受难节，一大群会众等待礼拜开始。牧师却没有出现，博德也没有来。一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有人上去看祭坛的后面。牧师正躺在地板上，平静地呼吸，闭着眼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人们意识到他正在受圣灵的感动。原来那天早上，博德已经去世，并在接受审判。当魔鬼将他所有的恶行都放在天平上时，他的守护天使除了他每年流下的两滴眼泪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放在另一边的。然而，这些眼泪的重量却与所有恶行的总和一样重。于是怎么办？博德开始出汗，浑身颤抖。就在这时，上帝移开了视线，财

主就乘机从天平上偷偷取去一些恶行。天平就向博德这边倾斜。但上帝却是可以看到背后的。祂悲伤地对财主说：‘从来没有人敢在审判日欺骗我。’祂环顾四周，问：‘有谁要为这人说话？’天使们都沉默。

“上帝说，‘这里不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我们不能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定一个人的罪。’但连富人的守护天使也不敢为博德辩护。他只说，‘博德的镇上有一位牧师，为人非常好。或者他愿意为博德说话？’于是牧师被传召到天上，他的身体就留在教堂的讲台地面。当博德看到这牧师，就是他经常羞辱的，他想自己完蛋了。可是那牧师却说，‘天父，我们中间谁更好？是你还是我？如果我比你更好，请你从宝座下来，由我取代，因为我每天都让博德向我吐口水，一点也不难。如果我能原谅他，你不能吗？’

“‘我的第二个请求是，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架，虽然在我们不幸的罗马尼亚，我们可能为同一件罪行重复受罚，但如果您叫博德为他的罪再次受苦，却不正确，耶稣不是已经代他受罚了吗？’

“‘第三，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他去了天堂，与您何损？如果天堂太小。你可以加大它。如果您不想在善良的人中引入邪恶，那就为这些迷失的灵魂创造另一个天堂吧！也给他们一点幸福。’

“他的论点很得神的喜悦，于是神立即向博德喊道：‘现在去天堂吧。’财主赶紧走了。神转向牧师说：‘你在这里呆一会儿，和我谈谈。’

“‘谢谢你，’牧师说，‘但是我还没有进行晨祷，大家都在等着我。我必须回去告诉人提防罪恶。但我也会告诉他们，你已经履行了你的任务，真的宽恕了我们所有人，包括最糟的。如果你开始根据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我们一个也难逃。’”

牢房里默默地听着这个故事。“那么，”波佩问，“你会在上帝面前为斯大林辩护吗？”

“谁知道斯大林是否没有为他的罪孽哭泣呢？”我说。“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犯下的罪行越严重，他所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少。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屠杀了数百万，像斯大林，杀了千万，包括自己的战友——这样的人都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判他们。”

波佩上校说：“我在这个牢房里从你那里听到了很多基督教教义，但这是最好的——也是最难行的。”

在一九五六年春天，一些燕子在牢房屋顶靠近窗户的高处筑巢。有一天，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宣布鸡蛋已经孵化了。一个囚犯站在另一个囚犯的肩膀上，向鸟巢里张望。“有四只，”他喊道。鸟爸妈似乎从未休息过。它们转移了我们的思路。我们不再猜测自己的释放日，转而去计算这对父母鸟进出巢穴喂雏的次数——每天 250 次！一位老乡人说：“小鸟在第二十天就会飞了。”其他人都笑了。“你们且等着看，”他说。第二十天什么也没发生。在第二十天，幼鸟们在叽叽喳喳的叫声和扑腾的声音中飞走了。我们都很高兴。

“上帝已经算定小鸟的日子。祂也安排了我们的行程！”我说。“祂也已经为我们的每一项遭遇作了妥当的安排！”

几周过去了，谴责斯大林的声音果然带来另一次“解冻”。我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但许多囚犯却真的获释放了。我会不会也成为幸运儿之一？但想到这个，我只感到悲伤：当局如果现在放我走，有什么用？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几乎记不起父亲了。莎宾娜也习惯了她的独立生活。我们的教会肯定已经有别的牧者，就是一些比较不惹麻烦的牧者。

一天清早，一声呼叫打断了我的思绪：“上庭审讯！马上去！”

又必须面对欺凌、恐怖和许多问话了。这些问话都必须给与适当的错误答案！我开始收拾东西，狱卒大声喊道：“快点，快点，车在等着。”我和他匆匆穿过走廊，穿过院子。我们爬上台阶，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钢门。然后我就到了监狱的高墙之外。

我看不见汽车，只有一个书记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拿了看。这是一份法庭的指令，宣布根据1956年6月12日的特赦，我获得了自由。

我呆呆地看着它，说道：“可我只服了八年半，我的刑期是二十年。”

“你得立刻离开。这来自最高法院。”

“我还有将近十二年的服役时间。”

“别争论。出去。”

“但是看看我。”我的破烂衬衫沾满了灰尘，成了灰色。我的裤子上钉满了不同颜色的补丁。我的靴子好像是从卓别林那里借来的。“第一个遇见我的警察就会把我逮捕了。”

“这里没有你的衣服。快走。”

书记转身返回监狱。大门呼然关上，里面上扣了。监狱围墙外看不到一个人影。我终于独自一人，置身于一个空荡荡的夏日世界里。温暖的六月天如此安静，我能听到昆虫的嗡嗡声。一条长长的白色道路在令人惊叹的深绿色树下延伸。在栗树林的树荫下，奶牛正在吃草。多么安静啊。

我大声喊道，以便守卫能在墙后听到：“上帝啊，帮助我不要因为获得自由而高兴！你和我同在监狱，也一样值得高兴！”

从吉拉瓦到布城有三英里。我背起行囊，开始行这条田野之路。那行囊只是一堆发臭的破布，但在监狱，它们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从未想过抛弃它们。很快我就离开了路面，走在深深的草丛中，摸着沿途树木的粗糙树皮。有时我停下来凝视一朵花或一片含苞待放的叶子。有两个人影向我走来，是一对乡村老夫妇。他们拦住我，好奇地问：“你是从哪里出来的？”他指向监狱。于是就随即拿出了一枚列伊（leu），一种价值一便士左右的硬币，给了我。我看着手上的硬币，不禁笑了起来。以前没有人给过我一枚列伊。

“把你的地址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还钱给你。”我说。

“不，不。您只收下。”

他催促我，用“您”，就像人们对待孩子和乞丐一样。

我继续提着包裹行走。另一个女人挡住了我。“你是那里出来的？（她又指向监狱）”她希望得到几个月前被捕的吉拉瓦镇牧师的新闻。我没有见过他，但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牧师。我们坐在路边的墙上聊天。我很高兴遇到一个想谈及基督的人。当我上路时，她也拿出了一枚列伊：“车费。”

“但我已经有一枚列伊了。”

“那就看在我们主的份上，收下它吧。”

我继续往前走，到了市郊的一个车站。人们围在我周围，他们一看便晓得我从哪里来。他们询问了兄弟、父亲、堂兄弟姐妹，几乎每个人都有亲友入狱。当我登上公车时，他们不让我付钱。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在罗马尼亚，被释放的囚犯绝不会被人遗弃，而是备受尊敬的。我膝盖上放着包袱坐着，车刚启动，就有人在外面喊道：“停车！停！”我的心都快停止了。公车猛然停下，前面有一个民兵的摩托车挡路。肯定出了差错，他是来抓我回去的。但是公车司机却回头喊道：“他说有人站在车门的梯级上。”

我坐在一位女士旁边，她提着一大篮新鲜草莓。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些草莓。

“今年你还没有吃过草莓吗？”她问。

“八年没有吃过了，”我回答道。

她说，“快拿一些，”然后把成熟的草莓装满我的手。我像个孩子一样，饥肠辘辘地把它们吞了下去。

最后，我到达了自己的前门，犹豫了一会儿。他们没有料到我会回来，而我又脏又破，看上去很可怕。然后我打开了门。大厅里有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盯着我好一会儿，然后喊道：“爸爸！”那是我的儿子米海。我九岁时离开了他：现在他十八岁了。

然后莎宾娜从厨房跑来。她那精致的脸庞消瘦了一些，但头髮依然是黑色的；我想：“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我的眼睛模糊了。当她用双臂搂住我时，我努力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不要以为我只是从痛苦走向幸福。我是从与监狱与主同在，过来家中与主同在。两样都好。”后来，我轻声唱了一首多年前在监狱里为她创作的小歌。

不久米海过来说外面挤满访客，他们都说，除非看到我，不然就不走。我们教会的成员一直在给布城各地打电话；门铃响个不停。老朋友带来了新朋友。见过我的人都必须离开，以便给新人站立的地方。每次我被介绍给一位女士时，我都必须穿着那条用绳子拉着的可笑裤子，起立鞠躬。当所有人离开后，已近午夜，莎宾娜催我吃点东西，但我不觉饥饿。我说：“今天我们已经足够幸福了。让我们把明天定为感恩的禁食日，晚饭前先吃圣餐吧。”

我转向米海。在不久前到我家来访的三客人，其中一位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之前未见过他）。该晚他告诉我说，是我的儿子带领他们信主的。我却还担心，没有了父母陪伴，恐怕米海会迷失方向！我找不到言语来形容我的快乐。

米海说道：“父亲，您经历了这么多，我想知道您从这些痛苦中学到什么。”

我用手臂搂着他说：“米海，我几乎已经忘了圣经。但有四件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有

神。第二，基督是救主。第三，有永生。第四，爱就是最好的道路。”

儿子说：“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后来他告诉我，他也决定成为一名牧师。

那天晚上，我躺在干净柔软的床上，一夜没睡。我坐起来，打开圣经。我想打开《但以理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但我却不能翻到那卷书。因为我的目光被圣约翰书信中的一句话所吸引：“我最喜乐的莫过于听到我的孩子们遵行真理。”我正是有这种喜乐。我走进儿子的房间，让自己确信他真的在那里。在监狱里，我经常梦见这样的情景，结果总是在牢房里醒来。

过了两周我才可以正常睡觉。那时我已经在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那是阳光最充足的病房。作为一名前囚犯，每个人都想帮助我——不论是街上、店里，到处都是——访客又开始涌来医院了。

第六章

现在我自由了，我内心深处渴望安静和休息。但共产主义正在各地破坏教会。我渴望的平静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它也危害我的灵魂。

我又回到贫困的家中，但比许多人幸运。由于妻子不肯与我离婚，当局就不给她任何工作岗位。她必须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靠缝制女式长袜并靠朋友善意的施舍。她说，如果没有米海，他们几乎活不了。

十三岁时，米海获准探望在运河上被强迫劳动三年的母亲。失去双亲，靠救济生活，他感到痛苦。“我借钱去奴役营，”他告诉我。“我们会见时，相隔遥远。母亲穿着囚服，又脏又瘦。她半哭了，必须大声喊才能让我听到。她说：“米海，信耶稣，向神忠心。”我回答说：“妈妈，如果您在这种地方，仍然相信，那么我也肯定相信。”

当我太太获释回家时，发现米海已经成了一名钢琴调音师：他的听觉非常好，从十一岁就能够独立调音。很快他就赚到了足够的钱来帮助母亲并供自己上学。生活虽苦，但至少还有饭吃。

米海与党的矛盾很早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成了模范生，可以佩戴红色领带。但他拒绝佩戴，因为这种红领带是“压迫者的象征”。学校就把他开除。但当事情平息后，校方又悄悄重新接纳他。他的老师只是给党方作口头的服务。十四岁时，他再次被开除，因为他说他自己读过《圣经》，又说教科书中对宗教的攻击是错误的。于是他唯有尝试在夜校继续学业。

米海是一名基督徒，不爱共产主义。但一只住在乌鸦家族附近的歌鸟，最终也会走调。米海在学校与外边，听到的几乎都是党的声音。我出狱回来的第二天，就必需纠正他说，他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正在挨饿，是一大错误。他和同伴们还以为这是真的。一个女孩告诉我，她在学校为美国数百万挨饿的孩子哭泣。

即使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也感到困惑和迷失方向。他们不仅读不到伟大的基督徒作家的著作，也买不到柏拉图、康德、叔本华（Schopenhuaer）和爱因斯坦等思想家的作品。米海的朋友们说，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的是一套，他们的教授们告诉他们的又是另一套，他们就常寻求我的意见。

克卢日大学（Cluj university）的一位年轻神学生在写论文《路德教会礼拜歌曲的历史》。他寻求我帮助。我建议他先改变论文的题目。我们不该思想历史琐事，因为明天他们就可能会因为信仰而面对死亡。

“那我该学什么？”他问道。

“如何乐意牺牲和殉难，”我回答。

我告诉他一些我在监狱里亲眼所见的事。很快的，他就带着他的朋友们来听。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其中一人说：

“我们的神学教授说，上帝给人三个启示：第一是摩西，第二是基督，第三是马克思。”

“你的牧师对此有何看法？”

“他讲得越多，似乎说的就越少。”

我们会谈的结果，是我到克卢日的大教堂去传道。学生们想读我的书，但我所有的作品都被禁了。在我去之前，我想起一个承诺。在监狱中我曾答应上主之军（类似救世军的基督教派）的一人，说可以尝试会见党方的关键人物查士丁主教

(Patriarch Justinian)。我想他可能帮助这一派基督徒免受当局格外的打压。查士丁对教会已经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他仍然能做一些好事。

我在他教廷后面的空地上会见他。也许他选择在花园里见我，是因为那里没有窃听器，也远离偷听的职员。我说：“你是教长，我可以想象你的重大责任。人们来找你要求职位或养老金，你还必须到处讲道或唱歌——所以我想我该给你唱一首歌。这是上主之军的歌；是我在监狱学到的。”我唱了这首歌，并请他为这些善良而简单的人做点事情：“他们不能仅仅因为属于某个教派就永远坐牢。”他同意尝试，我们聊了好久。

我试图呼唤他归回上帝，说：“即使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也称犹大为‘朋友’。祂为犹大打开了拯救之路。”我想播下一颗种子，给他的心得以改变。他静静地听着，甚至可以说的谦卑的聆听。但他说他无力援护教会，因为党方安排了雅西(Iasi)的主教莫伊(Justin Moisescu)作为他的左右手。如果他走得太远，或者辞职，莫伊就会取代他成为教长，情况就更糟。查士丁对我一直保持着某种尊重。尽管他分裂的心不喜欢他的手所做的事，但他的举棋不定，最终总是屈服党的要求。

后来我听说他在圣公大会中提出了“上主之军”的事，遭到了莫伊主教的反对。莫伊已经成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东正教代表。接下来，查士丁又被宗教事务部的谴责，说不该接待我。

这肯定是他的秘书向党方作了报告（查士丁自己也必须向党报告他秘书的举动。）他曾同意会见上主之军的代表，但当他们到达时，他却粗鲁地拒绝了他们。“是魏恩波叫你们来吗？这是他该回到监狱的时候了！”

2

我答应在罗马尼亚古老的大学城发表一系列演讲的消息，马上有人报告当局，并说我的真实意图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煽动学生。在这起案件中，热心的告密者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当面告诉我，他做了什么。

这并不奇怪。获释后，我见过许多神父、牧师，甚至主教，向党方（异教部）投报。通常，这些报告只涉及他们自己的会众，而这些神职人员会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他们会说，他们的告密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教堂免于关闭。每个城镇都有来自异教部的秘密警察代表，他们定期向神父们询问其会众的行为；除了政治之外，这些警方人员还想知道哪些教区成员经常领受圣餐，哪些教友努力宣教？人们在认罪求恩时，承认了甚么罪？拒绝回答此类问题的牧师神父就被当局解雇。如果没有合适的代替者，党方就关闭该所教

堂。因此目前罗马尼亚有四种牧者：已经在监狱里的；在压力下举报并试图隐瞒一些事情的；那些完全按照指示行事的；以及那些过分热心为党效劳，超出党的要求的。

不全心与党方合作的官方牧师（第二类）是罕见的。他们很快就会失去传教执照。叛徒（第三，第四类）就得以升官发财。我那位的浸信会同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警告立即得到了一位名叫鲁戈（Rugojanu）的官方间谍的跟进。

共党异教部的员工，也有冷热之分。一些员工偷懒，另一些则利用权力向神职人员索取“保护费”，但鲁戈却是一名狂热分子，他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不绝地嗅出“反革命分子”。他决定亲自来听我的讲座。

在去克卢（Cluj）的路上，我想，如果我不要我的讲道执照突然被取消，就必需使用的策略。我决定先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进行比较。我在非常尊重共产政权的情况下慢慢述说。学生们可以看到我的真正含义，而告密者却无法指控，因为缺乏明显的证据。

在克卢的第一晚，有五十名学生来听。由于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在神学的阅读清单上总是排名首榜，所以我首先处理这理论。我说，新罗马尼亚先进的社会主义，拒绝一切卑鄙的资本主义思想，唯独英国资产阶级达尔文爵士却是个例外，

不是很奇怪吗？达尔文有没有排斥基督教？没有呀！他倒将自己的许多财产都捐给宣教事工。

鲁戈在长凳上弓着背，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便正视他，继续说：“一位医生的儿子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作曲家的儿子希望成为音乐家，画家的儿子想作画家。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你就会努力变得像上帝一样；如果你相信自己来自猿类，那么你就有可能变成野兽。”

我从星期一开始上课。在周二，观众人数增加了一倍。到了周末，一千多张脸抬头看着我；几乎是整所大学。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渴望听到真理，但却害怕接受真理的后果，所以我告诉他们一位牧师给我的建议，这位牧师为信仰而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中。他曾说：

“当你把自己的身体献给那些殴打和嘲笑你的人时，你就是将自己献给了神，如同献祭。耶稣知道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日子临近了，就说：‘我的时候到了。’祂的时候是受苦的时候，这是祂从天父那里得到的嘱咐。为救人而受苦就是祂的喜乐。我们也该把苦难视为上帝给我们的一项使命。圣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我的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怜悯恳求你们，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12：1）”

当我望向沉默的年轻会众时，我感到仿佛回到了战争期间的布城教堂。那时铁卫队带着枪，在

一个主日崇拜时，静悄悄地潜进教堂。如今在这大教堂，我们也受到同样的威胁。

我继续说：“不要被苦难的突然来到，叫你措手不及。经常默想它。让基督和他圣徒的性格变成你的性格。我所说的那位殉道的牧师给了我一份止痛茶方。他说：

“初期教会有一位医生，被皇帝监禁。几年后，他的家人终于获准探望他，起初他们见到他，就开始哭泣。他的衣服已经是破布，食物是每天一片面包和一杯水。然后他的妻子开始惊讶，问道：“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就如是初婚的日子？”医生微笑回答，他找到了一种能根治一切烦恼的《七味茶》。

“第一草药是知足：满意自己所拥有的。当我啃着面包皮，穿着破衣瑟瑟发抖时，我就想到，如果皇帝把我赤身扔进地牢，又不给我一点食物，岂不更糟？

“第二药草是常识。不论我欢喜或忧愁，我还是在监狱中，于是何必忧愁？

“第三是记得过去的罪。试试计算它的数量。如果每一项都需要罚一天，那么我该呆在监狱多少个人生？于是你便晓得自己捡了便宜。

“第四是想到基督乐意为我们承受的痛苦。如果地球上唯一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人，

选择了痛苦，那么祂一定是看到了痛苦的巨大好处。我们开始留意到，当我们安静与喜乐地承受痛苦时，它的确能救人。

“第五种药草，是认识到苦难来自天父。它可以净化我们，叫我们适合进天堂。

“第六是，我们认识到任何肉体的痛苦都不会伤害我们。如果肉体的快乐就是一切，那么痛苦和监狱就会毁灭一个人；但如果生活之目的是真理，那么监狱就毫无能力摧毁它。监狱不能阻止我爱他人；铁棍不能把我的信念从我心中打出去。如果我的生活是真理组成的，那么我就能在任何地方都平安喜乐了。

“最后一剂药草是希望。生命之轮不断转动。它曾使皇帝的一位厨师入狱，但它后来可能会带同一个厨师复位，重返皇宫。它也可能叫一个囚犯作王，或作王之父（如旧约的约瑟。）”

我停顿了一下。拥挤的教堂里一片寂静。

“从那时开始，我就喝了好多桶这种茶，”我说，“我发现这茶真的不错，推荐大家使用。”

我说完后，鲁戈就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大教堂。我从讲坛上走下来，观众围在我周围。在外面，学生们鼓掌、欢呼，并试图握住我的手

。我给莎宾娜打了电话，她同意我的做法，尽管她也知道随后的报复。

第二天，我的主教召见我。他告诉我鲁戈在制造麻烦。在他还讲述时，鲁戈本人大步踏进房间。

“啊，是你！”他喊道。“你还想找什么借口？好一大堆煽动话！我把每个字都记下来了！”

我问他什么使他特别不高兴。他说是我谈及的每一件事，尤其是那道茶。

“但是我的那道可怜茶出了什么问题呀？”我问，“你是不喜欢其中的哪一种药草？”

“你告诉他们生命的巨轮总是在转动。但在共产革命成功后，轮子就不再转动了！朋友！共产主义将永远长存。”仇恨把他的脸也扭曲了。

“我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我回答道，“我只是说，生命之轮不断转动。比如，我曾在监狱，现在我自由了。我曾生病，现在好多了。我曾失去教区，现在又有了……”

“不，不，你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将会垮台，他们都知道这一点。”

鲁戈召集教会领袖到克卢城的主教宫来会议。他谴责我攻击政府，毒害年轻人的思想。“你们可以肯定他再也不能讲道了，”鲁戈喊道，他使自己大大发怒。最后他喊道：“魏恩波完蛋了，魏恩波完蛋了，魏恩波完蛋了！”他拿起外套和帽子，大步走出大楼。

距离门一百码远的地方，一辆汽车为了避开一只狗，突然转向，飞向人行道，将鲁戈撞到墙上，把他整个人压扁。他当场就死了。

鲁戈的故事传遍了全国。在那些日子，上帝常显现出祂的奇事。

当局吊销了我的牧师执照，但却不能阻止我传教。只是如今我必须秘密工作。监狱里的老朋友来访，寻求建议和帮助。这里便隐藏一种危机。因为其中有些其实是在试图煽动我发表反共言论——他们已经变成了告密者。这些不幸的人对获释抱有过高的期望。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庭破裂后，他们就转而追求性快感，徒劳试图抓住自己失去的青春。这通常会超出他们的财力；而赚钱的捷径就是向党方提供信息。于是他们出狱的自由，比入狱更不好了。

最能帮助我们防范告密者的方法，是秘警的警告。我们有好些信徒在秘警部门任职。有一对夫妇，白天在党方宣传部工作，晚上和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不止一次在一位外出度假的秘密警察头目家里见面，因为他的女佣就是我们的姐妹。有时我们也聚集在地下室、阁楼、公寓、乡间别墅。我们的仪式和一千九百年前第一批基督徒一样简单而美好。我们大声唱歌。如果有邻居问起，就答是庆祝生日。一个小家庭可以每年有三十五个生日。有时我们露天聚会。天空是我们的大教堂；鸟儿为我们提供音乐，花香是我们焚香，星

星为我们烛光，天使是点灯的侍童，刚刚出狱的烈士的破旧衣服便是最珍贵的牧师袍。

3

当然，我知道我迟早会再次被捕。匈牙利革命后，形势变得更加困难。赫鲁晓夫（Khrushchev）宣布了一项新的七年计划，“消除残余的迷信”。教堂被关闭或改建为共产俱乐部、博物馆、或粮店。那些被党报斥为“黑裘骗子（神父）”的，又被围捕了数千人。

我祈祷说：“上帝，如果你知道有人在监狱需要我，便让我回去。”莎宾娜有时会犹豫一会儿，然后她也说“阿门。”此时，她内心充满++，因为知道我们很快就能更好的事奉基督。我诧异我们对主的母亲在十字架前忧伤的形象，是否正确？她不也因为儿子成为世界的救主而满心喜悦吗？

在一九五九年正月十五日凌晨一时，他们终于来了。我们的家被抄翻了天，搜查至凌晨五时。我儿子在一个移开的橱柜后面发现了一条丢失的皮带。“人们还说秘密警察毫无益处！”他说，“我一直在寻找这条皮带呢！”第二天，他就被禁止进入夜校，校方指责他态度傲慢。

当他们把我带走后，莎宾娜拿起了我的圣经。在一张纸片上，看到我在《希伯来书》中记下的一句话（11:35）：“因着信……有妇人得到自己的死人复活。”我在它下面写道：“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的妇女。”

4

当 我们抵达布城警察总部时，天色还黑，街道上覆盖着冰冷的泥浆。在警卫把我带到牢房之前，又是熟悉的入狱流程。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名叫德拉（Draghici）。他是皮特（Piteshi）监狱可怕的再教育领导人之一。每次牢房门打开，他都会跳起来。几次之后，他说：“对不起，我真的紧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带我出去枪杀。四年前他们已经给我判了死刑。”

德拉告诉我有关他的人生故事。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很崇敬当地的神父，有一天神父说：“你父亲是一位钟表匠——请他修理教堂的钟，给一个便宜的价格。”德拉就说服爸爸免费服务。随后，神父向父亲索取一张 500 列伊的收据，好向教会领取，自己私吞。德拉冷笑着补充道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忠实的教友，并且多年来已经给了教会一大笔钱。”

他的父亲嗜好饮酒，带着家里的积蓄离家出走。后来在他十四岁时，为了穿上漂亮的绿色军服、唱进行曲和女孩们的钦佩，他就加入了铁卫队。几个月后，卫队被推翻，德拉便入狱。在共党掌权后，因为他曾经是一名活跃的法西斯分子（参加卫队），就判他十一年徒刑。服刑七年后，他在皮特监狱听说：“只要殴打其他的囚犯，你就会被释放。”

他告诉我，“当时我二十一岁。我不想呆在监狱里，所以我照所吩咐的去做。我相信他们的诺言，现在我却必须受死刑。”

在我看来，他似乎已经快要死了。他的肺结核已经很严重。“我是该死的，”他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德拉咳嗽、吐血的声音。我想：如果上帝现在召唤我并问：“你在地上生活了五十六年，对人类有何感想？”我会回答：“人是罪人，但其实那罪不全是他们的。撒旦和他的堕落天使正在努力使我们像它们一样糟糕。”

一连十个昼夜我和德拉谈及基督。“你成为罪犯，并不是完全是自愿的。”我说，“但你的罪恶感需要得到解脱。耶稣已经承担了你该受的一切刑罚。在神的国度，一项罪行无需处罚两次！”

第十天晚上，德拉泪流满面地向我认罪了。我们一起祈祷，他的悔恨和恐惧得到了解除。于是，我一直以来对神的祈求，在回狱第一天就得应允。

5

接下来，我被带去布城的天王星监狱（Uranus jail）接受审讯。一名秘密警察少校试图叫我说出，凡我所认识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字。

我告诉他我很乐意这样做，包括本国的和苏联的。我告诉他，苏联内长雅果达（Yagoda）已经杀了数千名反革命人士。最后人们才发现，雅果达本身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以后，他的承继人贝利亚（Beria）又继续追杀了数以千计的反共派，直到党方发现，贝利亚自己才是反共大头目，于是拉去枪毙。我又说，到了最后，人们才晓得，真正的反共第一号人物，就是斯大林，于是赶快把他的遗体从红场挖出来丢掉。于是我建议他，无需从我可怜的小教堂里寻找微小的反共分子。

这官员就吩咐殴打我，把我关在单独狱室。我就待在那里，直到上庭的日子。那审讯也很简单

，只消十分钟就完事。这是有关十年前的案子。这次我的妻子与儿子也来了。

过后狱卒就带我到一所囚室里等待审讯的判决。我正在其中与人谈及基督时，一位官员来报告审讯的结果。我向他道谢，就继续谈论。那判决只是把刑期由二十年改为二十五年（结果我只坐了十四年。不是人说了算。乃是神。）

第七章

我

又被转换监狱。警车里还有其他新判刑的神职人员和我一起。走了一小段路后，我们驶下一个陡峭的坡道，然后停下。我的心也沉了下去。我意识到我们又回到了吉拉瓦潮湿的地下监狱。现场响起了“把他们赶出去”的喊叫。警车的门就打开了。

一群挥舞着警棍的狱卒，驱赶我们沿着通道走。他们已经喝醉酒，一看到是神父，就欢呼雀跃。他们把灰色、肮脏的囚服扔向我们。那些换得慢的人，就被撕破衣服。在一片笑声中，他们剪掉我们的胡须，胡乱剃光我们的头。我们头皮流血，半裸着，被赶进一间大牢房。

我们坐在石地上，在二月的寒冷中挤在一起取暖。几乎同时，一个守卫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大声喊道：“所有牧师神父都出去外面。”我们逃了出去，又被警棍乱打一通。我们尽可能用双臂保护头部。然后我们又被赶了回来。那些摔倒的人都被沉重的靴子猛踢。半个小时后，我们又被叫出去。没人移动，守卫们就冲了进来，胡乱打。他们这样玩弄我们，直到厌倦了。

我尝试安慰同伴们。有一人的牙齿被打掉，嘴唇严重裂开。当我清理他脸上的血迹时，他说：“我是修道院长米隆（Miron Cristescu）”

我们几年前在雅西见过面，当时我在等待会见查士丁大主教。米隆在查士丁的办公室工作，那时我告诉了他我们的麻烦。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弟兄，基督会再来：我们盼望着它”——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该常说的话，但却少有这样说的。我从未忘记过他。但如今他剃光了胡子，光了头，脸上沾满了血迹和污垢，却令人难以辨认。

我们坐着瑟瑟发抖，几个小时过去了。米隆谈到了他和其他人如何试图挽救教会免于成为国家的工具。他们原以为可以激发教长查士丁的善良本性。但德吉显然没有选错人。他安排查士丁到莫斯科访问。此后，查士丁就欣然与党方合作，打压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以及他本身的东正教信徒中，凡拒绝合作的人。

“我不应该妥协，”米隆说，“我应该一开始就抵制。如今我一样落在牢中。”

我试图安慰他，但他举目看着我，回答道：“魏恩波弟兄，我只知道一种悲伤，就是没有成为圣人。”

如果这是在讲坛上说的，那只是一句美丽的词句；但在那可怕的牢房里，经过惨烈的殴打，这话却真有意义。

2

几天后，当我被送往山区去时，米隆也和我一起坐在车队中。几个小时后，盖拉城的监狱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在 1956 年，我曾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月，我妻子曾到这里探访我。这监狱原是玛丽亚女皇（Empress Maria Theresa）统治时期的建筑。从狱室上部的窗，你可以看到那陈旧的绞刑架，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共产党的处决方式是在后脑开枪。我们又看到，监狱的高墙之外，镇上居民的生活。囚犯们凝视着经过的行人，开始冥想。但到了中午，就没人敢再观望。因为那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又喊又笑，互相追逐着回家。每个囚犯都想到自己的家小。

大约一万名囚犯被关进原本可容纳二千人的简陋住所。当局的严厉程度与再教育运动最糟糕的时期一样。去年夏天，盖拉监狱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囚犯们把自己关在侧翼里，抗议当局封闭了窗口，不给他们光线和空气。警卫冲破了门，一场持续的战斗开始了。军队也被召来向囚犯开枪。许多囚犯被杀或受伤。作为处罚，食物被削减到饥馑的程度，数百名囚犯被分散到其他监狱。

我们牧师神父们很快就取代了他们的空缺，还有一大群其他种类的“政治犯”在新一波的逮捕中——地主、军官、医生、店主、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工匠、反对征地的农民。在经历两项灾难性的五年计划后，总理德吉就宣布了一项十六年的计划，该计划将持续到 1975 年——“如果

到那时还有未被逮捕的人，在外头去执行它。”一位犯人说。

这里的牢房是又长又黑暗、有回声的营房，每间都有五十到六十个铺位，但却收容了八十到一百人。于是许多床位必须二人共用，睡眠困难。除了总是必需排队上马桶之外（那只马桶常常满溢，）我们中间还有十几个打呼噜冠军让我们保持清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曲子；如果一人停下，另一个人就会加入合唱。我们白天也不能休息，因为警卫会突然来访，命令我们脸朝下，成排躺在地上。他们在叫名字时，就轮流踩踏各人。

守卫经常敲打窗上的铁栅栏，确保没有被囚犯暗中锉断了。每天早上，我都会帮米隆把马桶搬到下水道去倒空。有一次，他滑倒并差点翻倒马桶时，一名警卫把他打倒在地。“你终须到罗兹萨去（Rozsa Sandor），”他喊道。

后来米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墓地。这是这里常见的威胁。”

罗兹萨是监狱公墓，从窗户可以看到墓碑在长满杂草的场地上。这名称是上个世纪一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杀人犯。那时他才十九岁。他从囚室的铁栏窗，看到花园里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他日复一日地看着她们。有神父来为那小女孩施洗。以后这孩子上学了，再后穿着第一次圣餐的礼服，渐渐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这女孩成了罗兹萨的全部生命；他决定等他自由了，就去娶她。获释的日子终于到了。他急忙跑过马路，发

现一场宴会正在举行——是一场婚宴。呵，这少女竟然想出这样的方式来接待他！他跑到她面前说：“我无法形容我有多高兴，你今天成为我的妻子。”少女惊讶，笑了起来。“这个傻老头到底想说什么？”她问。然后，她握住身边一个年轻人的手，说道：“这是我的新郎。”罗兹萨盯着这对新婚夫妇。然后，他在愤怒和疯狂中从桌子上抓起一把刀，将他们俩刺死。于是他被判死刑，埋在监狱墓地里。那墓地就称为罗兹萨。

“你的结局是罗兹萨。”

这声喊叫每天都提醒我们说，我们老了。囚犯们永远不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就是判刑时的年龄。他们梦想着年轻的妻子或心上人。不是那位等着他们，年华已逝的忧心妇女。

我在盖拉监狱度过了六年，监狱大门上的时钟停了，六年未曾移动一分钟。

3

在盖拉监狱，指挥官是个胖胖的、满面通红的小尼罗皇帝，名叫班图（Dorabantu）的少校。他总是在吃东西。在他的审讯过程中，他的手会在抽屉里翻找什么，然后竟会掏出一条香肠或一条香蕉，开始享用。

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很典型。我正在站立，聆听着他的仇恨长诗。看来班图少校不讨厌的只有两件事：食物和他自己的声音。

“所以，魏恩波，”他喊道，口中喷出许多蛋糕渣，撒满桌面。“一个和尚，嗯。”

我说我是牧师。

“牧师、神父、修道士——都一样。磨砺穷人的脸来充实自己的巢穴。我知道！”他一边滑稽地挥舞着手臂，一边讲述着自己童年的可怜故事。他在罗马尼亚一所最富有的修道院附牧养父亲的羊。当羊儿误入教堂的土地时，僧侣们就残酷地殴打他。

“你见过神父用双管猎枪向饥饿的孩子开枪吗，魏恩波？好一幅神圣的画面。”

班图还抱怨说，他后来在工厂劳作时，也被剥削。如今他正要回报神职人员和资本家。

最轻微的失守规则就得到二十五鞭，并有一名医生站在旁边——因为有人在鞭打下死亡。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某种原因挨了二十五鞭。

我牢房关押的是政治犯，但却也掺有一些杀人犯和小偷。谋杀是刑事犯。但谋杀俄罗斯人或犹太人，就算为政治犯，因为这“显然是针对共产主义。”偷窃是在西方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但在这里，它就被解读为“破坏经济”，既是破坏共产国家的经济，也是针对共产主义，于是当然属于政治犯。这些刑事犯们都是愤怒的人。他们也

是最反对我谈及宗教的。那些杀害犹太人的，尤其恨我，因我是犹太人。我从不隐瞒自己是犹太人，当有人问及时，我就表达对本族人的爱。至于我信基督教，那是我个人的选择。一次我与一人小声谈福音时，其他人就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威胁性的圈子。

领头的人咆哮道：“我们叫你安静。”我站了起来，有人推了我。另一个人向我使劲一脚，我仰面着地。我感到肋骨猛烈被一踢。但当这群人开始殴打时，一声警告响起。一名警卫看到了这场挣扎，正在呼叫其他狱卒。人群散开。当牢房门打开时，每个囚犯都在自己的铺位上。

司令官当时正在走廊徘徊，就走过来。狱卒认出我是被打的人，因为我长得最高，但他无法在半黑暗中认出袭击者。

“是谁干的，魏恩波？”

我捂着受伤的嘴唇，说我不能告诉他。

“为什么不？”

“因为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爱并原谅我的敌人，所以我不能通报他们。”

“你是个白痴，”班图厉声说道。

“当然，你说得对。凡不是从心底爱基督的，都是白痴。”

“什么？”指挥官怒吼，“你骂我白痴？”

“我没那么说。我说，我自己未曾达标。”

班图用手掌拍打额头，说，“把他带走。三十鞭。”

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咆哮道：“疯狂的和尚。”

鞭打使我的后背如同在火炉里烤一样。这鞭打对神经系统的冲击使我颤抖了好几天。当我回到牢房时，看守仍在审问囚犯。由于没有人回答，因此无人受罚。但自从那事之后，每次我讲道，就少有人干扰了。

4

监狱的争吵有时令人好笑，但当事人绝不以为可笑。其中一种发生在每一间囚室，就是开窗问题。靠近窗口的人，要晚上关上；远离的就要窗口开着。夜里开窗，外面的寒风就叫我们躺在床上冻僵。关着窗，我们都因为空气浑浊而头痛。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议会，会对这个话题进行如此详尽的辩论。要开的人说：“新鲜空气不会伤害任何人。”要关的回答：“每天都有数百万人死于肺炎。”

这让我想起了列宁的公理。“如果强大的物质利益决定二乘二应该不是四，那么它们就不该写成四。”我们经常在监狱里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出去运、动时，警卫们感到无聊。“时间到了

，大家都进去吧！”他们喊道。我们抱怨道：“我们才刚来十五分钟！”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身利益甚至决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

普通罪犯很快就在狱室安定下来，他们在这里几乎和在外面一样自在。他们有自己的惯例，优先顺序，俚语。在走私食物残渣方面，他们最拿手。他们给每一位警卫一种绰号，并试图向守卫索求香烟。他们垄断轻松工作，把肮脏的留给政治犯和真诚的基督徒。（于是我们又有一种服侍神与人的大好机会。这种机会是生活中随时可见的，只是大多数基督徒试图避免，就如愚笨孩子避免爸爸给的好功课一般。）

这些刑事犯之间，唯一的争吵就是关于物质享受。

牢房里不乏欢笑。使徒行传把“喜乐”称为上帝存在的见证。不然如何解释监狱里的欢乐？

有些人也能笑自己的痛苦。布雷少校（Braileanu）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身材矮小、精神抖擞的前军官。他的蓬乱头髮，就如小孩子一般。他给牢房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谣言，说另一次峰会将于1959年春天举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Gromyko）将和西方代表参加。据说会议定于5月10日。于是囚犯们采用了新的问候方式；他们举起十根手指，表示肯定释放的好日子。

在会议当天，警卫真的打开了牢房门，叫出四人，包括布雷少校。我们羡慕地看着他们。但很快我们就听到了从通道尽头传来痛苦的呻吟，那是鞭打的地方。三人遭打而惨叫；但当轮到第四个时，却是没有呼叫声。我们只听到二十五次的鞭声。布雷跟其他人回到牢房时，脸色苍白，无法说话。过了好一阵子后，他才站了起来。“众位男士，”他说，“我给你们新的敬礼！”他举起右手的两根手指，然后是左手的五根手指，表示二十五鞭。

在我们中间，讲故事和出谜语可以长达数小时。每个人都必须贡献一个。

加斯顿牧师，一位三十五岁、脸色苍白的一神派（Unitarian），给了一个谜语：“一个人和他的太太夏娃一同乘搭火车。他们的屋子是红色的。那人叫甚么名字？”所有的人都惊奇，如果那人乘搭火车，太太名叫夏娃，住屋是红色的，那与他的名字有何关系？加斯顿说，“答案是查理。”

“但你如何知道？”

“我认识他多年了，他是我的最好朋友。”加斯顿回答。

米隆院长说了一个他发誓是真实的故事。一次本狱的司令沿着囚犯的队伍，慢慢步行。他依次问每人同样的问题：“你犯了什么罪？”

“什么也没做，长官，但却要服刑十年。”

班图继续向前走。“那你呢？”

“也没做什么，司令官，但被罚二十年。”

“说谎的猪。”班图愤怒地说。“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没有人会白得十年监禁的！”

但靠机智谋生的小偷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一位名叫弗洛（Florescu）的小偷讲述了他在布城的一次作业。那时他正在抢劫一家犹太区的珠宝店：

赫科（Hershcovici）先生是最会接待客人的店主，那天他正在自己的珠宝店里，接待一对打扮高贵的青年夫妇。“早安，”那男士说，当然，他就是弗洛。“这是我的未婚妻，布城第一美女。”他们闲聊起来。那男士说，他未婚妻也是本城第一富女。“我们是来选戒指的——当然，必须是钻石戒指。。。哦不，那些太小了。”他们从戒指开始，转到新娘母亲的宝石手表，新娘父亲的鳄鱼皮套服，然后那少女插咀道：“哦，亲爱的，我们不能忘记主教。他是我的叔叔，所以他不会接受婚礼费用。可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天堂是不接受白送之服务的。”

“但是，我们应该给主教什么礼物呢？”这时，他俩的目光转向了一个陈列柜，摆着一套完整的镀金主教长袍。“正是这样的东西，”弗洛喊道。

“但是，亲爱的，”那位少女说，“我们不知道那套衣服是否适合叔叔的身材。”弗洛上下打量着店主。

“赫科先生的身材，正与主教相当。”店主还没反应过来，这对夫妇就给他穿上了那套金色的长袍，将腰带系上，又给他戴了一顶闪闪发光的主教法冠。“完美契合！”弗洛说：“再拿着这根权杖。”

这对夫妻随即把桌上的珠宝都扔进鳄鱼皮包里，跑出了商店。赫科震惊得瘫痪了。他拼命跟在后面追，尖叫着：“小偷！挡住他们！救命呀！”所有的犹太商都跑到门口，看到赫科穿着东正教长的全套服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跳着走。

“赫科疯了，”他们喊道。有三人把他按倒在地上。“你们在做甚么？盗贼逃跑了。”真的，小偷已经转入小巷，不见踪影了。

当笑声平息后，加斯顿牧师问：“但他们最后不是抓住你了吗？”那小偷却不再解释。他反问：“那么你又怎样来到这儿？”

“为甚么不能说呢？”加斯顿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因在圣诞节讲述神圣家族下埃及，就判七年徒刑。”

“我会众中的一名间谍指控我，说我进行煽动性的讲道。在我的审判中，检察官说我攻击我国当局。那间谍告诉法庭说，我将希律王的屠杀婴孩，比作共产党打压宗教。

加斯顿后来问审讯员，开除他的真正原因。

“我做错了甚么？我尽力帮助劳动人士，开办学校，又开一家合作社。我的教堂总是挤满了人。”

“那位官员大笑说，我们想要的神父，是像你隔壁教区的神父：一个老酒鬼，他的教堂总是空荡荡的。”

后来，加斯顿对我说，“我小时贫困，因为饥饿而偷窃。有一次我企图偷鸡，警察押着我在村子里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小偷的牌子。”

“后来我成为一位希腊天主教的神父。当共产上台后，警察来我的家搜查，发现了一本阿德勒（Adler）的个人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

“呀，又是《个人主义》，于是把那本书带去作罪证。”

5

几个月后，当我擦洗我们大牢房的地板时，看守带来了一名新囚犯，命他一同洗刷。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友波普教授。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已经显得暗淡无光。他看来正在害病，

而且显得衰老多了。自从 1956 年特赦初期以来，我们就没有见过面。我的信件也没有回音。现在波普解释了原因。“监狱生活其实对我更好。它就如逆风，使海鸟高飞。可是在外面的顺境中，我就下跌了。过去我们在奥克纳监狱里的生存斗争是那么真实又有意义。但释放之后，外面的生活就如一场骗局……我不知道是甚么占据了我。”

像许多其他囚犯一样，一旦恢复自由，他就开始追求快乐。奇怪的是，那些勇敢地忍受了可怕痛苦的人怎么会跌倒的？他们在获释之后，就败坏了。

波普说：“我离开了妻子。经过监狱的艰苦生活后，我似乎无法控制自己。我渴望食物、美酒、女人。我非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青春，就试图证明自己还年轻，于是大大花费，饮酒过度。于是不可避免地入不敷出，只能撒谎和欺骗。”

当他尴尬地停顿时，我说我希望他没有忘记基督。波普笑了一声，把一块脏布拧进桶里。“当时如果我见到你也好——但我正在罗马尼亚的另一端。我希望能解除心中的罪恶感，去找最近的牧师，告诉他一切，又说这是共产监狱的后果。他详细听完后，就向党方报告。于是我就获得十二年。”

我们擦洗到了房间的尽头。洗好了，就站在那里等待室长的批准，他也是囚犯之一，负责看守我们的工作。当他走了过来，故意一脚踢翻了脏

水桶。“再去洗！”他说。当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擦洗时，他又来，再踢翻水桶。最后，他才让警卫亲自来检查。那警卫的鞋子带着泥垢，他喊道：“这是甚么？”然后打了室长的脸。警卫一离开房间，室长就对我们拳打脚踢。波普十分愤怒。我警告他，这是这里的惯例。“如你所知，没有比被压迫者更糟糕的压迫者了，”我说。“这都是系统的一部分。”

为了分散波普对自己困境的关注，我就向他讲述了加斯顿的事，并在午餐时给他介绍这位神父。但这却是一个失着。加斯顿脸上闪过一丝震惊，波普则猛地转过身去。“我们以前见过。”他简短地说。

加斯顿很快就走开了。波普和我白天剩下的时间都在打扫庭院。要想达到令指挥官满意的效果，只能用一块三角形的玻璃刮擦每块砖：这是一种守卫不太看好的行为。波普对我说，他无法挨过这次的十二年，他的肺结核急促恶化。我试图通过谈论未来的生活来鼓励他，他静静地听着。但他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已经烧毁了。第二天，当警卫侮辱他时，他就开口辱骂党。警卫野蛮的殴打他，以致他失去知觉。他被抬到监狱医院。次日我们听说他已经死了。

其实波普在第二次下狱不久，在狱外的家人们已经为他举行了他的“公葬礼。”这种做法是不

久前才出现的。波普的判决宣布后，当局就召集他的家人、朋友和大学同事，为他举行公开的埋葬仪式。党方告诉“哀悼者们”说：“这反革命分子永远死了。任何人都不得探望他或他的家人，或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家，或在街上迎接他的。”波普的大女儿带头进行了谴责。如果她拒绝，她就会丢掉工作，也无法抚养孩子。波普的学生和同事教授们就效仿她的做法，进一步诽谤波普的名字。

6

波普的悲剧令我们十分忧郁。米隆为死者祈祷，加斯顿则坐在床铺边缘，双手捂住耳朵，仿佛要把世界拒之门外。

我坐在他旁边，因为我想不该让他这样孤立，就向其他人谈及永生，给众人宽心，但加斯顿却不接受。他愤怒地站起来，说道：“作为一神论者（希腊天主教又名“一神论”），我无法相信一个人死后还存在。”

我回答说：“但我不是在跟先进的一神论者说话；我现在是对你说话。我们不必总是自称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或更正教徒，或罗马尼亚人。。。让我们有勇气做我们自己！”

还有几个囚犯过来加入我们，所以我继续说：“人格（一个人的心意和喜好）是神给人的最大礼物，因为只有人格能长久存留。我们在身体每年更都完全更换了身体的细胞，包括骨头。我体内的氧原子和氢原子其实也与其他人的原子相同，也与外面的自来水（H₂O）的原子一样。我身体的热量和你的热量也是同类，只是数量大小不同而已。只有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我的意志才可以说是我的。你怎能相信这非物质的东西也会与身体一同毁灭？”

弗洛拉出了一张凳子，挑衅地说：“我只信我所看到的、尝到的和感觉到的。我们都像我坐的这张板凳一样，当我们死了，一切都完结了。”

我突然把他身下的凳子踢出一脚，凳子飞出去，弗洛跌坐在地上。他愤怒地爬了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温和地回答：“我没有听到凳子抱怨——你却说你 and 凳子相同？”

这次连加斯顿也笑了，我继续说：“对不起，弗洛；我只是想证明，物质既不会爱或恨。但我们却会。”

弗洛没有生闷气太久。很快他就说，如果死者能回来和我们说话，那么他可能会相信人果然有另一种生命（死后的生命）。

“我确信人类与死者有过接触，”我回答道，“从牛顿到奥利弗（Sir Oliver Lodge），许多大科学家都相信灵魂的存在。圣经也说，扫罗王

召唤撒母耳的灵魂。圣经禁止这样做，但说这是可能的。”

弗洛的凳子争议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就开始谈论死后的生命。对我们这不是一个学术话题，却眼前的处境。这里每天都有人死去。

“如果上帝创造我们只为今生，”我说，“祂会先给我们老年的智慧，然后才给我们青春的活力。现在却是相反。祂先给我们青春的活力，却没有智慧。在我们多年劳苦，积累一些经验后，已经是一只脚进入坟墓了。如果死后没有后续，这种经验不是成了白费？路德说我们地上的生活就如胎中的婴儿。他说如果胚胎在子宫里能够推理，它就会问，为何有手脚。它肯定会猜到：必然有另一个世界，一个广大的，可以行走、奔跑和玩耍的世界。不然干嘛有手脚和眼睛？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情形。”

我忘了狱卒，提高了声音向躺在几层床铺上的囚犯宣讲。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继续说道：“假设我告诉你，一个一升的小瓶子里可以容纳十升牛奶。你们就会笑。那么，在一个小脑袋里，怎么能容纳数千年前的洪水故事，又能容纳我太太与孩子的今日事，还有神与魔鬼的事实？一件容器必需无限大，才能容纳无限大的事物。换句话说，这容器必需是灵。只有你不受束缚的灵才能遨游任何时间与空间。你会相信这灵必须受限于这短暂的肉体吗？”

当我谈到这些事情时，囚室里就如教堂一片寂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没有人打哈欠或坐立不安。囚犯们穿着脏衣服，脸颊凹陷，眼睛因饥饿而睁得大大的。他们

就像干渴的土地得到雨水一样。它们领受死后生存的想法。

7

第二天起床前，我醒来时，看到窗外有一个虚弱的身影。原来是加斯顿。我把一条毯子盖在肩上，出去陪同他。他正在透过狱室的栅栏往外看。晨光呈灰白色。院子里雾气缭绕，但我们可以看见大门旁有一排黑色的棺材，里面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囚犯尸体。这是盖拉监狱每天都有的，我自问为什么加斯顿会在这一天起床观看：我便想到死者之一是波普。我试图把加斯顿拉回床，但他一动也不动。

在我们的注视下，一名守卫穿过院子，掀开棺材的盖子，露出里面的阴影。另一个人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钢桩。他举起它，沿着一排尸体依次插入每一具尸体。

警卫正在确保没有生命留下。每次钢铁插下时，加斯顿都浑身发抖，所以我给他盖上毯子，他继续看着棺材被关上并装上卡车，运往罗兹萨。

“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我说。加斯顿没有回答。

一连几天他都保持沉默。他不要人企图了解他内心的痛苦。晚上，他会听别人交换故事；只有一次，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

“当我被逮捕之前，我走进一家餐馆，想吃一顿美食，振奋精神。于是我把大衣挂在角落桌子的炉旁，点了我最喜欢的菜和一瓶好酒。附近的一位顾客一脸担忧地起身，想对我说话，但我挥手示意他走开，“现在不行。”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但我想安静地用餐。”在吃完后，我为自己的不礼貌感到抱歉，也请他告诉我有关于他的麻烦。

“太迟了，”他说。“炉子已经把你的大衣烧了一个洞。”

人们都笑了——加斯顿阴郁的叙述风格比故事本身更让他们感到好笑。当我爬上自己的床铺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闭着。有一次，加斯顿花了几个小时，告诉我们他如何尊崇基督为最伟大的导师，但不是上帝。他又说一神论者信圣经甚么，不信甚么。他们给圣经的重新评估，叫人不再能看见圣经有什么好处了。他说，他们并不过分关心永生。但现在他又开始谈论波普教授了。有什么证据表明我们在那天黎明一起观看的可怕情景后，去世的人还有什么存留？他说，一个男人只需要四样东西，就能生存：食物、温暖、睡眠、女人。

“最后一项可以省去，”他补充道。“我的妻子已经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了。我们的两个孩子住在公立儿童院。”

“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我回答道。“我们住在盖拉，目前活在最低的生活条件。然而每天你都能听到人们的欢笑和歌唱。什么使他们歌唱呀？他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歌唱的；他们的里面有某些东西在歌唱。希腊人称之为 *psyche*，埃及人称之为 *kaa*，希伯来人称之为 *neshama*，我们称之为灵魂，如果你不相信我们有灵魂，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你孩子的成长？几十年后，这一切（学业事业，功绩败绩）对他们都将结束；我们追求宗教、道德或文明，目的是什么？”

加斯顿叹了口气。“我现在无法改变了。我的人生已经给烧坏了，就像那件外套。人们曾经警告我，但太晚了。我在上次刮地板后，私自藏了一块玻璃，打算割腕，但我连这个勇气都没有。”

我说：“自杀只证明灵魂足够强大，也足够独立，可以为自己的原因决定杀死自己的身体。即使你自由了，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还是有可能作同样的决定（自尽）。我理解你失去妻子和孩子的感受；但我感觉到有其他东西正在困扰你，令你无法休息。”

加斯顿沉默。

我继续说道：“我认识一个囚犯，为了给和他一起坐牢的儿子吃多一点面包，他就把自己饿死

了。这就是灵魂的力量。你也拥有内在资源，基督教。它可以给你力量。告诉耶稣你的困境。祂就给你安慰。”

加斯顿在黑暗中说道：“听起来你好像把祂当作是活的，正和我们一起。”

“他当然还活着，”我说，“你没听说过复活吗？明天我就向你证明这个。”

“你怎么这么坚持，”他说，“比共产党还糟糕。”

“比共产党还好！”我回答。在教授去世后，第一次我看到他微笑。

8

第二天晚上，当囚犯们谈话时，我提醒他们复活节即将到来，这是我在盖拉监狱的第二个复活节。

“如果我们有熟鸡蛋，就可以把它们染成红色，然后按照东正教的习俗把它们敲碎，”我说。我像献上复活节彩蛋一样伸出手说：“基督复活了。”

老农民瓦西立刻喊道：“祂真的复活了。”一众声音呼应着传统的回应。我旁边的加斯顿低声说道：“有些人觉得信仰很容易。”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吧，”我说。

我转向其他人，说道，“我们知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复活了呢？”一阵沉默。瓦西扯他浓密的小胡子。“我是一个简单的农民，不识字，但我相信复活，因为我每年都看到大自然是如何复活的。当地上下雪时，很难想象春天田里会结出庄稼。但不久树木就发芽，空气变暖，就像去年、前年、再前年一样。如果世界能够再次活跃起来，我们的救世主也能。”

“一个合理的答案，”米隆说。

加斯顿怀疑地坚持道。“如今，在每个基督徒的主张都受到挑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具体的东西。”

“我同意，”我说，“我们需要最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们确实存在。伟大的罗马帝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称复活是史上最充分证明的事实。你相信传统历史写的是事实吗？”

无人回答。

我问布雷少校：“当您在军事法庭任职时，您是否考虑了证人的性格以及他的言论？”

“当然，”他回答道，“在证据相互矛盾时，证人的品格便是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古典历史学家的性格：他们通常是朝臣，是国王的奉承者，他们写历史是为了利润或取悦他们的金主。他们是出于自身的

利益。于是我们更该信使徒们的文字。众门徒是为行善：就如彼得、保罗、马太、安德烈。这些人都因为宣道而殉道（他们写书写信，对他们是无金钱利益的）。”

少校说：“但令我难以接受的，是经上提及的奇迹，就像用五条鱼喂饱五千人一样。”

“你所说的奇迹是什么？”我问道。“原始部落会惊讶一根小木棒就能着火（火柴）。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告诉中国偏远地区的妇女，在她的国家，车子无需马儿，却能行动。”她就听到那些中国妇女们低声彼此说：“真是个骗子。”

“因此，奇迹只是一种高级生物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耶稣便是这样的一种高级生物。”

加斯顿摇摇头。“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土着可能会接受这个，但一个理性的人却不能接受。”

我说：“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正是合理。不然我们就必须相信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教会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的。”

“教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外在攻击，和教会内部成员们的腐败，却还能生存。想想耶稣，在他的一生，并没有组织教会，没有写书，也没有进行任何计划。他只有少数贫穷的门徒；其中一个还为了钱出卖他，而其余的则在危险时逃跑或否认他。他去世时，在十字架上喊着，为何神会离弃他。他的坟墓又被一块大石头封住。”

“这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加斯顿承认。

我就问：“那么你如何解释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呢？”

“是因为门徒们合力而为吧？”加斯顿疑惑的说。

“但什么给了他们力量，叫他们敢为传教和信仰而死呢？”

“我想他们是克服了恐惧？”

“是的，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第三天基督亲自出现并给了他们勇气。曾被侍女吓到的彼得，如今站在耶路撒冷，宣称他和他的弟兄们看见了基督，并与基督交谈过。耶稣真的复活了。彼得告诉逮捕他的人说，他们最好在他再次否认基督之前杀了他。罗马人就这样行了。”

我又问，“你相信彼得和众门徒，会因为自己编造的谎言而被钉十字架吗？彼得在距离空墓五百码的地方发表了关于复活的第一次布道。他知道这事实是不能反驳的。基督的敌人也没有人试图否认复活的事实。”

“为什么大数（Tarsus）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基督责备他，就马上改变信仰？他不正是基督教的大敌吗？”

“这可能是幻听和幻视，”布雷说。

“不。保罗很知道甚么是幻觉。对于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幻影。他如此迅速地降服，因为作为撒都该人，他知道一大秘密——坟墓是空的。”

当我们谈话时，米隆正在缝补裤子的破洞。他抬起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加斯頓，说：“几年前，我收到了一张纽约兄弟寄来的明信片，他曾登上过帝国大厦的顶层。他并没有先调查地基。那栋大厦已经竖立了四十年，足够证明它的根基牢固。教会也是，它两千多年来一直不倒，你便晓得它的根基如何了。”

我们的讨论对加斯頓产生了影响。渐渐地，他的痛苦减轻了，他的信心也加深了。几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死亡愿望逐渐消失，但我觉得他仍然背负着一个内心的重担。

夏天又来了许多新囚犯。我们被转移到不同的牢房，一年来我没有见到加斯頓。

9

在以后的几个月，我轮流在盖拉监狱的十几个牢房里传道和工作（狱方经常转换犯人）。我经常受到惩罚，正是因为其中一次的惩罚，我再次遇到了加斯頓。

当时我正在和一个朋友下棋。我们用面包片作为棋子。这时班图指挥官突然闯了进来：“我不许在监狱里赌博！”他喊道。

我说国际象棋是一种技巧，不是碰巧的赌博。

班图挺胸道，“可笑。技巧也不过是机缘！”

他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大步走开。当他消失后，囚犯们开始模仿他。门又被撞开了。原来班图一直在门后偷听。

“魏恩波——你出来。”另外五个人和我一起被命令出去。“这次你们会在头的另一边笑！”我们每人鞭二十五次，之后我被转移到一所隔离的牢房，昏倒的人常被带到那里康复。在那里，我们看见已经有一人躺在床上，脸朝下，正是加斯顿。他也刚受鞭打，背上是大片血淋淋的伤口。我们试图用一件浸过水的衬衫来缓解疼痛，当最糟糕的情况过去后，我检查了裸露的肉上是否有木屑。他的身体就如发烧，剧烈颤抖。起初他无法说话。但他慢慢地、断断续续地解释说，他因讲道而受到惩罚。一名他信任的囚犯告发了他。

“这也是我该得的，”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说：“目前你不能说话。”

“我必须说，不然就没机会了。是关于波普教授。。。出卖他的牧师。。。”他停了下来，嘴唇颤抖。

“你不必告诉我，”我开始说。

“我受不了那个压力！当他死的时候……”他开始抽泣。

我们一起祈祷。他说他无法原谅自己。

“教授没有原谅我；别人又怎能原谅？”

“众人当然可以原谅你。如果波普知道一切，他也会原谅。”

加斯顿悲伤地摇摇头，我继续说道：“让我告诉你一个比你糟糕得多的人。它将帮助我们度过这夜。事实上，他是杀害我妻子一家的凶手。我太太原谅了他，他就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今天我可以说，我妻子亲吻的只有两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和杀她家人的凶手。”我便告诉他这故事。

当罗马尼亚加入德国一边参战时，一场大屠杀开始了，数千名犹太人被驱逐或杀害。仅在雅西城（Iasi），一天就有 11,000 名犹太人遭杀。我的妻子也是犹太人，也与我同信基督。战争期间我们住在布城，在这里犹太人没有被驱逐。但她在雅西城的父母、兄弟、三个姐妹和其他亲戚都被带到了边境的德兰（Transnistria）省。那些没有死在旅程中的犹太人，就在该地饿死，莎宾娜的家人也死在那里。

我告诉太太那个恶耗，莎宾娜擦掉眼泪，说：“我不再哭了。你该有一个快乐的妻子，米海该有一个快乐的母亲，我们的教堂应该有一个勇敢

的仆人。”我不知道她私下是否流涕，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莎宾娜哭泣。

不久以后，我们的房东，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悲伤地告诉我，有一个人从前线获得休假的士兵也住在这间大屋里。“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他说，“但有些东西把他变成了一头野兽。他自夸如何消灭特兰省的犹太人，甚至吹嘘说他杀死父母怀里的婴儿。”

我感到非常难过，决定整夜祈祷。为了避免打扰莎宾娜（她身体不适，可是尽管如此，她肯定会加入我的守夜。）于是晚饭后，我悄悄上楼到房东的房间和他一起祈祷。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在懒洋洋的坐在扶手椅上。房东介绍他为波里拉（Borila），号称为特兰省（Transmistria）屠夫。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身躯比我还要高，他的身上似乎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很快他就讲述他在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以及他屠杀的犹太人。

。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我说，“但我并不为犹太人担心——上帝会补偿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令我痛苦的是，当这些凶手们面对上帝审判时，他们将会如何。”

房东阻止了这谈话恶化，他说我们都是他家的客人，并将谈话转为中立的渠道。奇怪的是，凶手也是一个健谈的人，最终我还发现他热爱音乐。他提到，在乌克兰服役期间，他被当地的民歌迷住了。“我希望能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他

说。我知道其中一些乌克兰老歌。我看着波里拉心里想：“鱼进了我的网！”

“如果你想听其中的一些，”我告诉他，“来我的公寓——我不是钢琴家，但我可以弹一些乌克兰旋律。”房东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陪同我们。我的妻子正在室里的床上休息。她习惯了我晚上轻柔的弹奏，没有醒来。我演奏民歌，充满感情，我看得出来波里拉深受感动。我记得当扫罗王被邪灵折磨时，少年大卫在他面前弹奏竖琴。我停下来，转向波里拉，对他说：“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

“请讲，”他说。

“如果你透过窗帘看过去，你会发现隔壁房间里有人正在睡觉。那是我的妻子莎宾娜。她的父母、姐妹和十二岁的弟弟与家人一起被杀。你告诉我说，你在戈尔塔（Golta）附近杀害了数百名犹太人，他们就是在那里被带走的。”

看着他的眼睛，我补充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枪毙了谁，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你是杀害她家人的凶手。”

他跳了起来，双眼冒着火光，一副要掐死我的样子。

我举起手说：“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个实验。我会叫醒我的妻子，告诉她你是谁，你做了甚么。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甚么。我的妻子决不会说什么，却会拥抱你并为你提供家里最好的晚餐。

。

“现在，如果莎宾娜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也能宽恕和爱你，想象一下耶稣，完美之爱的化身，会如何宽恕和爱你。只要回到祂的身边——你的一切都得宽恕。”

波里拉并不是无情的。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和痛苦，他的一切凶恶言词，不过像螃蟹舞爪。只要一击打中他的弱点，他的防御就瓦解了。音乐已经打动了他的心，现在给他的，不是他所期待的攻击，而是宽恕的话。他的反应是惊人的。他跳了起来，双手撕扯衣领。“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哭了。他双手抱头，前后摇晃，大声哭泣。“我是杀人犯，浑身是血，我该怎么办？”他泪流满面。

我喊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仇恨的魔鬼从你的灵魂滚出去！”

波里拉颤抖着跪倒在地，我们开始大声祈祷。他不懂祈祷，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宽恕，并说他希望并知道它会被原谅。我们一起跪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站起来拥抱在一起，我说：“我答应做一个实验，我便遵守诺言。”

我走进房间，发现妻子还在熟睡。那时她非常虚弱，疲惫不堪。我轻轻地叫醒了她，说道：“这里有一个男人，你一定要见。我们相信他就是谋杀你家人的凶手，但他已经悔改了，是我们的兄弟了。”

她穿着睡衣走了出来，伸出双臂拥抱他。然后两人开始哭泣，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对方。我从未见过新娘和新郎像这个凶手和受害者那样充满爱、激情和纯洁地接吻。然后，正如我所预料的，莎宾娜去厨房给他送来食物。

当她不在的时候，我想到波里拉的罪恶那么可怕，必需进一步的化解。我就去隔壁房间，把睡着的两岁儿子米海抱了出来。方才波里拉还向我们吹嘘他如何杀害父母怀里的犹太儿童，现在他看到同样的景象，就如一种深刻的责备。他以为我会指控他。但我说：“你看到这孩子在父亲的怀里睡得多么安然？你也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天父关心你。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叫你洁白如雪了。”

波里拉的快乐是令人感动：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我家。早上醒来时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样舒服了。”

圣奥古斯丁说：“*Anima humana natureiter Christiana est*”——人类的灵魂天生就是基督徒。犯罪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它是社会压力或环境的结果。当我们得以摆脱自己的罪过，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事！

那天早上，波里拉想见见我们的犹太朋友，我带他去了许多信主的犹太人的家中。每一处他都讲述他的故事，每一家都接纳他，就如接纳归家的浪子一样。然后，他带着我给他的一本新约圣经，回去他的军团。

波里拉后来问，他的部队已奉命前往前线。
“我该怎么办？我又得开始杀戮了。”

我说：“不，你杀的人已经超过了一名士兵需要杀的。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该保卫国家。但就你个人而言，你不该再杀人了。不如让别人杀你。那个圣经没有禁止！”

10

当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加斯顿变得安静了。最后，他微笑着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开始一个安宁的睡眠。

早上，我们一起被搬回另一间牢房，在里面的人中我找到了格利（Grigore），他是另一名屠杀犹太人的战犯，现在已经悔改了。他也认识波里拉。

我告诉加斯顿说，“格利可以告诉你波里拉后来的事。”

格利说，他曾在特兰省与波里拉一起服役，并也参与了暴行。“后来当我们再出发到俄罗斯去时，他完全变了，”他说。“我们无法理解，他拒绝携带武器，他不再杀人，而是开始拯救生命。他在枪林弹雨中自愿援救伤员，最后他救了自己的军官。”

加斯顿也得救了。从那天起，他知道了基督教是甚么。

11

两年过去了；面孔来了又去，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监狱使一些人成为圣人，使另一些变成畜生。但要预测谁会成为圣人、谁会成为畜生，却不容易。不过大多数囚犯将继续在真空中渡过。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疲惫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就只有谈话。我诧异如果科学的进步，取代人们大多数的劳作后，人们将会如何打发日子？对于性事、或食物，或毒品，影片，只能作有限的创新。在许多人脑中，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在盖拉监狱的第三年，我们的处境有所改善。由于官方无心工作，我们就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多几口的食物。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甚么，也不知道还有一种最大的考验正在来临。

第八章

在1962年3月的一个早晨，守卫突然冲进牢房喊道：“所有神父都出去。”众牧师神父赶快收拾起仅有的物品，尽职地逃进走廊。我没有动。

我们的监狱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名叫亚历山。他是一名纪律王。这一措施，无论目的是甚么，都意味更多麻烦，我却希望可以不受干扰的继续传道。原来整个监狱如今进行重组：“知识分子”关在一间牢房，农民关在另一间，军人又是一间等。狱卒的无知导致了相当大的混乱。一位名为“圣经学生”的异端派被关在作家和教授的牢房里，虽然他只是一个没上过学的劳工。对狱官来说，所有的“学生”都是知识分子。

神职人员离开后，一名警卫问我的职业。“一位牧者，”我用柔和的乡音回答。于是就被安置在牧羊人和农场工人的牢房里。在罗马尼亚语，“牧者”便是牧羊人。

我得以避开几个星期，直到一名线人出卖了我。我被殴打后，被带到了牧师神父的牢房。我在

盖尔监狱余下的时间，一直逗留在那儿：这是一间好像洞穴一般的囚室，肮脏的灰色水泥墙，昏暗的光线透过两扇又窄又脏的窗户照进来。床铺紧密地排列，四层高。唯一的其他家具是几张矮凳和一张桌子。这房间的囚犯约有一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神职人员，也有一些平信徒。马桶只有一个，总是有人在排队如厕。

当我刚加入这牢房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欢迎，欢迎。”原来是老米尔主教 (Bishop Mirza)，东正教的模范，一位大善人。他的黑色套头衫上满是破洞。他有一双悲伤而温柔的眼睛，一头白发。

大家都抬起头来，我向我认识的人打招呼，包括米隆院长 (Abbot Miron)，他的床位就在主教和加斯頓的上面。

那天晚上，在我们这神父囚室的祈祷时间，天主教徒聚集在一个角落，东正教占据另一个角落，一神论者占据第三个角落。耶和华见证人在上层床铺设有一个巢穴。加尔文主义者在下层定居。一天两次，我们各自进行自己的仪式。但在这些热心的崇拜者中，我几乎找不到两个不同教派的人一起说“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的共同苦难，非但不能叫我们彼此了解，反而引发冲突。天主教徒无法原谅东正教领导层与共产政府合作。各派系的每一个观点都引起争论。虽然讨论通常是带着表面的客套，但有时也会爆发脾气。

在福音派牧师豪普（Haupt）床位几英尺外，天主教徒每天都举行弥撒。豪普就低声念叨着马丁路德的话。

“那是甚么？”一位天主教徒问道。

豪普就遵命提高声音：“我重复了路德的话，就是：‘上帝谴责教皇的弥撒，过于一切妓院、谋杀、盗窃、并通奸。’”

天主教仪式结束后，法泽（Fazekas）神父就说：“亲爱的弟兄，你没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人类遭受了三大灾难——路西弗的堕落、亚当的堕落和马丁路德的叛乱？’”

东正教神父安德烈（Andricu）也加上一句：“路德和路西弗”，他说，“其实是同一个人。”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暂时成了盟友。但夜幕降临时，他们却争论教皇的权力。

天主教神父法泽，是匈牙利血统，这令他遭到罗马尼亚天主教同胞的反对。因为当他大声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称圣母为“匈牙利的守护神”时，罗马尼亚的天主教徒普遍不满。

这时一位东正教神父（罗马尼亚籍）就问：

“圣母不也是罗马尼亚的守护神吗？”

“当然不是，她纯属于匈牙利人。”法泽回答。

加斯顿讽刺的问，难道玛利亚不是巴勒斯坦的守护神吗？因为离弃本国，作外国的守护神，显然是卖国行为。

“也许你没有听说犹太人谋杀了她的儿子？”法泽说。

米尔主教温和地微笑着，试图让大家平静下来。“圣母玛利亚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束缚，”他说。“她领导着教会，她是天国女王，她移动群星，领导天使合唱团。”

我说那么神就没有甚么可以做的了。

其他新教徒也支持我，但他们的态度，我却不敢领受。“我何必那么尊敬耶稣的母亲？”一位新教徒说。“她又不能救我。”

法泽神父回答说：“可怜的人。你只尊敬那些能拯救你的人吗？主的母亲唱道：‘万代人都会称我为有福的。’我们称玛利亚为有福的，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不是因为她能够施恩。”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然而，尽管我尊敬圣母玛利亚，但我依然觉得她的角色被追随者们夸大了，这种扭曲从古代就开始。当基督徒初次想象天堂时，他们想到东方的宫廷：一个充满奢华、音乐和芳香的地方。如果有人希望得到苏丹援助，他就先找一位认识朝廷大臣的朋友，请他联络大臣；那位大臣再转达给苏丹最喜爱的妃子，这妃子就转达给丈夫。基督徒就创造了一种类似的灵界权力机构。普通人先向神父提出请求，神父转求圣徒，圣徒再求圣母，由圣母求圣子。

但我信仰的基石是，人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但与人争论这个，有时只会引起愤怒。于是我讲了一个过去的真实故事。曾有一位不同宗派的

基督徒，一同被当时的政权送上火刑柱。当局问他们，行刑之前有没有甚么最后的要求。他们两人都有，而且是同一个请求：“把我们背靠背绑起来，免得看见对方可恶的咀脸。”

但有时我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感受。好几个小时，我都在听兰吉特神父（Ranghet，一位多米尼加人）坐在下面的床铺上念经。最后我说：“为什么你每天都要向圣母祈求一千次？她是聋了？还是冷漠？当我向这牢房的某人请求帮助时，如果他乐意，他就说可以；但我不会天天向他请求。”

兰吉特很生气。“既然你们路德教徒不信圣父的绝对正确，那么你们就更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了，”他说。“你的观点有问题，但我的观点是对的。”然后他又开始重复“万歲，玛丽……”，声音比以前更大。

“你经常提到‘圣父’——你指的是上帝吗？”

“我问，

“我指的是教皇陛下，”他回答道。

“对我来说，把神的专号归于人，似乎是亵渎，”我回答道。“你称教皇为地球上基督的代表，意即基督的替代者，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替身，就像我不能允许我的妻子接受他人为我的替身一样。”

“你太过分了，”他喊道。我还以为是他太过分了。就在那天，兰吉特神父说，人的一切奉献，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它们的价值，都不如

他在祭坛上祝福的酒和饼。我却无法接受一位神父，本身还不一定能得救，却能把一块面包变成神，人吃了就能罪恶得赦。

当现代主义的复原宗温加牧师 (Pastor Weingartner) 否认天主教徒说的童女生子时，以为我肯定会挺他。温加说，他无法接受这种童女生子的反合科学的故事。我回答道：“现在对童贞女生育进行调查已经太晚了，但若说它不合科学，却也不行。一位名叫勒布 (Loeb) 的美国生物学家已经在低级生物中，不必雄性也能产生后代。一位生物学家能为低级生物做的事，神也必能为人类做到？”

“但宗教史上到处都有处女生子的故事，”温加说。“这只能是神话。”

我说神话也有其价值。于是引述了一位沙皇时代乌克兰著名拉比的故事。当时一名犹太人被人提控，他的律师急需拉比霍菲 (Hofez) 的供词。可是这老拉比却拒绝宣誓；他说，他不愿意在供词上提及上帝的名，免得发生差错时，神的名就受损。检方说：“没有宣誓，如何保证这拉比说的是实话？”

辩护律师站了起来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提一些事，证明我的证人的品格，显示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证据吗？即使为了个人信仰的原因，他不能用他神的名号作为宣誓。拉比霍菲曾经逐家为穷人募捐。有一天，一个小偷把他撞倒，抢走了他收捐款的小箱。拉比大吃一惊，他并不是为失

财而担心，而是为那小偷的灵魂。他当时心中马上决定用自己的积蓄代替这笔捐款，免得小偷的灵魂会受神的严重处罚。他急忙追赶小偷，喊道：“你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罪！你偷的是我的钱，是我送给你的。穷人的钱在我家中，绝对安全。你可以安心使用那些钱！”

法官严正地看着律师。“你信那故事吗？”

“不，我不信。”

“为什么你告诉我们，你自己也不信的故事？”

“法官大人，试想您、我或我们的检察司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周围流传？可能会有传闻说我们喜欢混女人，或喝酒，或赌博。当然大都是胡说，但与我们的性格不会相差太远。这位拉比肯定是大圣人，才会有如此美丽的传说围绕着他。

“因此我请求法官，不必这拉比的宣誓。凡他所说的，都是真诚的。”

“那法官果然就接纳这建议。”

温加说：“那很有趣；但童女生子，总难令人相信？”

“基督徒相信圣经。”我说。“但即使圣经是神话，也不要嘲笑。神话在人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

“你的意思是，因为人看到耶稣出奇的神圣，于是相信他的出生肯定异于常人？”他说。

“是的。当我自己的儿子很小时，他就问我耶稣如何诞生，我就重复马槽的故事。

“不，”他说，“这不是我要再听的。爸爸说，‘猫生的必吃老鼠’，如果耶稣像我们一样出生，祂也必然像我们一样坏。”

米尔主教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一个孩子会这样说话，”他说。

“你说得也是，”温加牧师承认，“我们必须尝试彼此理解。”

我说：“在我信主时，我就接受在我眼前的基督教会，不论是那一派（当时我接触的是路德宗）。重要的是：听从圣经的真理为唯一的道路。甚么宗派或仪式都不重要。”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叫人欣喜的事。米尔主教说：“昨晚我想到，主祷文告诉我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宽恕我们的罪’时，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向神父认罪，或请求神父的宽恕；耶稣只吩咐我们直接向天父请求。如果我是一个新教徒（更正派基督徒），我便会用这论点。所以我想出于友谊，我便提出这个，报答你昨天为圣母玛利亚的捍卫。”

主教为我们大家树立了榜样。如果我们不能和平相处，我们就落入共产党的圈套：他们把我们关在一起，剥夺了其他囚犯的属灵指导，同时让

我们自相纷争。但除此之外，我想知道党方的企图是什么？

电工已经在监狱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许多牢房里都安装了扬声器，每一面墙都有一个。所以肯定会有广播。加斯顿说：“这不会是轻音乐。”

2

当整所监狱都完成广播器后，狱方就开始一个讲座会。这看来荒谬。一位傲慢的年轻政治官解释说，日食即将发生，并向我们保证，无需惊慌，因为社会主义科学已经使我们摆脱迷信。他接着向我们这些打哈欠的教授和医生们解释日食的原理。这次日蚀将会在2月15日发生，由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有责任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观看。

温加举起了手。“请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可以在大厅里观看日食吗？”

“不行，”讲师认真地说，于是又从头开始解释日食。

这种讲座持续了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观点。在一天结束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回到狱室时，就发生争吵。这些通常是安德烈神父发起的，就是说路德和路西弗同是一人的那位。他的极端主义使他在战争期间大力反对俄罗斯，在共产主义胜利后就转而吹捧共产至上。他曾

走遍全国，为党宣传，直到他的红军战友认为这位“红神父”的用处已经耗尽了。他们就逮捕他，并因他前期的反苏活动，判他十年徒刑。

如今他在狱中，就成为东正教的大力捍卫者。“这是唯一的真宗教！”他吹号说。“其余的尽是废话！”

有一次我问：“安德烈神父，您受洗时是在东正教教堂吗？”

“当然。而且是一位主教为我施洗！”他回答。

“你曾在一所东正教学校学习宗教教义？”

“当然，而且是罗马尼亚最好的一所教会学校！”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之所以会成为东正信徒的真正原因。那是因为五十年前，有一名罗马尼亚东正教男子与一名罗马尼亚东正教女子发生了性关系。”

安德烈非常愤怒。我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小时就被塑造，只被教导支持我们父母宗教的论点。但我们却以为自己是经过详尽的思考才相信的。

安德烈抗议道：“我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神父，但我除了自己的信仰，还研究过其他的宗教。”

我说我们果然也研究其他的宗教，但都是从我们出生时（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看。我转向附近的一群新教徒，问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路德

钉在威丁堡（Wittenburg）教堂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他们都点头。豪普牧师还引用了路德的话：“我只能站在这些信条上，别无选择。”

我继续问新教徒们，记不记得教皇训令中，把路德逐出教会的原因。“利奥十世（Leo X）不是疯子，”我说，“我们该知道他的理由。”但没有一人读过那封伟大的历史信件。

安德烈神父此时正在与一位拉比争论，拉比问：“你是否熟悉我们的塔木德（Talmud）？”

安德烈反问：“你可曾读过我们的新约？”

每个答案都是“未曾读过”。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冲突，我问大家：“你们知道托尔斯泰的故事吗？当时他向一位拉比逐条解释自己的信仰：诸如温柔、谦逊、耐心等等。拉比回答：‘我们无需新约。我们自己也有教导这些。’

“最后，托尔斯泰说，‘耶稣还教我们一件犹太教没有提及的事。祂吩咐我们爱敌人。’

“拉比说：‘果然那个我们没有提到。但你们基督徒有做到吗？’”

3

随着持续的监狱讲座，我发现，虽然讲课可笑，但背后的用意却不简单。很快的，演讲者就把政治放在一边，转到人性的渴求，即是弗洛伊德说的本我（id）。他们提醒众囚犯，说他们失去的一切。他们谈论食物、美酒和性，显然他们更精于谈论这些话题，虽然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被忘掉。

一名年轻的政治官员在谈及马克思、列宁和达尔文的引文，谈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美国悲惨的后果，以致数百万美国人正在挨饿。

起初，党方鼓励我们参与讨论，当一位讲师说，人死后，身体就变成一小堆的化学物质时，我就问如果是这样，为甚么共产党员会愿意为他们的信仰舍命。对于一个基督徒，牺牲自己是非常划算的交易。放弃这短暂的生命，赢得永恒，就像一个人下注十元，赢得百万。但是，共产党不信人有灵魂，为甚么舍得放弃自己的地上生命？这短暂的生命，不就是他们的一切了吗？

那位政治官不能回答。我便给他一个现成的答案：“圣奥古斯丁已说，灵魂的本性，就是一个基督徒。”

“无神论只是你佩戴在脸上的面具。在你的内心深处——除非一个人练习冥想或祈祷，否则永远无法达到那里——你也相信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必有回报。你内心其实相信有神。”

“让我们看看列宁同志对此有何评论，”讲师说道，并从一本翻阅无数次的小册子中找出一段。那小册子必然曾经给他许多启发。他读道：“即使是对上帝的观念，也是一种非常可憎的事。一切肮脏行为、暴力，并各种传染病，都没有神的观念那么可憎与危险。”这讲师就笑着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你有孩子吗？”我问。

“我有一个女儿在少年先锋队。”

“你宁愿她患上可怕的疾病也不愿她相信她的创造者吗？列宁就是这么说；癌症比宗教更好。”

政治官员把我叫起来，打了我的脸。这是他唯一的答案。

在这种强制的思想灌输下，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被掴一掌，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监狱的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未知的威胁。我们有一种不断被监视的感觉。那些沉静的扩音器是做什么用的？直到最近，我们还挨饿、挨打、虐待，但没有人理会我们心中的思想。老司令官班图——我们从卫兵那里听说，已经被撤职，因为伪造账目。班图曾说：“我们不在乎你们这些土匪在你们的牢房里计划未来的内阁，大权还在我们的布城政府。”

这些讲座说，我国总理德吉（Dej）正要摆脱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控制，开始与西方做生意。为此，德吉必须表现出更大的“民主”。罗

马尼亚关押的大量政治犯让他感到尴尬，但我们又不能就这样放出去，免得我们在外面搞“反革命”。于是当局必需先为我们的头脑进行“清洗”。

对于我们 1962 年盖拉监狱的囚犯来说，这是众多理论之一，但很少人相信。洗脑的结果会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最近加入我们的著名基督教作家拉杜 (Radu Ghinda) 总结了我们的感受：“如果他们过去十五年还不能改变我们，现在怎么能？”

当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牢房门打开了，更多的新来者进来了。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秃头的男人，他踉踉跄跄地左右走了几步，似乎是为了躲避那些注视着囚犯。

拉杜是第一个认出他的人。“戴亚努 (Daianu)！”他喊道。

那人拖着脚步走过去拥抱他的朋友。戴亚努 (Nichifor Daianu) 在罗马尼亚是一位人人知晓的人物。他是诗人，大学神秘神学教授、反犹的《全国基督教防卫联盟》领导人、也是战时政府宣传部长。他在法西斯统治下，掌握重权。如今他从艾乌 (Aiud) 监狱转送到盖拉，继续他的二十五年徒刑。

起初我几乎认不出他。他的大肚腩已经消失了。他下巴下面的皮肤像火鸡一样垂着。那个风流倜傥的好女人杀手，变成了一个浑身颤抖、像蜘蛛一样的老人。

他的狱友告诉我们在艾乌监狱发生的事。戴亚努一向食量很大，他试图从厨师们那里再拿一份麦粥。厨房主管拒绝了。第二天，主管又在场。“停！”他说，“那人太胖了。让他等到明天吧。”第二天，轮到戴亚努时，主管说：“告诉我，戴亚努，有没有神？”厨师把勺子悬在空中。戴亚努咕哝着什么。“说吧，让我们都在听。”戴亚努就说：“没有神。”主管说：“大声点。”戴亚努喊道，“没有神。”主管点头，厨师就给他麦粥。戴亚努赶快喝下稀粥。这一幕很叫主管开心。于是连续一周，天天这样做。这个故事传遍了罗马尼亚，后来也传到了国外。

但戴亚努依然有创作宗教诗歌的天赋。法西斯时代的朋友鼓励他背诵他在艾尔监狱创作的一些诗句。它们是悲伤和忏悔的歌曲，比他写过的任何歌曲更美丽。他也像他的朋友拉杜一样，依然反犹。他们的弟子中的前铁卫囚犯走私食物残渣到神父囚室，有时甚至带来香烟。反犹主义根深蒂固，戴亚努和拉度就成了这主义的牺牲者（共产党也逮捕反犹人士。）

一天晚上，在讨论有关洗脑时，拉度嘲笑道：“巴甫洛夫(Pavlov)在狗的行为模式中，作了手脚。朝鲜共产党使用了他的一些意见，令美国战俘叛国。但对受过教育的聪明人，这些方法行不通。我们不是美国军人！”

“我们也不是狗，”戴亚努说。

无人反对。

4

温加牧师告诉我们，他在学心理学时，见过一个性格测试：只要在卡片的中心画一条线，然后要求人们画出他们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件事。我们使用了一块涂有肥皂的板和一颗钉子。

一个人画了一把剑，另一个人画了一个头盔，其他人画了一朵花、一个十字架、一本书、一个几何图形。我说：“我需要另一块板，这对于我要画的东西来说太小了。”

我们当中的十个人，没有一个画出一位真祭师的属灵光景。

温加大笑说，“难怪他们不让我在神学院尝试这个。也许我们都该学做鞋子。因为我们当中的鞋匠似乎最属灵。”

原来我们都缺少了神秘的思想。而神秘主义便是祭司的核心。

他提到的是鞋匠格鲁 (Gelu)，一位精通圣经的异端派。这似乎激怒了戴亚努。

“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你谈的是如何修鞋，那非常好。但谈及圣经则不必。这里拥有欧洲著名大学的神学士。我们无需你的圣经教导。”

“教授，您说得对，”格鲁回答道，“我才是需要指导的。你能告诉我旧约哈巴谷书是关什么的吗？”

“一个非常小的先知，”戴亚努说，“不用理会他。”

“那么，俄巴底亚书呢？”

俄巴底亚也是鞋匠不需要知道的另一位先知。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有关哈该？”戴亚努也不能。

房间里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就这个主题说出三句话。格鲁却能背诵全部内容，叫我们惊讶。

神职人员研究的是有关圣经的书籍，而不是圣经本身。他们以教条和辩证法为基础，但对正在摧毁他们的共产主义几乎一无所知。

在1963年，我们得知教皇约翰呼吁与“离散的弟兄”实现和解的消息，很快我们就争论如何实现这种团结。

“我们自以为是为天国而战，但天国却是我们都没有的，”我说，“如果我们拥有它，就不会争吵了。真爱基督的人必然彼此相爱。就如那些得到耶稣医治的盲人，正在讨论一个人必需如何才能恢复视力。一个说，‘这是凭着信：只听救主一句话就行了。’另一个说，‘祂是触摸了我的眼睛。’第三个说，‘祂不单需要触摸，而且还必需用混有唾沫的粘土擦我的眼皮。’如果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祂就会说：‘我用不同的方法

使你们痊愈。现在你们不该争吵，而该感恩与庆幸。”

歌德说“颜色便是光的痛苦折磨”：穿过棱镜，光被撕成碎片。我想，我们的分裂也是基督必须承受的痛苦？

5

墙上的扩音器突然响了。然后，便是“一，二，三，四，试声，”多次如此。然后就是：“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停顿一下，更多啾啾声。那声音回来了，音量越来越大，而且有权威：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整个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总共十六个小时。很快，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意识到有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背后响。虽然这只是录音广播，但它仍然渗透到我们的脑海中。当声音最终停止时，这些话就在我的脑中响起：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

温加表示，这是一个过程漫长的第一阶段。“我国统治者们从俄罗斯那里学到这个，俄罗斯从北京学到它。接下来就是公开认罪。在毛泽东统治下，中国人必须在工厂、办公室和街道上听课。然后他们必须谴责自己，说出五年前、十年前或二十年前他们如何密谋反共。如果你不招供，他们就以顽固的反共派之罪名，判你入狱；如果你招供，你就会因所承认的罪项而入狱。因此，人们试图承认却又不承认，承认有反共思想，却又否认自己已经付诸行动。人人开始彼此谴责。朋友和家人不再彼此信任。我们也将如此。”

法泽神父说：“撒旦总是模仿上帝。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嘲弄。”

“这会持续多久？”加斯顿问道。

“直到你相信‘共产主义好’，也许要持续多年，”温加说。

我们的下一位讲师身材丰满，性格开朗。他愉快地向我们讲述德吉的十六年计划里，罗马尼亚美好的发展。那些党认为配得的人已经在享受天堂似的新罗马尼亚。他描述了给予忠诚工人的特权、美味的食物、好酒、黑海度假胜地的假期，到处都是穿着比基尼的少女。

“但我忘了！”他笑道。“你们大多数人未曾见过比基尼泳装。可怜的家伙。让我解释：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局限于颓废的西方。”

然后他开始生动地描述胸部、腹部和大腿时，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然后他感性地谈到美酒和旅

行的乐趣。我从未见过听众们脸上露出如此强烈的欲望。囚犯们已经变成了充满色欲的野兽。他们的人性尊严都被讲师的言论剥夺了，只剩下贪婪的肉欲。

“门就在那儿。如果您愿意，就能打开它。快乐就在外面等待着。扔掉那些使你成为囚犯的反动思想，到我们这边来吧！学会成为自由人！”

这些谈话结束后，当我们回到牢房时，几乎没有人说什么。现在没有人想到外面等待着他们的妻子和艰苦的工作。我们最原始的渴望被点燃了。每个人都渴望再品尝我们多年来错过的快乐。

已婚的新教牧师和东正教神父，肯定比自幼就过独身生活的天主教神父，更难面对这种性欲的试探。

过去几个月，我们的口粮一直很少，并定期称重，以确保我们的体重比正常体重少了四十磅。现在食物有所改善，但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怀疑它存在春药，监狱里的医生后来也同意我说的，认为我们的饭菜中添加了刺激性欲的药物。许多在监狱工作的人员，都由女性代替。包括前来宣读公告或法庭判决书的职员。她们穿着紧身、惹眼的衣服，还喷着浓浓的香水和浓妆。她们似乎故意在牢房里徘徊。

“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讲师每天都会说，“它过得很快。你还剩多少时间？加入我们吧。我们要帮您充分利用它。”

在原始情感被唤起后，我们文明外表就破裂，超我、我们的良知、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都被冲倒。

讲师们称我们的爱国主义是错误的，我们的理想是一个骗局，同时又给我们灌输共产主义。党方称这种聚会为“批斗会”。“你们的妻子们现在在做什么？”那位快乐的讲师问道。“当然，她们正在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精疲力竭，处于集体歇斯底里的边缘。在没有听课时，录音机就播放——共产主义好。

诗人戴亚努是头一位投降的。在一次听课后，他跳起来，开始乱乱说话。他说自己针对国家的罪行。“如今我看见了，看见了！我曾经跟从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糟蹋了我的生命！”他把自己的地主父母亲当作是罪恶的根由。没有人命令他攻击宗教，但他却开始否认的自己的信仰，圣徒，并圣礼。他攻击“迷信”，又亵渎神，谈个不停。

然后就是金达。他跟从同一个口气，起身发言。“我曾是一个傻瓜，”他叫道。“我被资本家和基督徒们欺骗了。。。今后我绝不会再踏进教堂，除非是为了向里面吐痰。”

戴亚努和金达呼吁众囚犯放弃他们的旧有信仰。他们比我们的讲师们更热忱。这两人都是有天分的讲员，许多人听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喜乐和自由的形容之后，大受感动，以为他们是说心底里的话。

当金达坐下来后，一位行走也不稳的老人叫道，“你们都晓得我——皇家军队的斯里将军。我如今否认自己的军阶和过去效忠的对象。我对过去与苏军作战感到惭愧。我曾服侍剥削穷人的阶级。我真的羞辱了我国。。。”

随后就是前警察首长，他的“认罪文”是，若非警方的阻扰，共产主义早就在我国掌权了。仿佛没有人知道罗马尼亚的共产完全是俄罗斯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人们轮流起身发言认罪。这是几个月来饥谨，羞辱，虐待，与洗脑的结果。头一个崩毁的便是那些生命已经被个人罪恶蚕食的，就如戴亚努和金达。戴亚努传讲苦行，但他却自己喜好吃喝，追求美色。他叫学生们为神放弃世界，但他自己却成了希特勒的宣传家。他说，“爱耶稣，”但他自己却恨犹太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信徒，但一个人的信仰显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的诗歌，虽然很漂亮，却只表达渴望，不是成就。金达也是，在反犹与基督教训之间挣扎。这二人都老了。他们已经在监狱挨过十五年，还面对更多。

神父房的其余人没有那么快投降。于是必须面对加倍的折磨。但这种折磨，至少令我们的争吵可以暂时停下。我们发现自己的一切宗派，其实可以分为二派：第一派是憎恨，其中的人就以教条或仪式为借口，攻击他人。第二种是爱，在其中的人发现自己在神面前都是一体。有时我感到，设立一个向牧师神父的宣教会，比任何宣道会

更重要。在囚室里，如今更常有自我牺牲之灵与前所未有的信心。在这种时刻，我们好像得到天使们的环绕。

至于圣餐，我们需要饼和酒。许多人都乐意献出自己的一份口粮，作为饼。只是没有圣物。

“我们便是活着的殉道者，”安德烈神父说。他们就如此把面包奉献为圣，并一小杯酒，就是从医院走私进来的。

6

不久，向共产当局“悔改”了的囚犯，就开始上台，向其余人演讲。他们更有热情，相信自己可以因此获得释放。当戴亚努和金达的投共消息传开后，两名铁卫队成员从木工房偷了一只利器，割开自己的静脉，自杀抗议。

我在囚室的一个角落找到戴亚努和金达。我问：“你们出卖了良心，导致两个相信你们的人自杀。你们怎么想？”

金达说，“他们死了，好叫众人得以存活。”

“一周之前，你们还是人民公敌，”我说。

戴亚努笑道，“我只要能够出去，管他是谁遭殃！”

众人那么憎恨他们俩，以致他们必须迁往别的狱室去。米隆说，“奇怪的是，写那么优美之基督徒文章的人，也会轻易变成出卖者。”

或者原因是，戴亚努和金达在文字中称赞的只是基督赐下的和平，爱，救恩。一个真门徒并不求基督的恩赐，却是求基督本身，于是就乐意自我牺牲。这二人不是基督的门徒，只是客户。当共产党在一旁开了一家更便宜的商店时，他们就往那儿去了。

7

我在1963年又病重了。他们把我送到监狱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后，当局就命令每个人到院子里去。能走动的就扶助不能行的。当局安排了一些囚犯进行一个小时的话剧表演。这是调戏基督教的演出。当司令官四围的官员鼓掌或大笑时，众人也跟着笑。

戏剧完毕后，狱长亚历山提高声量，问有没有积极或消极的评语。只说赞同是不够的，还必须给理由。戴亚努首先发言。金达其次。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重复针对宗教的口号。在他们回到自己的群体时，有些含泪的拥抱我说，“在这里，我们只能这样了！”

当司令呼叫我上台时，我记得太太在多年前，在异教大会对我说的话：“上去除去基督脸上的羞辱！”

在格拉监狱，许多人都认识我。我曾被关在不同的牢房。数百对眼光都在看着我，似乎在问：“他也会称赞共产主义吗？”

亚历山少校催促道：“上去说话！”他不怕反对的声音。当一个顽梗的人投降后，党方的势力就越发显大了。他们有的是时间与能耐。

我小心地开始，“今天是主日早晨。我们的太太，母亲与孩子们在为我们祷告，在教堂或在家。我们应该也为他们祷告。。。但我们却在这里看那种演出。”

当我提及他们的家庭时，众囚犯的眼睛就发出泪水。我继续说，“许多人在这里说话反对耶稣，但你们反对祂的是甚么呢？你们说到劳动人士，但耶稣不也是一个木匠吗？你们说，凡不做工的，就不可吃饭。但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中，就这样说了。你们发言反对富人，耶稣不是用鞭子从圣殿赶出钱币商吗？你们要共产主义，但不要忘记，初世纪的基督徒正是团体的生活，凡物共享。你们希望提拔困苦人，玛利亚的颂词不正说，神必提拔困苦人，叫穷人高于富人吗？一切共产主义的好处，都来自基督徒！

“马克思说，一切的劳动人士必须团结，”我继续说。“但有些劳动人士是共产党，另一些是

社会主义党（或称社会民主派）；还有一些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彼此相轻，如何团结？我绝不藐视一位无神论者。共产党也该如我一般。因为如果一个共产党藐视无神论者，他便是分裂了劳动人士。”

我就引述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他说基督教是重新建立一个被罪破坏的灵魂最好的宗教。我问有没有人未曾犯罪。如果有人未曾犯罪得罪神，他肯定有得罪党方。我给他们许多共产作家的论述。亚历山在椅子上坐的不安稳，脚尖蹬地，但却没有打断我。

囚犯们也安静的听。看见他们受到感动，我也忘了自己的所在地，开始公开传讲基督。我说就如学校总是有考试，工厂总是有品质管理，我们每个人也都将会被审判，首先是自我审判，然后是他人的审判，最后是神的审判。我看向司令官说，“你也将受审，亚历山少校。”

他也让这个过去。我就说及耶稣教导的爱，并祂给的永生。结束时众囚犯突然爆发欢呼。

当我回座时，米隆说：“你把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毁掉了。”但我晓得不是。加斯顿小声说，“你没有听见众人欢呼吗？”我回答道，“他们欢呼自己内心得到的东西，不是欢呼我。”

直到如今，只有几个神父在洗脑过程中投降。但公开反对的也很少。不过我们的支持者却有许多，就算他们没有当面反抗的勇气或智慧。

这不是容易的争斗。由于我的演说，他们就不再允许我留在监牢医院，却送我回神父囚室。

政治官员告诉我们说，戴亚努和金达已经自愿书写人民共和国的奇迹（他们何曾见过什么“奇迹”）。党方为他们提供一切资料，与旅游的宣传。于是这两人就有机会大作文章，证实自己的改变。几周之后，他们就获得了释放。这对我们这些坚持信仰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试探。我们唯一不晓得的是，他们也是最后被放的人。

孔亚中尉是政治官。他带来一份报纸，叫安德烈神父读出来。

安德烈就大声读出头条新闻：“一个欢笑与歌唱的国家。”这是金达的文章，附带着他未下监狱之前的欢笑照片。

孔亚中尉说，“我们要你们晓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自由与工作，就等你们放弃那些老掉牙的信仰，加入我们的行列，建立新罗马尼亚！”

果真是欢唱的心？每个人都记得金达是一个骷髅一般的老人。我们也晓得他的家人在悲惨中，他的孩子们不得上学。

戴亚努也贡献自己的名字美化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但他们的文章只为西方世界的读者。为我国带来经济和贸易的利益。这种报章杂志将送往数以千计的海外罗马尼亚群体。但在我国本身，没有人能够读到它们。

每个人都惊讶这二人获释。许多受折磨多年却依然坚持的人，如今开始动摇。但投降的人，却不见得获得释放，反而必须证实他们的真心，就必须自愿工作一日十四或十六小时。在回到狱室后，又必须参加更多的训话班，或上台训话。他们必须报告各人的“政治健康温度表”，就是各人向党方报告同伴们对共产的态度。标明各人是冷淡，或是半温，或是热情拥抱。

当局不可能得到有关于我的好报告。孔亚中尉带给我两个消息。第一是我太太下牢了。第二是，那天晚上十时，我将要受去鞭打，因为我对党方的藐视，以及在话剧日的演说。

莎宾娜下牢的消息对我是极大的打击。再加上我对将要承受之鞭打的恐惧。我们都害怕这种等待。时间好像停止了，然后又飞一般的过去。我听见脚步声来了。可是那些步声却越过我的房门，到我的隔壁，带出某个人。不久我就听见鞭打和哀号的声音。该晚却没有人带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给我同样的提醒（将受鞭打）。一连六天，我都在提心吊胆。最后我才被带出去。那些鞭打就如火烧。当打完后，孔亚中尉叫道：“再给他多打！”以后我起身太慢，他又说：“再加十鞭！”以后我被半提着回去牢房，播音机正在大声说：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何不放弃？

何不放弃？

何不放弃？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基督教愚蠢。

何不放弃？

有时狱卒会在狱室进行鞭打，处理小犯规：

把裤子脱下。

我们就脱下。

躺在地上，面孔朝下。

我们就躺下。

转身，把脚举起来。

我们就转身。

我们尝试祷告。有时一位神父会说，“我呼叫天父，可是这是怎样的天父，让我们的敌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劝他坚持。他就听了我们，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苦。

当守卫们打到厌倦后，他们就抓了两个囚犯说，“你！打你同伴的脸！”如果那人不能这样做，他们就说，“如今你的机会过了，”于是吩咐另一人打他。然后就叫被打的还击。他们彼此对打，直到流血。守卫们就大笑。

一个傍晚，孔亚中尉叫我收拾自己的物件。既然我不肯投降，或许到“特别房”一阵子有所帮助。这种特别房有许多传说。能从那儿回来的人很少。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在洗脑中崩毁（疯了），于是被带往他处去。又有一些投降，加入党方，开始学习向其他人洗脑。

我们走过院子，转了几个弯，抵达一排门。他们就把我送进去其中一间房子，上锁。

我孤独的在这间白瓷墙壁的房子。天花板反映着强烈的光，房子正在加温。我双手被铐，只能仰躺或则躺，全身大汗。窥看孔打开了，狱卒在问：“是不是加热系统出了问题呀？”我的肚子开始痛。食物肯定又有下药了。如今的播音机传来新的信息：

如今没人信基督了。

如今没人信基督了。

如今没人信基督了。

没人上教堂了。

没人上教堂了。

放弃吧。

放弃吧。

放弃吧。

如今没人信基督了。

孔亚在第二天早上来了，打开门时，一阵凉风就随着进来。我的手铐开解了。我听从他的吩咐，跟他出去走廊。

他带我到另一间房子，里面有干净的衣服，又有一张有床单的床，一张铺着布的桌子，插着鲜花的瓶子。这是太好了。我坐了下来，开始哭泣。当孔亚离开后，我渐渐平息了。我摊开桌子上的报纸。这是我多年监狱生活第一次见到报纸。我试图看看有没有美国军舰的消息。因为近来狱中多人都说，美国第六航母战斗群开入黑海，要求受压制的东欧诸国举行公民自由选举。但没有找到。那份报纸却在报道古巴的共产党独裁者，正在美国的门口挑衅。

第一位到这特异房子来的访客，便是亚历山司令。他说我的新环境只是一个样本。然后就开始攻击宗教。他说基督不过是使徒们创造的虚构人物，为的是欺骗奴隶，指望天堂的自由。

我就拿起那份报纸，递给他。“这是党报。它印着一九六三年七月的日期。意即如今是一千九百六十多年了。那是从何算起？是从一个虚构的人物吗？你不信有基督。可是你却接受他是人类文明的创始人。”

亚历山耸耸肩头说，“这不过是习惯使用罢了。没什么意义。”

“如果基督未曾降生世界，这种习惯如何产生？”

“一些骗子做的。”

我说：“如果你告诉我，说俄罗斯人已经登陆火星，我不必相信你。但如果我把收音机调到纽约的波道，听到美国向苏联的祝贺，那么我就知道这一定是真的。同样，当基督的最大敌人法利赛人在《塔木德》中也承认基督的存在时，我们只能承认基督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法利赛人也提到耶稣的母亲，并一些名字。而且，法利赛人还提到基督行的奇迹，更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们推说这是巫术。当时许多外教的作家写及耶稣，更证实他的存在。只有共产党人否认有耶稣，只因为这不利于共产党的理论。”

亚历山没有继续争论。他只给了我一本书。在坐牢那么多年后，我能在手上持有一本书，真是太棒了，即使它只是《无神论者指南》。这本书在西方不为人知，在这里却是人人的必读本，不然就不能得到任何工作岗位。我手上的这本是精装本，插图丰富。它先谈宗教的起源，从印度教

、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然后是基督教。其中把天主教形容的很糟糕，但对路德派（信义会）则好得多（因为路德公然反抗教皇）。但共产党依然说，两者都错了。它说科学已经证明这个。它说教会一直都在迫害科学。整整一章描述几个世纪以来，宗教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基督叫你爱敌人，为的只是叫你向剥削者低头。还有一章专门讨论俄罗斯神职人员的腐败（这本书显然来自俄国）。这书又使用许多图片，误导性地表明基督教仪式是来自异教的迷信。最后一章分析了“无神论者宣传的形式”。末了还列出针对宗教的苏联法令。读到这里我就睡着了。

8

在以后的数周，我在美好的承诺和可怕的威胁之间，轮番交替。一时是鲜花的私人房间，另一时是扩音器的牢房；一时是美味（大概是下了药的）的饭菜，另一时是饥饿。一天早上，在我送进热房时，安德烈神父也与我一同受刑。他就是那位过去的“红神父”，如今已经悔改了。他气喘吁吁地坐着，直到再也无法忍受。然后他跳起来，疯狂地敲门，乞求出去。警卫们只在笑。但肯定有人报告说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因为不久司令官就出现了。

“太热了？”亚历山问道，“还可以再热一点。这取决于你们。你们都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如果你们如今愿意改变，我需要证据。假设我们如今就释放你们，你们会如何？我要你们写一篇你们将要传讲的信息大纲。”他留下纸笔就出去了。

我们坐下来开始写。当我完成后，我给安德烈我的讲稿，也取过他的来读。

当我看完时，他无法直视我的眼睛。“这真的没有什么坏处，”他辩解说，“每个周日你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讲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方式。”

我说：“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知道这种胡说就是背弃信仰。一个神父就算是丧失了信仰，也该保持沉默。我现在不谈上帝面前的审判。只想到你的教友、你的朋友并家人。当他们听到你宣扬这种亵渎话，他们会怎么想？不要再被共产党欺骗。他们从来就捕遵守承诺。”

我与安德烈辩论了好久。我告诉他，他心中依然知道基督教是真理。最后他说：“把讲稿还给我。”他就把它撕成碎片。

新

系列的“批斗会”在大厅开始，现场有数百名犯人。我们从特别囚室也被带来参加。现在大部分讲课都是由不久前还被洗脑的犯人传讲，都是我们的狱友。党内专家给他们一番培训后，他们就回来赞扬共产主义。如今他们攻击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和观念。这些针对宗教的攻击，多是现代神学，诸如宣扬“上帝已死”学说。他们叫我们“研究你自己的思想家。他们已经证明基督教没有客观的真理。”

无论他们如何开始，这些囚犯讲师总是首先诉诸“本我”——他们对性的谈论比官方讲员更露骨——然后谈及“自我”，挑发我们对自由、金钱和一份好工作之憧憬。

每天持续十到十二个小时：讲座、讨论、录音口号、并下药的饭菜。

每间牢房都有两三人每天向狱方投报每个囚犯的“政治心态”；如果你迎合他们，他们多半不给你麻烦。不然，你就会被送去特别房。向当局打小报告如感冒一样蔓延全监狱。

八月二十三日是与俄罗斯停战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一切。亚历山少校在大厅举行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发言。

“我们有好消息，”他开始说。

当他宣布集体农场蓬勃发展时，那些农田被夺的农夫们就开始欢呼；当他说贸易开始起飞时，银行家和商人们就鼓掌。

亚历山继续说：“你们中间有些人终于看到共产主义的好处。但还是有些人至今未能明白。这些是蠢材！你们已经在监牢呆了十多年，还在等待美国人？我告诉你们，美国人正要来，但不是解放你们。他们来这里和我们做生意！”

亚历山用轻蔑的目光扫过我们稻草人一样的囚徒。继续说，在总理德吉的领导下，党方取得西方的投资，在我国建立工厂，核子反应堆等。

“你们真的傻！”他又说。“你们活在自己的幻想中。我们晓得美国人。如果你向他们求，他们不会给你任何好处。但如果你藐视他们，开口攻击他们，你就会获得一切你想要的。”

有人开始发笑，其他人就一同加入。不久整个礼堂都是爆笑一片了。在场面失控之前，司令官举手，会堂就一片寂静。他说，为了补偿我们不能参加“自由日”的庆典，他安排我们至少也能观看这活动。电视也安装好了。电视节目以德吉（Gheorghiu-Dej）的演讲开始，随后是许多其他人的演讲，谈及推翻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权。当然，没有一个发言者提到 1944 年 8 月 23 日年轻的国王米迦勒，和民族农民政治家马纽（Julius Maniu），并共产党正义部长帕特拉（Patrascanu）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国王已经流亡海外，另两人也已经死在监狱。

我记得在共产主义早期，大多数罗马尼亚人都试图回避周年纪念，但现在当游行开始时，我惊讶那阵容的庞大。无数的队伍经过检阅台：工厂工人、穿着深色衣服和白领的学童。他们经过党总部，马克思、列宁和德吉的巨大肖像在微风中的红旗中飘扬。我们听到靴子稳健的脚步声、铜管乐声、人群的欢呼声、“八月二十三日给我们自由！”的呼喊声。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对身旁的安德烈神父说道。

“你知道这个老故事，”他沙声回应。“当一位少女初次被侵犯时，她会挣扎；第二次侵犯，她会抗议；第三次她很享受了。”

演出结束后，亚历山就说，“我们现在将讨论这庆典。”

囚犯们一个个上台发言。前士兵、前警察、地主、农民、实业家。每个人结束自己的献词时，都会呼喊：“八月二十三日给我们自由！”

轮到我了。我以当时的众人的心态开始。

“如果有人特别受惠于八月二十三日的，那就是我了，”我说。“法西斯分子憎恨犹太人，如果希特勒赢得了战争，我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一块肥皂了。但我还活着，而圣经有句话说：‘一只活着的狗，也胜过死了的狮子。’”

人群中发出赞同的低语。“但另一方面，我其实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前就获自由了，”我继续说

道。“让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做到的。古代锡拉（Syracuse）的暴君读了哲学家奴隶艾比克（Epictetus）的书，非常欣赏，以至建议释放他。但艾比克回答道：“释放你自己吧。”国王抗议道：“但我是国王。”那哲学家回答说：“一个被欲望捆绑的暴君，便是奴隶。一个能约束自己欲望的奴隶，便是自由人。国王，释放你自己吧！”

大厅里一片安静。“我虽在监狱，”我说，“但我是自由的。耶稣已把我从罪恶和黑暗中释放了。我感谢八月二十三日将我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但对于另一种自由，摆脱一切今世事物，摆脱死亡，我必需感谢耶稣。”

指挥官站了起来。“把这些废话告诉加加林，”亚历山喊道。“他到了太空，却看不到任何有关上帝的迹象。”他开始大笑，囚犯们也随着笑。

我回答说：“果然是。就像一只蚂蚁在我的鞋子的周围走来走去，说它完全看不到什么魏恩波。果然它真的不能看到。”

我得到的报酬，就是拉长时日关在特别狱室。一天亚历山特意来告诉我说，美国总统被暗杀。

“你对此有何感想？”他问。

我说：“我不敢相信。”

他给我看了一份 1963 年 11 月 22 日的报纸，报道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

我回答说，如果肯尼迪先生是基督徒，他现在肯定幸福在天堂。亚历山就走出去，关上门。向囚犯提出这些问题，是共产党观察他们囚犯的思路的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安德烈神父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警卫进来，把我们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带了出去：我们想，这可能是带去处决。

警卫说：“在这里右转，”然后，“现在左转。”我们来到了监狱的一个偏远地方，他们带走安德烈，我仍然站在门外，和一名警卫独处。过去当我谈到基督时，这名警卫总是默默的听，绝不干扰。

“我可怜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你正在面对苦头。但奉神的名，继续前行！”

他走开数步，面部木然。但他的话却温暖了我。

当门打开时，我被带进一间布置舒适的办公室。一张长桌旁有几个男人面对着我。中间坐着一

个穿着将军制服的男人。这就是内政部副部长内格里（Negrea），他敏锐的智慧与他强健的吉普赛脸上燃烧的凶猛能量相匹配。政治官员和布城的一些官员坐在他旁边。

内格里礼貌地说：“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案子，魏恩波先生。我不理会你的观点，但我尊重枪口坚定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也是顽固的。我自己也经常入狱，人们企图改变我的心志，但我依然坚定。”他用铅笔敲了敲桌子。

“是时候我们必须进行谈判了。如果你愿意忘掉你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也愿意忘记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翻开新的一页，成为朋友。你无需违背你的信仰，却依然可以与我们合作，互惠互利。”

他翻开面前的一份文件。“我甚至读过你的讲章。你的圣经解释得很漂亮。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

他是甚么意思？当内格里开始进行党的标准科学理论时，我问自己。一位重要的部长会为了向一个囚犯解释这“科学理论”，老远跑了两百英里？

就像多瑙河一样，蜿蜒穿过平原，最后汇入大海，他的话语也最终结束了。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入我们行列的人。我们要的，是那些看到了自己过去谬误的人。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反对迷信，你就可以立即开始新的生活。你

将再次拥有高薪岗位，又有家人的陪同，让你舒适又安全。你说如何？”

我回答说，我目前已经生活在喜乐中。但至于帮助党方，我倒有一种方法。

旁边的政治官员猛地坐直了。内格里问：“你的意思是你会为我们工作？”

“我建议你派我和你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讲师，到每一个城镇。我首先要揭露我的无知，和持有这种倒退的愚蠢的基督教；然后你的讲师就讲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人们就能自行分辨。”

内格里久久地凝视着我。“你在挑衅我们，魏恩波先生。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过去我们共产党回答当时政府官员，就是使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不必争论。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没有人勉强你成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如果你执着自己的过时信仰，那就继续。虽然我不明白一个有教养的人怎么能接受这种东西。但要记住，权力在我们手中。共产主义已经征服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教会必须与我们达成协议。

“让我们摊牌谈判。坦率地说，我们厌倦了教会领袖做我们要求的一切，有时甚至更多。他们在人民眼中已经彻底成了官方的走狗；他们不再与人民接触。”

内格里就逐一提及罗马尼亚剩下的几位主教。他说，他们都是一群无能的人，纯是应声虫。众人也晓得。

“现在，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成为了主教，你就可以坚持你的信仰，同时也忠于政权。你们的圣经说你们必须服从掌权的，因为权力来自上帝，那么为什么不服从我们的权威？”

我什么都没说。内格里请求其他官员暂时离开。他确信我会接受他的提议，并私下告诉我一些事。

“党犯了一个错误，”他开始说道，“就是攻击你们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或“世基会”。它最初是一个间谍组织，但参与其中的牧师往往都是无产阶级出身；可以这么说，他们不是这间谍组织的骨干，只是高级仆人。我们不应该反对这些人，而应该把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那么这个理事会将成为我们的工具。”

他靠近桌前。“魏恩波先生，这就是你可以协助的地方。你曾为《世基会》工作。你在国外广为人知。我们仍然收到很多关于你的询问。如果你成为主教，你可以帮助我们其他《世基会》盟友为我们建造一座堡垒，不是为无神论，而是为了社会与世界的和平。您肯定也晓得我们反对核弹，反对战争，求实现世界大同？您又可以同时尽情地崇拜：那个我们不会干涉。”

我想了一会儿。

“这种合作必须到什么程度？过去与你合作的主教都必须举报他们自己的神父。我也必须这样做吗？”

内格里笑了。他说：“由于你的职位，你不必承担任何特殊义务。至于任何有损国家的行为，则是人人都晓得该举报的。作为主教，你当然也知道。但是让我们进入正题吧。如你所知，现任罗马尼亚路德宗主教已经很老了。你马上就可以成为当选的主教，并罗马尼亚信义会的领袖。”

当我回答说我需要时间思考时，内格里同意了。

“在我回去布城批准你的释放信之前，我们会再见一次。”他说。

过后他们又把我送回隔离牢房。我想起一个要求时间思考的犹太故事：一位拉比面对宗教裁判所。当局要求他否认信仰，他就要求考虑时间。第二天早上，这位拉比说：“我不会皈依天主教，但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在我被烧死在火刑柱之前，请把我的舌头割掉。对于这种问题，‘不’是唯一的答案。”

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面。另一方面，我晓得共产国家的官方教会，必须与共党有某种妥协，才能生存。毕竟，即使向共产当局纳税，基督徒也必须妥协。说教会可以“转入地下”是很容易的，但地下教会需要掩护。如果没有这个掩护，数百万人将没有地方进行聚会，没有牧师讲道，也没有牧师能为信徒施洗，或为信徒举行婚礼，葬礼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局面。如果我只需说几句话，支持已经生效的集体农场，或所谓的和平运动，就能赢得教会的正常运作，为何不做呢？

还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政治官说莎宾娜下狱了；如果我拒绝他们的提议，她和米海会怎么样？

我需要来自上面的力量来拒绝，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继续服刑十一年。还有可能牺牲了家人。我自己也大概会死在可怕的折磨下。但在那一刻，我看不见上帝的脸。我失去了信心。我只见到共产主义的巨大形象。它已经覆盖世界的好大的部分，并有可能覆盖另一半；我想象到死亡的危险，被反复殴打的危险、以及累及妻儿挨饿的危险。在那时刻我喝了基督的杯；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客西马尼园。我像耶稣一样，脸朝下趴在地上，断断续续地哭泣祈祷，请求上帝帮助我克服这可怕的诱惑。

祷告后，我感觉安静了一些。但我仍然看到在我面前的戴亚努和金達等人，他们伤害了众人的信心。这样的人多达数千。如今我也为肉体的软弱，像这些人一般。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信仰软弱的人，并且会因为肉体的好处，像他们一样被吞没。我开始仔细回想基督教真理。我重复问自己最简单的问题：爱比恨好吗？基督有没有除去压在我心中的罪？祂除去我的疑惑没有？祂是救主吗？回答“是

”并不困难。当我这样回答了，就感到一块大石从我脑海中移开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对自己说：“我现在要试着不去想基督。”但我失败了：除了基督，我想不到别的事物。我最后一次想到内格里的提议，就想到尼布甲尼撒等人，直到希特勒。尼布甲尼撒给犹太人立了一位犹太王，作为傀儡；希特勒也在东欧诸国设立傀儡。如今我也像一个傀儡，成为共党秘警设立的罗马尼亚路德会主教。我不再是基督任命的主教，而是共党的间谍。

我再次祈祷，终于感到心灵平静。

第二天守卫又带我出去了。亚历山司令和其他人都坐在内格里身边，当我说我不能接受时，整个问题就从新讨论。直到我们谈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时，内格里才再次要求其他人离开。然后他敦促我重新考虑。

我说：“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主教；甚至不配当牧师，连做一个简单的基督徒对我也是太大了。第一批基督徒在被处死之前说，“Christianus sum（我是基督徒）！”我却没有这么做；倒去考虑你的可耻提议！我不能接受它。”

“我们会找到另一个愿意的，”他警告说。

我回答说：“如果你相信你能证明我错了，请说。我只求真理。”

他问我：“你当然知道这对你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仔细考虑了，我很高兴为真理受苦。”

内格里用一种酸溜溜的表情看着我。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白花了。他依然维持自己的礼貌，向我点了点头，关上公文包，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观看，警卫拷上我的手扣，就把我带走。

我在特别狱室呆了很久。我也不能肯定多久了。时间已经把我监狱的日子压缩成一个巨大的一日。他们加大洗脑的力度，但方式依旧。扩音器现在说：

基督教死了。

基督教死了。

基督教死了。

我清楚记得，一天党方给囚犯们发出明信片，邀请我们的家人来探监，送包裹。在指定的那天，我被刮了胡子、清洗了，穿上干净衣服。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坐在牢房里，盯着闪闪发光的白色瓷砖，但没有人来。晚上狱卒换岗。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明信片从未寄出。同样的伎俩也被用在了其他顽固的囚犯身上。扩音器正在广播：

现在没人爱你了。

现在没人爱你了。

现在没人爱你了。

我开始哭泣。扩音器继续报道：

他们不再理会你。

他们不再理会你。

他们不再理会你。

我不能忍受这些话，但又不能关掉这声音。

第九章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所有囚犯都聚集在大厅。司令带着他的军官们进来了。我们以为又是一场新的“斗争运动”。可是亚历山少校却宣布，根据政府大赦的条约，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得释放。

我简直不敢相信。环顾四周，我看到每个人脸上都一片茫然。随后亚历山一声高喊，整个大厅爆发欢呼。如果那句话是：“明天你们都会被枪杀”，他们仍然会欢呼喊道：“正是！我们是该死的！”他们已经变成了机器人。

但这公告却不是另一个作弄。那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囚犯被释放。为此，我们必须感谢西方世界的影响，这又是一次解冻，以及——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的总理德吉真的改变了心意。经过多年对共产主义教条的怀疑，他又回到了母亲抚养他长大的信仰。德吉是通过家里的女仆和她的叔叔而信主的，那位叔叔经常向他讲述圣经。尽管德吉没有公开承认基督教，但基督教却给了他反抗苏共的勇气。他不怕苏共的威胁，与西方建立了新的关系，成了其他东欧共产国的榜样。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有人说是苏联特工干的。

轮到我被释放。我发现自己是聚集在大厅里的最后一批囚犯，约有一百人。我们几乎是盖拉监狱最后的人了。空荡荡的走廊奇异的寂静。我们的头发修剪了，我们得到了破旧但干净的衣服。

正当我思想身上这套衣服的原主时，我听到一个人喊道：“魏恩波兄弟。”他走过来说，他来自锡比乌（Sibiu），所以我猜想他是我们那里教会的成员。

“我从你儿子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他补充道，“我们同住在一个牢房里。”

我说：“我的儿子——在监狱里？不，不；你弄错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那人继续说道，“他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六年了。”

我转身走开。这个打击几乎超出了我的承受力。米海的健康一直不佳。他绝不能承受长期坐牢。

当亚历山司令出现时，我的思绪仍然冻结在痛苦和震惊中。“那么，魏恩波，你自由了，打算去哪里？”

我回答。“我不知道。官方告诉我，我的妻子在监狱，现在我听说我唯一的儿子也在监狱里。我没有其他人了。”

亚历山耸耸肩。“那孩子呀？那么你儿子也下牢，你感觉如何？”

“我确信他不是因为盗窃或其他罪行而入狱，如果他是为了基督而入狱，那我为他感到骄傲。”

“什么，”他喊道，“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把你关押，你却还以为全家为信仰下狱是光荣的事。”

“我没有叫你花钱关押我呀！”我说。

于是我们分手了。我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走出监狱，来到盖拉镇的街道。汽车呼啸而过，我紧张了。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令人惊讶，甚至令人恐惧。女人外套的颜色，一束鲜花的颜色，对长期在灰色监狱的人，都是一种惊吓。收音机里的音乐从开着的窗户里飘进来，感觉就像太甜的咖啡。空气闻起来那么干净清新。但一想到我的妻子和儿子在监狱，我就悲伤。

我乘公共汽车去了附近的克卢日镇（Cluj），在那里我有朋友，但他们已经搬走了。在盛夏的酷暑中，我从一栋房子走到另一栋房子，终于找到了他们。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拿出了蛋糕、水果以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但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圆形的、美丽的棕色洋葱，这就是我曾经渴望的。狱中我常渴望得到一粒洋葱来消除监狱食物的味道。但现在我不想要那个了。

我给布城的一个邻居打了电话。接听的声音是莎宾娜！

“我是理查，”我说。“我以为你还在监狱呢。”一阵混乱的声音传来。米海接过电话。“妈妈晕倒了——等一下。”更多杂音。然后他说：“她没事了。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

米海并没有入狱。我得到的错误消息，只是当局为了测试我的反应，看看洗脑的效果。

我坐火车去布城。当我们驶入车站时，我看到一群四十多人，抱着满怀的夏天花朵，我不知道哪一个幸运儿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然后，我认出了面孔，于是往窗外挥手致意。当我下火车时，似乎我教堂的所有人都来迎接我，然后我的手臂搂住了我的妻子和儿子。

那天晚上，莎宾娜告诉我，尽管她多年前就已正式得知我的死讯，但她拒绝相信。后来又有陌生人来访，表示哀悼，自称是参加过我葬礼的前囚犯。

“我仍然会等他。”她坚持说。

很多年过去了，直到我的来电。对莎宾娜，我就像死里复活一样。

当局给我的教区是一个有三十五名成员的教区。异教部警告我说，如果有三十六人，我就会有麻烦。但我有很多话要说，而且有很多人想听。于是我决定每个星期天开车到乡下某一个教堂去讲道。在当地警察听说他们所在地区有一位外来的牧师时，我已经离开了。周日警察们都不太想跑动。但这种方法也不能持续。凡帮助过我的牧师，都被当局解雇了。于是对于那些我想服务的人，我成了他们的负担，也是他们的危险。

朋友们敦促我尝试离开罗马尼亚，以便在西方，为地下的教会发声。从西方教会领袖的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些人不知道共产治下的宗教迫害；另一些人则不想知道。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主教前来友好访问，并与迫害我们的人一起宴会。我们问他们为甚么这样做。

“作为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必须与人和睦，包括与共产党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与受难的人和睦？为什么他们完全不提那些在监狱或酷刑下死去的神父和牧师，也不给受害者家庭留下一点钱？

康德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于 1965 年来到这里，获准布道。他没有意识到会众是由官员和秘密警察特工组成——每次这种场合都会出现同样的观众。这些党员也聆听来访的拉比和回教师、主教和浸信会的牧师。这些牧师神父回国后

，就赞美罗马尼亚的宗教自由。一位英国神学家甚至写了一本书，宣称基督肯定会钦佩共产主义的监狱系统。

当两位共产国的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被自己的同志判处监禁时，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出抗议。但当基督徒因信仰而入狱时，却没有西方的基督徒抗议。

我偶尔会在不怕危险的朋友家中私下讲道，因此，在我前往西方的秘密谈判开始后，有一个陌生人请我去他家，并不叫我感到意外。他给了地址，但没有透露姓名。当我打电话时，他独自一人。他说：“我想为你服务。”我认出他是一名秘密警察特工。

“我的一位官方的朋友说，你的美元已经收到了。也许你想立即离开这个国家。我的朋友很有些担心。你刚出狱，我们知道你是个男子汉，他们认为，如果你再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或者让你的家人留下来作为人质，以保证你的良好表现，可能会更好。当然，你将获得无条件的释放……”

我没有给他任何保证。他们有美元，这已经够了。西方的基督教组织为我支付了大约 10,000 美元的赎金。出售公民可以带来外汇并有助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预算。

接下来，我被公开传唤到秘密警察总部，一名警官告诉我，“你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

随时出国，那时你要讲甚么都可以，只是不能说我们的坏话。你只传你的福音。否则你将永远沉默。我们可以花 1,000 美元雇佣一个歹徒，或者我们也可以把你带回来，就像我们对付其他的叛徒。我们也能制造金钱丑闻，毁掉你的声誉：或是桃色新闻。”

于是我就这样“无条件”的释放了。

我又开始服侍地下教会了。我在挪威遇到了我们过去宣道会的朋友，当我在那里讲道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开始哭泣。后来她告诉我，几年前她读到了我被捕的消息，从那时起，就一直为我祈祷。“今天我来教堂，不知道谁会讲道。当我听着，意识到是你，就哭了。”

我们来到了英国，在教堂和大学里演讲。有一次，一些大学生告诉我，有二十位来自俄罗斯的学生，前来该镇参观。这些俄国人不接受他们送的俄语圣经。

“他们真的不接受，”一位大学生说。我告诉他们，“只要个别地分发。因为他们都害怕被同伴告发。”果然，每一位俄罗斯年轻人都如约来到男厕所，偷偷地接受了一本圣经。

在意大利，当地人邀请我在主要的浸信会教堂讲道。我谈到了基督，但当我谈及反对共产主义的话时，意大利浸信会的领导人就打断了我。我问他为甚么。

“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基督徒，”他说。“我接受马克思的所有教导，除了无神论。”

在教堂门口挤住我们的学生们，却同意那领袖的观点。他们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天，我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谈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不像俄罗斯那种，”他们说。我想起过去我们罗马尼亚人也这样说。

在其他欧洲国家，有人告诉我：“共产党很小，没有害处，只是个小丑而已。”我们罗马尼亚人以前也这么说。世界上到处都有这些等待机会的小政党。当老虎还小的时候，你可以和它玩耍；当它长大后，它会吞噬你。我遇到了西方教会领袖，他们建议我单单传扬福音，避免攻击共产主义——就像布城秘密警察的吩咐。但是一种错误就必须称它为错误。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他们是“毒蛇”，为此祂被钉十架，不是因为祂的登山宝训。我谴责共产主义，因为我爱共产党人。我们可以恨罪，同时爱罪人。基督徒有责任赢得共产党人的灵魂，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就会压倒西方，把西方的基督教也拔除。

2

在 我从监狱出来后，一个星期日，我带着一群孩子去布城动物园时，秘密警察特工也在跟踪，并留在动物园门口，准备在我们离开时再跟踪。我领着孩子们到了狮子笼，把他们聚集在我身边，让我可以小声说话，我说：“你们信仰的先贤们，就是被扔进猛兽笼子里，给吞吃掉。他们很乐意为了信耶稣而牺牲。也许有一天，你们也会因为成为基督徒而被监禁并受苦。现在你们必须做出决定，你们是否准备好面对那一天？”

他们眼里含着泪水，轮流说“是”。这是我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次坚振礼班，我没有问其他问题。

在华盛顿市政大楼的墙上，有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刻着精美的铜版《美国宪法》。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你只能看到宪法上刻的字：然而当你退后一步，就看到华盛顿的脸。这本书也是如此，它述说一个人的坐牢的经历，和他同伴们的故事。可是在他们背后却站着基督耶稣，是祂给我们信心，又给我们征服的力量。

(全书完)

